图书馆 故事会

Gushihui

Xuezhejiangtancongshu

马相伯 著

学者讲坛丛书

一日一谈



马相伯在校内游戏中的不成功，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教育家所缺少的独特个人品格。

名誉主编 王元化

Gushihuitushug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馆故事会

一日一谈

马相伯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羡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编者的话

站在世纪门槛边的中国人，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回首百年风云，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并汲取他民族文化精华以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无数令人反思不已的话题。中国人，由于历史传统的厚重积淀，自从跨入近代以来，一直未免于步履蹒跚，进程迂缓；中国人，又由于百折不挠的坚毅自信，至终也不会甘于落后，放弃进步。溯自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进步与昌盛，上下古今，八方求索，苦心研讨，著书立说，用以沾溉世人，启迪后学。回顾历史，我们固然常常涌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感喟；瞩目将来，又不能不时时记取先民“温故而知新”的教诲。

民族文化的形成，得自历史的积累；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同样有赖前赴后继的追求。中国人汲取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不始于今日；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雄视阔步，正是

凭藉着前人的开拓与经验。因此,在今天的“知新”,即学习他民族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切切不可忘却“温故”,即接受并借鉴前人的求索成果。漠视前人在继承传统与消化外来文化方面的已有成绩,凡事重“新”而厌“故”,将前人辛苦经营的文化遗产轻率弃置,实非明智者所当为。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固然在日日更新,但今日之“新”,何尝不会成为明日之“故”? 而昨日之“故”,又何尝不能培育今日之“新”? 在文化学术的领域里,有对先哲的充分敬意,有对前贤的虚心继承,才可称其能“温故”,也才可信其能“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故相循,生生不已,既是自然世界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法则。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当前的出版潮流中,既有志于为读者大量提供“知新”的读物,又有心于“温故”。现承命遴选前辈学者的传世佳作,重印以饷读者,征讨并及当代学人的未刊著述,新版以惠后学。入选各书,均诚邀专家,新撰导言,并辑作者简传附后,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因感主持人愿力之弘,用意之邃,故不辞谫陋,谬膺委任,幸赖师友关爱,勉强完命。因所选多为导人问学入门的小种著作,其中不乏前辈讲学之稿,故总冠以《学者讲坛》之名。编选之间,展诵多益,以己推人,如读者亦同感受益,更自荣幸。

一九九八年五月吴　格记于复旦园

目　录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 朱维铮
序 …… 71

一 莫索里尼的算盘 …… 1
二 谈华侨 …… 4
三 人物月旦 …… 6
四 袁世凯之为人 …… 8
五 上下相蒙 …… 10
六 德俄之战与日俄之战 …… 12
七 关于本届全国运动会 …… 15
八 中西学术的谈屑 …… 17
九 我的幼年 …… 19
一〇 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 …… 21
一一 杨谷山孝廉服官秘诀 …… 23
一二 文谈 …… 25
一三 我与高丽 …… 27
一四 袁世凯与丁汝昌 …… 29
一五 和百十来个鸡毛帚周旋 …… 31
一六 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第一个黄花岗

纪念日 …… 34
一七 从高丽回国以后 …… 36
一八 刘省三(铭传)与张香涛(之洞) …… 38
一九 其昌洋行与招商局 …… 40
二〇 借款 …… 42
二一 巴黎的金刚钻与“南京” …… 44
二二 拿破仑第三的政变 …… 46
二三 蔡孑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 …… 48
二四 从震旦到复旦 …… 50
二五 意阿战争中的面面观 …… 52
二六 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 54
二七 犹太人问题 …… 56
二八 宪法总题 …… 58
二九 新货币政策之后果 …… 61
三〇 闵妃之死 …… 63
三一 郑孝胥与溥仪 …… 65
三二 再论政府的货币政策 …… 67
三三 拿破仑的军事天才 …… 69
三四 儿童时代的幻想与儿童教育 …… 71
三五 经学与“月亮” …… 73
三六 杜工部的描写天才 …… 75
三七 谈眉 …… 78
三八 关于马眉叔先生 …… 80
三九 孔教所给与中国的影响 …… 81
四〇 孔教所给与社会的影响 …… 83

四一　说谎 …… 85
四二　关于货币之发行与现金储藏问题 …… 87
四三　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 …… 89
四四　杂谈 …… 91
四五　“Being”的问题(一) …… 93
四六　“Being”的问题(二) …… 95
四七　杂谈 …… 97
四八　清季外交界的趣闻 …… 99
四九　菲律宾的独立 …… 101
五〇　中国各大学教授所应做的事 …… 103
五一　中西各国元首学问上的比较 …… 105
五二　欧美的社会学者和历史家应当到中国来研究 …… 107
五三　生物学上的“亲善”现象 …… 108
五四　谈屑 …… 110
五五　中国人的演说 …… 111
五六　中国人应该知道国家是什么 …… 112
五七　所谓文化 …… 114
五八　谈屑 …… 115
五九　再谈国家 …… 117
六〇　三论国家问题(二) …… 119
六一　杂谈 …… 121
六二　好学生 …… 123
六三　“怯懦”与“残酷” …… 125
六四　胜败的关头 …… 126

六五 所谓“礼教”问题 …………………………… 128
六六 所谓“礼教”问题(前谈) ……………………… 130
六七 所谓“礼教”问题(再谈) ……………………… 132

附录

马相伯生平简表 ………………………………… 廖 梅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朱维铮

引 言

在近代中国,马相伯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却在政治史上十分有名。

这位江苏省丹阳县人,出生于1840年4月7日,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初六。恰在这一天,英国议会内辉格党人,以微弱的多数票,否决了托利党人提出的反对女王政府发动对中国进行不义战争的议案,巴麦尊内阁派遣的远征军已在驶往南中国海途中。两年以后,用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习惯,即马相伯三岁那年,1842年7月,英国舰队便突入长江,攻占了马家居住的丹徒(今镇江)。道光皇帝被迫屈服,同意他的一名大臣与英国远征军司令在停泊于南京城下的英国旗舰上签订了和约。它是清帝国与西方列强正

式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被中国人引为奇耻大辱。历史学家通常把这次"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从这个意义来说,马相伯就是中国"近代"的同龄人。

马相伯也真长寿。当他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在 1911 年目睹了清帝国终于被革命推倒,那时他已七十二岁了。他不但亲历了这七十年的中国的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而且参与了其中多次事变。"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以后,马相伯还活了三十八年,并且从 1912 年 1 月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起,又在共和体制下,先后见过六个总统,四任主席,以及在军阀混战中的一堆执政、大元帅、总司令、委员长等。1939 年 11 月 4 日,他在越南谅山去世,时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多月。照中国的习惯计算,他活了整整一百岁。活了一百岁的政治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已经非常罕见,而马相伯还在同时代人中创下了从事政治活动最久的记录。

马相伯在三十七岁那年(1876)退出耶稣会,随即进入官场。虽然在二十一年以后,他又重返教会,却没有割断他同政界的联系。他去世前两年,还接受在重庆的蒋介石政府的任命,做了"国民政府委员"。因而,他涉足政治活动,虽然时断时续,或在朝或在野,但时间长达六十五年,在同时代政治家中可称元老。

不过这位政界元老,在晚清官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幕僚和外交官。帝国变成民国,他的政治地位升高了,做过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员,做过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做过蒋介石政府的委员,但也没有获得过实际的政治权力。

中国人至今没有改变把权力与成功混作一谈的习惯。假如把获得的实际权力当作政治家成功与否的尺度,那么马相伯只好被看作不成功的政治家。

可是普通的中国人衡量政治人物的价值,还有别的尺度,包括道德、学问、文章等方面的个人表现。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家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他以百岁高龄去世,那时人们一致称颂的,正是他的个人品格。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他越到晚年越有政治声望的由来。

1. 局外旁观者

马相伯在三十五岁以前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马相伯从十二岁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此后十九年,他一直在教会内学习和任职。耶稣会的戒律不允许神职人员直接参与世俗的事务,马相伯对中国政治只能采取旁观态度。

上海不是静修的胜地,却是旁观政治的前沿。自从1842年上海根据清英南京条约被辟作对西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那以后它就很快由一个江南小城变成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不仅如此,以后许多年,由于清政府顽强地抗拒西方国家在北京设置外交使馆,上海又成为中国主要的外交活动舞台。

还在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清帝国的官员和学者讨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大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西洋人所以能战胜天朝,无非因为"船坚炮利",所以只要学会制造坚固

的军舰和新式的枪炮,便能对付这班野蛮人,这就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不知道少年马相伯有没有读过根据林则徐的意见写成的这类著作,我们只知道马相伯刚到上海便十分注意观察外国人的技术发展程度。他首先表示不佩服西方的医疗技术。这不奇怪,中医讲究辩证施治,而西医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付皮肤病就用烙铁去烫脓疮,这在从小熟悉父亲医术的马相伯看来,当然是野蛮而幼稚的方法。他接着不佩服的是外国的军舰。有天随徐汇公学的教师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外舰参观,马相伯特别留心西方的大炮,发现其装置与中国的土炮,没有什么差别,不禁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清朝被英国打败,是由于技术不如洋人的解释,表示怀疑。

怀疑在马相伯的青年时代更加深了。1853 年春天来自南方的拜上帝会的造反大军占领了南京,宣布它是“天京”即天国的首都,随即又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各大城市。各省的官僚绅士富商纷纷逃到上海。然而旧上海县城也出现了头裹红巾的由广东帮会“小刀会”为主的造反者,很快控制了市郊的农村,剩下的安全区只有英、法、美等外国殖民者统治的“租界”。徐汇公学设在法租界的西南边沿,没有受到“红头”攻击,却给年轻的马相伯提供了一个对比两种统治的机会。

所谓耳闻不如目睹,马相伯在长达五年多的旁观时期,还曾私自冒险钻进小刀会控制的城区,却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市容反而更热闹了,居民生活得很自在。对照之下,租界内的华人,尽管身在安全区,却缺乏安全感。这不能不使马

相伯思考。他没有想到租界设置是否合理,但想到了“长毛”、“红头”,是不是像官绅们形容的那么坏?相传1860年,二十一岁的马相伯,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目睹了正在教堂作晨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同一位教民的谈话。这位乡村居民惊问那位赫赫有名的天国“王爷”,“也信上帝念耶稣经”?李秀成只是报以和蔼的一笑,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亵渎了他的尊严。看惯了清帝国官吏在平民面前耍威风的马相伯,从中得出怎样一种反面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马相伯的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八年(1580),但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谁都知道利玛窦万历十年才从印度果阿来中国,过了十多年才到达南京传教。在这一点上,方豪比较慎重,他在《马相伯先生事略》一文中,只说“马氏久奉天主教”,而不说究竟有多“久”,很含糊,却比较合乎历史。

鸦片战争结束了清帝国的禁烟史,也结束了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尊重。1842年耶稣会重新来华负责江南教务。昔日照管江南教务的澳门教区的葡萄牙人,唯恐得罪清帝国而损害自己的世俗利益。如今的法国人却极力逼迫清政府来扩展自己的“精神”利益。当然,1814年在欧洲重新恢复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吸收信徒,并且急于迫使中国信徒放弃“异教”的文化习俗。

因此,马相伯身在耶稣会,要对本国政治做个旁观者也不容易。但马相伯的尺度,有一个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政治的现状是否对中国有利。

马相伯的传记,都提到他曾拒绝就聘为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翻译,理由是:“我学法国话,是为中国用的。”这种态度,不会得到耶稣会在华当局的赞赏,他们认为马相伯有“排外”思想。

其实马相伯的“为中国”态度,与晚清的中国一般士绅的“爱国”是有区别的。他不认为中国等于某一王朝,因而也不认为爱国必须忠君。他在徐汇公学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欧洲语言,除了学习宗教经典,还读了很多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著作,深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影响。他后来总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总是强调国家是个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总是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这都应该说是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

因此,马相伯和他的弟弟马建忠,在徐汇公学读书时,对于外籍耶稣会士往往表示十分反感。马建忠曾随马相伯一起入修道院,“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退出”,后来去巴黎留学,“有以白种人自傲者,必折之使服”;马相伯终于脱离耶稣会,也由于“他对外国教士的不满意”(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等)。既然在教会内部都难以忍受事实上的种族的或民族的歧视,那就更难怪马相伯对于本国的政治会用超越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例如前述他对清朝和太平军的比较,便超越了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犯上即作乱”一类的观念,而把君民或官民是否平等作为尺度。在他看来,有利于平民就有利于中国。从这一点来说,马相伯在早期作为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已经

开始显露他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取向。他反对种族歧视,在有白人优越感的某些传教士看来,就是有“排外”思想。但他又“排内”,也就是反对同国籍同肤色的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平等,而同情受压迫受苦难的底层人民。这正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马相伯的一生的起点。

2. 从总督幕僚到国王顾问

马相伯在1876年放弃神职到1897年重返教会,中间共二十一年。

还俗的当年,马相伯便下了“宦海”,就是说登上了清帝国的内政外交的舞台。

马相伯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大半时间扮演的角色是幕僚,充当达官显宦的顾问或参谋。清代的幕僚或幕友,聘用与否和待遇如何都由官员个人决定,相对地说不受资格限制,但必须是名士或专业人才,特别是同聘用者有“关系”。

据说马相伯曾为县学生员。这是否事实并不重要。马相伯即使曾中秀才,这身份也并非做官的保证。

然而马相伯没有功名,却有“关系”,同“淮系”官僚的特殊关系。

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的粮道,即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马相伯在1876年进入其兄密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正是“关系”在起作用。

山东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省布政使必须从事李鸿章所热心的“洋务”,兴办各种新式

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以及办理对外事务。马相伯饱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自然成为余紫垣幕中最受器重的人才。据他晚年回忆说,余紫垣在署山东巡抚(代省长)期间曾委托他处理布政使的日常工作。这事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尚未发现佐证。不过余紫垣曾经委派他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则是可信的。这个"洋务"军火制造企业的局长,属于洋务派高官的幕僚亲信垂涎的"肥差"。但马相伯却不懂做官的秘密,他把这个混乱的企业整顿得可以正常生产了,而在北京的上司却怎么也不相信他呈报的造价属实,于是他只好辞职。接着,他由李鸿章委派,再往山东调查矿务。先后在山东三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

另一个"关系"使马相伯成了外交官。1881 年 4 月,曾在清廷驻法使馆与马建忠同事、并交情甚好的"洋务"名流黎庶昌,做了出使日本国大臣,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但这年秋天,他回国看望病中的马建勋,便被李鸿章留住了,被派往朝鲜。

怎么回事呢?又是由于马建忠的关系。原来,马建忠赴法国,是由李鸿章选派的,一面任职于驻法使馆,一面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仅用三年,于 1879 年居然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李鸿章门下荣获"洋进士"头衔的第一人。马建忠在法期间,事事都要超过白人,不但学业要争第一,连付房租之类小事,都要同白人相争,这虽使马建忠的房东太太气得发昏,却使"中堂大人"乐得拍手,认为马建忠替华人挣足了"面子","为外人所敬重"。那时清帝国推行"洋务"的三

大领袖,“湘系”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已老,唯有李鸿章最具实力。他也确有所谓“现代化”的眼光,看到帝国“自强”的出路,不仅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及造船工业,还需要建设从采矿、冶金到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马建忠回国,立即建议兴建铁路,以为这是“洋务”的关键,而资金困难可通过借“洋债”解决。这正搔到了李鸿章的痒处,因而更把马建忠看作奇才。回国不到一年,三十五岁的马建忠,便被清政府列名为二品衔的驻外使馆的候选人。当然李鸿章无意让马建忠离开他的幕府。他如此保举马建忠,是为了使此人能以高级官员身份代表他过问涉外军政事务。

马相伯受到黎庶昌的青睐,肯定使李鸿章不悦。贵州才子黎庶昌,早就名列“曾门四弟子”,跻身外交界则出于郭嵩焘的提携,属于湘系官僚。那时帝国驻外使馆诸官员,都由使臣遴选,也等于使臣的幕僚。马相伯赴驻日使馆任职,按照当时的官场积习来看,就意味着湘系挖取淮系的人材。马相伯回国探亲时,适值李鸿章派马建忠往南洋诸地与英国殖民当局办交涉,而感到“正缺人手”,所以一见马相伯便命他随同北上。那时李鸿章名为大学士,但所兼北洋通商大臣,在体制上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他只用一句话,便取消了由总理衙门批准任命的一名驻外领事职务,从现代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却是中世纪式政坛的平凡小事,比这更古怪的现象不知凡几。

马相伯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外交官变成直隶总督府幕僚,又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幕僚变成帝国藩属的国王顾问。原来朝鲜正受日本侵逼,李鸿章便出主意要朝鲜政府与欧

美列强签约通商,借以制约日本,也就是"以夷制夷"。帮助实施这个对策的,就是马建忠。1881 年冬天马相伯随李鸿章到天津,朝鲜国王派来迎候马建忠赴平壤任顾问的专使已在等待了。李鸿章当即指着马建忠的这位二哥对朝鲜使者说:"他可以代眉叔(马建忠字)去走一趟。"于是,马建常(马相伯本名)便作为他的幼弟马建忠的替身,赴朝鲜担任国王的新政顾问。

关于马相伯在朝鲜的活动,除了他本人晚年回忆《一日一谈》外,直接作证的中文材料,仅有马相伯亲笔修改过的两份文件底稿。奇怪的是马相伯既然作为帝国派驻属国的高级代表,在朝鲜的身份又是国王顾问,怎么清政府的官方文件,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光绪朝东华录》保存了 1881~1882 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朝鲜问题处理过程的多份奏疏,甚至这里面也只提马建忠而不提马建常,为什么?通过多种记载的互相比照,我才明白其中奥妙,那就是第一,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派往朝鲜的正式顾问是马建忠;第二,李鸿章指定马建常即马相伯前往朝鲜,确实让他充当马建忠的替身,就是说马相伯赴朝鲜任国王顾问,只是出于李鸿章本人的指派。所以,他既然不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驻属国官员,也就没有代表宗主国干预朝鲜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权力。在他任顾问期间,朝鲜与美、英、法、德都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因宫廷政变而招致清、日政府都派兵干涉,代表清政府出面监督和处理的,都是马建忠。马建忠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从清理历史事实的角度看,以高拜石《记丹徒马氏兄弟》(《古春风楼琐记》第十三篇,1966

年台湾《新生报》连载)一文,根据中、韩、日三方记载所作的陈述,最为可信,而其中便不见有马相伯出场。以往马相伯的传记研究,多半过分夸大或渲染了他在朝鲜"办外交"的作用。

这当然不是说马相伯在朝鲜没有起过作用。问题是有两个因素限制了他演好国王顾问的角色。第一,他这个角色是李鸿章导演的,但李鸿章在1882年3月突然因其母病逝而离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职位由淮系官僚张树声代理;这就使马相伯作为李鸿章个人意向的体现者的重要性大大减弱。第二,他这个角色的活动舞台是朝鲜的宫廷,而那时朝鲜的宫廷政治状况,比宗主国还糟。国王的生父李昰应被尊作大院君,利用国王年幼而专制国政达十年之久,这时却由于他的权力据点被国王的正妻闵妃的家族一一夺去而恼怒不已。美貌的朝鲜王妃很有政治手腕,她利用国人对大院君执政时期腐败政治和锁国政策的不满,声称也要办洋务新政,并以此获取宗主国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一派的支持。可怜的国王性格懦弱,夹在宠妻和生父的中间,不知如何是好。马相伯正是在两派冲突日趋剧烈之时到达朝鲜的,正如他在《我与高丽》(见《一日一谈》)中所说的,"原来高丽政府分两派:一派以大院君为领袖,反华亲日;一派以闵妃为之魁,反日亲华"。他立即发现自己与国王一样,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

由于直接的记载缺乏,我们甚至说不清马相伯抵离朝鲜的确切时间。根据他晚年的回忆,他曾努力地想演好自己的角色,帮助朝鲜政府办理"新政",甚至还主持训练新

军。现存的一份《上朝鲜国王条陈》,呼吁朝鲜国王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从九方面进行内政改革,虽然意见并不新鲜,却证明他是忠于顾问职守的。他与国王夫妇的关系都很好,曾建议闵妃送九岁的王世子去西方留学,以成未来真能领导改革的国王。然而“高丽政府暮气已深,余虽拼命地卖气力,他们始终口是心非,敷衍搪塞。举凡我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开头时他们莫不一口应承,即时兴办;然而过了两天再去问他,则又喃喃然答道:‘容再商量’,于是百般计划都销磨于无何有之乡了!”与此同时,朝鲜宫廷政争的白炽化,使他的希望变成失望。

1882年7月,大院君发动军事政变,煽动不满于世袭权益被削弱的旧军人占领王宫,大杀闵妃一派并囚禁国王父子,还焚毁日本使馆和杀害日本教官。根据马建忠和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建议,张树声迅速派提督吴长庆率军入朝鲜,抢在日军之前,擒住大院君并恢复了汉城的秩序。据马建忠日记(见《适可齐纪行》卷六),他在平叛后回国抵达山东芝罘,见到了马相伯,可知马相伯在政变期间回国避难。因此清政府在事后封赏平叛有功人员达四十余人,而不及马相伯,是合乎情理的。但马相伯显然在乱平后又回到汉城,只是角色有变化。由现存《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表明他同朝鲜宫廷的友好关系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互相猜疑和争吵,他本人行动也必须受到吴长庆军的武装保护。这时是1882年冬至1883年春。既然没有“新政”可以帮办了,他留在朝鲜还有什么必要呢?

值得注意的是吴长庆部下一名小参谋,非但在镇压汉

城叛乱中初露头角，由中书科中书升任同知（副知府），官升五级，还捅了马相伯一刀，向吴长庆密告马相伯在官舍狎妓。事情被证明乌有，他又联合另一名幕僚张謇（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企业家）替吴长庆划策攻击马建忠，说大院君政变后朝鲜政府被迫同意向日本赔款及同意日军驻汉城，都是马建忠"任性妄为"的结果，于是清廷中权力者借机整了一下李鸿章和张树声。据马相伯说，这名年轻无赖，起初正是由他向李鸿章推荐，才实任驻朝鲜商务委员，从此脱出穷困潦倒境地的。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袁世凯。

于是，马相伯只好离开朝鲜，重返李鸿章的幕府。据《一日一谈》，马相伯在1883年回到天津，仍然要求李鸿章及早决定保全朝鲜的对策，谁知李鸿章竟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马相伯因而说出了一个常被引用的判断："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3. 失败的内外使命

马相伯和马建忠真是难兄难弟。他们参与朝鲜事务，以不同身份替清帝国出了力气，却都没有得到报偿，反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猜忌与攻击。他们刚从这里脱身，又双双卷入了招商局事件。

招商局即"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发起创办的近代化企业，属于官商合办的航运股份公司。然而晚清的所谓新式企业，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都极难实行工业化世界的经营原则和管理制度。官办官僚化，商办家族化，而中世纪式

的官僚体制,本来是家长专制的延伸。所谓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的企业,没有了家族式的商办企业那种由业主切身利益而导致的潜在危机感,控制者更以损公肥私为能事。招商局成立十多年,经营的扩展与亏损的严重恰成正比。它的总局设在上海,而分局遍布内地、香港和南洋各地,拥有轮船二十多艘,由于主要承运政府漕粮而货源稳定,却每年需要政府补贴白银八十万两左右,才能勉强维持公司生存。

李鸿章是官场老手,深知招商局办不好,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但苦于没有熟悉西方企业管理的能干人材,去对它进行整顿。马氏兄弟在朝鲜出了力而备受攻击,显然是代他受过。尤其是马建忠,刚被清廷表彰援朝有功,紧接着便奉旨查处是否有出卖朝鲜的嫌疑,这更使李鸿章不安。1884年,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副总裁,以往研究者都说是"总办",即总裁,马相伯晚年也屡作此说,不确),主持全局业务,并派遣马相伯前往国内主要分局检查财务,应该说兼有整顿招商局和重视马氏兄弟的用意。

马相伯的调查结果是题作《改革招商局建议》的给李鸿章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留下残稿。方豪说它作于1885年,不确切,因为1884年8月李鸿章已被迫上长篇奏折,替马建忠在招商局事件中的行为辩护。

原来,1884年7月,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到中国本部。法国侵略者的炮舰,要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的漕运出路,并且扬言要劫持招商局的海轮。这使招商局的董事会感到惊慌。于是在马建忠的主持下商定,不妨按照

国际惯例，把招商局全部产业转移到美商旗昌洋行名下，用外资企业名义继续营运，条件是事定后由中方以原价收回，但给美商以丰厚的“好处费”。不料这一决定传到北京，在清廷内立即引起一片谴责声。谴责者有的是坚持一概排外的守旧大臣，有的是嫉视洋务新政的清流党人，更多的是觊觎招商局这块肥肉的达官贵人。他们的矛头共同指向马建忠，眼光却共同盯住李鸿章。他们通过总理衙门，用传达圣旨的名义，要求李鸿章供认从这笔交易中捞到多少好处，但旗号是捍卫帝国主权。事态如此严重，以致在北京官场中，把马建忠称作“小汉奸”，那意思即李鸿章是“大汉奸”。

在晚清很少有贵胄大臣能同李鸿章相比，一大原因就是凡真心实意替他办事的助手，都不必因他称道过自己是他的左右手而危惧，因为知道他不会在困境中效法壁虎断尾。果不其然，李鸿章是否事先了解马建忠“出售”招商局的决定，虽经马相伯晚年再三回忆仍难以确认。例如马相伯于 1932 年向凌其翰口述的《六十年来之上海》，曾说马建忠“奉了李鸿章的命，去和旗昌洋行商量”，“其实这是李鸿章的急智”。但 1935 年的口述回忆录《一日一谈》则说，“李中堂在天津听说，我们把招商局轮船押给旗昌洋行了，莫名其妙，打电报来叫老三（马建忠——引注）去，老三不能分身，遂叫我到天津去告诉李中堂，为什么要押船的理由，中堂这才放心”。但无论李鸿章事前知与不知，他是了解马建忠此举，对中国权益利大于弊的。今存李鸿章为此事上皇帝书，就证明他承担了授权责任。不待说，他也明知当时外交纠纷层出，清廷离开他还不行。

那班因反洋务而暂时结盟的势力当然不甘罢休。1884年9月有道上谕，说是“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需人”，要求李鸿章立即密令“熟悉洋务”的马建忠赴京引见。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这时清流党主要人物黄体芳已多次上疏控告马建忠是“洋夷奸细”，非处死不可，而当时北京刑场菜市口的摊贩们，甚至纷纷收摊等待观看刽子手杀马建忠的头。但马建忠到了北京，又奉旨说皇帝取消接见，命他即返天津。这使仇洋排外的官僚和市民都很失望，也可见马建忠和马相伯在当时承担的风险。

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终于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和约而结束。马相伯再次作为其弟马建忠的替身，出面同美商旗昌洋行谈判，在1886年正式收回招商局的主权。有趣的是这个旗昌洋行，不久便因过度亏损，而将产权卖给了招商局。

就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四个月，1885年10月，帝国政府决定把台湾府升格为行省，任命淮系将领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马建勋的朋友，得知马相伯的行踪便邀他赴台湾，很明白是为了替亡友的兄弟谋出路。但马相伯不领情。虽然武夫出身的刘铭传在台湾很重视文治，马相伯仍以为他旨在沽名钓誉，挖苦地说刘铭传保荐自己“学贯中西”，无非是因为自己陪他下围棋输多赢少的缘故。

在赴台前，马相伯路过香港至广州，曾向两广总督张之洞献策，主动设置九龙为商埠，建筑由广州通往九龙的铁路，作为对外贸易的通道。可惜张之洞缺乏较开阔的近代化眼光，也许还夹带着清流党人对信洋教者的成见，没有理

会马相伯的建议。马相伯从台湾返回天津,又向李鸿章重提开辟九龙为商埠的建议,深得李鸿章赞赏。然而李鸿章又因广东是张之洞总督的辖区,不便出面,以免碰总理衙门的钉子。英国殖民者倒是很快发现了九龙的商务战略地位而予以吞并,并迫使清政府同意兴筑广九铁路,从而使香港成为南国对外贸易要津。这是马相伯终身引为"恨事"中的一件。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马氏兄弟说动了李鸿章,可以向美国贷款,设立银行,不仅解决兴办海军所缺乏的经费,还可以为各项新政提供经费。李鸿章决定派遣马相伯赴美国筹集资金。这事不见于清代的官方记载。然而马相伯晚年的多次回忆,如陈乐素于1930年笔记的《相老人八十年之经过谈》,前引《六十年来之上海》、《马相伯国难言论集》,以及1937年刘成禺的《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钱智修的《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等,都述及此举。以后更得到马相伯早先"家书"手稿的印证。因此,下述马相伯的回忆应属可信。他说,李鸿章原定的借款数额是二千五百万两银子,没想到他抵达美国,不仅受到国宾待遇,还抵挡不住美国投资者的热情。短期内就有二十四家银行愿意向清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总金额竟达五亿。吃惊的马相伯打电报请示李鸿章,不料回电显示,李鸿章更被吓坏了,说是"办法甚当,而朝议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

不过这事仅见于马相伯晚年的回忆,而回忆的相互记载有出入。譬如说借款的金额,"家书节录"第六十五函,说是赴美"拟纠合华美银行,一席酒后,便得二万万有五千美

洋”。此函约作于1918年美军抵欧洲参加对德作战之后。但后来他的回忆,却说是商定借五亿两。但无论如何,他在1885年赴美筹借到的款项,数额太大而条件优惠,致使清政府的官僚们转而怀疑李鸿章是否与“洋鬼子”暗中做了权钱交易,结果吓得李鸿章不敢接受,应该也是事实(说是“应该”,是由于还没有找到当时中美官方记载作证),否则他不会记忆如此深刻。

因而马相伯一再说他当时进退维谷,也应该是可信的。主动提出贷款,人家积极响应,突然又不守协议,怎么向美国投资者交待?于是饱受西方教育的马相伯,只好求助于中国传统计谋的最后一招,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着”。他先装病不见客,随即悄悄溜出了美国,至于天真的美国人是否因此觉得中国人不讲信用,他就顾不得了。

这个贷款事件无疑给马相伯以很深刺激。他有次重忆此事,便说:“清季外交的失败,半由于满廷官吏懵然于国际情势,应对无方,动辄得咎,至于清季外交界之腐败无常识,举动荒谬,腾笑列邦,实在罄竹难书!”这是来自经验的沉痛概括。所以他狼狈离美之后,没有直接回国,却去漫游西欧。

他到过伦敦、巴黎,又跑到罗马,在梵蒂冈晋见过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他那时还没有重返教会,是否他曾钻研神哲学,因而引起号称最后一名老托马斯主义者的利奥十三的晤谈兴趣,还不清楚。这是他毕生唯一的一次欧洲行,没有肩负政治使命,却有可能在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实际比较中从容思考。他究竟由这回“行万里路”得到了怎样

的教益？他在晚年也曾零碎地谈起。例如他在英国曾参观牛津、剑桥等名校，对于英国因袭欧洲大陆传统，重视古典文化教育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巴黎考察法国民俗，发现中国布帛磁器仍深受法人喜爱，因而感慨中国的政府与商民都不懂改良工业和外贸方法，否则必能占领海外一部分有利市场。他曾据亲身见闻，盛赞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也在批评拿破仑第三侵略中国的同时，指出此人的政治的军事的才能"实在也不可厚非"。此外可能还有别的思想收获，但由于缺乏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在1887年自欧洲返华，在政治上曾销声匿迹了好几年。这以后清法、清日战争相继以失败告终。就在两次战争之间，1893年，他的妻子死了。1895年李鸿章被迫代表清政府，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马建忠作为随员目睹了屈辱和约的谈判过程。正在这时，他的母亲又去世。据说是接受母亲的临终劝告，他重返教会了。但谁知道他们联袂"退隐"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对清帝国统治的失望呢？

4. 君主立宪派领导人

马相伯再次现身于政治舞台，已在十二年后。这回他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清政权中一个派系领袖的秘书或参谋，而是清政权的一个反对派别的名义领袖。这个反对派别，就是1907年10月中旬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政闻社"。他应这个君主立宪派团体的组织者梁启超的邀请，前往东京就任政闻社的"总务员"，相当于政党的总书记。次年初政闻社总部迁到上海，同年8月25日被清廷查禁，十天后

宣布解散。马良(马相伯名)共做了十个月的总务员。

很奇怪,马相伯的晚年似乎把这段经历忘记了。根据他的回忆串联而成的若干传记,如夏敬观的《马良传》,张若谷的《马相伯先生年谱》等,或只字未提,或说他1907年东渡日本是为了平息那里的留学生学潮。即如方豪,搜集马相伯的文稿信件虽多,也多次以讹传讹,直到晚年修订的《马相伯先生事略》,才予以订正,但依据的似乎只是赵丰田对张若谷所作《年谱》的一段批评,也没有得知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已有政闻社始末的详尽资料,更没有查阅1907至1908年的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等资料。这里有必要就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一番简要陈述。

马相伯初识梁启超是在1896年。这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结识了仰慕十年的马建忠,也结识了马相伯。那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而马建忠四十八岁,马相伯则已有五十七岁。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交"。马建忠的名著《适可斋纪言》《适可斋纪行》,在这年结集,便请梁启超作序。而梁序盛赞这两种著作,"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甚至说如果帝国当局早用其言,则清法、清日战争的耻辱结局就不会有了。

马氏兄弟对梁启超都十分赞赏。《时务报》是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改革派人物联合创办的民间刊物,一出版就风行全国。其中梁启超的论文最引人注目,他很快成了维新运动的舆论明星。但马相伯又很惋惜梁启超对近代西

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肤浅，以为他应趁年轻学好一种欧洲文字，不该太早卷入实际政治，并因而责备极力扶植梁启超问政的黄遵宪是孔子早就指斥的子路那样的冒失人物，所谓“贼夫人之子”，在年轻人学业没有成熟前便急于让他从事政治活动，不是爱护他而是戕害他。于是梁启超决定学习拉丁文，而马建忠也自愿充当义务教师。从这时起，梁启超只要在上海，便与康门弟子麦孟华等，每晚前往马宅学习拉丁文，当然也纵谈时事。也由于马氏兄弟的介绍，梁启超相继结识了徐建寅、严复、盛宣怀等一大批所谓洋务名人。因而，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即自称达尔文的“咬狗”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中文改编本，还没有出版就已被梁启超读到。严复借此书宣传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个“天演”公例，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迅速被拥护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维新变法”和后来的“排满革命”的哲学指导，也同梁启超的努力介绍有密切关系。有趣的是马相伯作为天主教徒，经常表示反对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但他去世前也与赫胥黎用了同一譬喻，说是“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谁都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是卑视狗的，将人称作“吧儿狗”、“走狗”等意味着侮辱，而马相伯居然自比为狗，岂不是赫胥黎的理论早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则佐证？

马氏兄弟似乎都没有直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变法”宣传活动。但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等记载，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曾请法国驻法使馆向天主教的江南主教转达一项要求，即同意马相伯出来主持

新政拟办事业之一的译学馆。据说马相伯表示同意,但要求清政府将译学馆设在上海,并延聘徐家汇的耶稣会士襄理馆务。

1898年的政变,使支持改革的光绪皇帝成为慈禧太后手中的囚徒,也使康有为、梁启超成为长期流亡海外的保皇党领袖。马氏兄弟没有受到政变的株连,但马相伯筹设译学馆的活动,刚开始便告终。紧接着北方闹起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逃亡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被迫起用李鸿章主持“和议”。李鸿章途经上海,立即要求马建忠再度担任他的外交助理。马建忠冒暑翻译文电,突然病逝。一年后即1901年,李鸿章也在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去世。马相伯真的孤立了。

但在上海的新派朋友没有忘记他。应蔡元培的要求,马相伯接受了南洋公学的一批学生,开始从事世俗教育。由教授拉丁文为起点,而扩大设置震旦学院。1903年他又同情震旦学生中反对欧洲教士强迫遵守教规的那些青年,支持他们另办复旦公学并出任校长。这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它的头几届学生中,曾经出了如于右任、邵力子那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曾经出了如陈寅恪那样著名的学者。与此同时,他在上海还相继支持建立了大同大学和几所女校。

梁启超在1898年秋天逃亡海外以后,成为康有为创办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俗称保皇会的二号领袖。但老师康有为虽懂得把皇帝作为吸引海外华侨资金建立公司的信托,经营却并不顺利,他在美洲的投资,非无效即失败。相反学生梁启超在日本的事业倒是相当成功,他主编的《清议

报》仍然在国内秘密流传,他的朋友如唐才常等仍然在国内积极活动。

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及其政府赶出北京以后,国内一批改革派名流聚集上海,举行“国会”,讨论中国的前途等问题。这是他们要求中国实行议会民主的一次预演。接着上海国会的组织者唐才常便在武汉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起义,这次打着保护光绪皇帝旗号并使唐才常丢了脑袋的起义,同上海国会一样,幕后导演都是梁启超。马相伯没有参加国会,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这时仍和梁启超有直接联系。有的传记说梁启超在1902年曾再次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如方豪在台湾《大陆杂志》发表的《马良先生事略》),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梁启超仍在关注马相伯的动向,则是确实的。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题为《祝震旦学院之前途》的署名文章,热情称赞马相伯创办这所专以研究人文学科为目的之私立学校,给中国青年“广求新知识于世界”提供了基础教育。

这以前,即1902年,清政府已迁回北京。自感“纸老虎被拆穿”的慈禧太后,急于向列强表示她对支持义和团排外行为的忏悔,接连颁布了一系列许诺“维新”的诏书。马相伯于是打破政治沉默,强调说要洗刷列强“夺我疆土,凌我黎民,占我政府,拒我使臣”造成的国耻,然而“中国若不图强则已,苟欲图强,必以开铁路为枢纽”。

马相伯将发展铁路事业看作“转移国是”的最大关键,强调“以中国财,办中国事”。在二十世纪初,铁路由政府做

主交给外国人办，还是由地方绅商集资自办？这一直是帝国当局和地方士绅争执的焦点。为了“保路”，形成了地方议会的雏形，并进而要求清廷实行立宪以限制统治者的专制权力。所以，马相伯从主张铁路经营自主权出发，成为江浙士绅敦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活跃人物，就是合乎逻辑的。

在1898年10月逃亡海外以后，梁启超很久拿不定主意，是继续追随康有为“保皇”呢，还是同孙中山一派合作“逐满”？他的摇摆的中止，却是双重的后退，既公开反对“排满革命”，又暗中脱离“保皇”即反对慈禧太后的立场，就是说要成为合法的反对派，促使这个政权由君主专制和平演变为君主立宪。1906年9月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名义通告全国“预备立宪”，梁启超迅速作出回应，说服康有为同意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对于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满洲特权阶层来说，这个政敌化作盟友，甚至更可怕。因为梁启超的策略很明显，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立宪”许诺，设法弄假成真，那代价当然是皇室权贵的世袭特权必须受到愈来愈多的制约。

然而马相伯显然赞许梁启超的转变。1907年夏末他给英华即英敛之的《也是集》作序，大谈立宪，没有只字提到梁启超，但劈头便强调实行立宪是举世公认的“国民权利”，“故我国不言立宪则已，言立宪而不虚心‘预备’，言‘预备’而不实力奉行”，就和不讲民权的野蛮民族或殖民地没有区别。接着马相伯针对满洲亲贵替慈禧太后的假立宪诏书辩护的三大理由，逐点予以驳斥。第一他们说诏书所以不规

定立宪的“预备”期限,是因为人民的程度太低,需要时间训练人民怎样实行宪法。马相伯说,错了,人民的权利观念差,正是暴虐政治的恶果;立宪本身就是明确人民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宪法亦能造国民”;借口程度不够而继续褫夺民权,无非要使人民永做奴隶。第二他们说制订宪法有西方先例可以仿行,政府完全能够胜任,用不着通过普选召开议会。马相伯说,又错了,Constitution 的原意就是“共立”(共同构造),人民只有选举能够表达自己意向的代表参加制订和修改宪法,才能保障应享的权利和明确应尽的义务。第三他们说立宪既是政府的事,更用不着报馆说三道四。马相伯仍然说,错了,报刊和议会都是沟通民意、监督政府的机构,都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只是一在民间,一在政界,相辅相成;拒绝实行新闻自由与拒绝实行议会民主一样,都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继续充当盲人聋人和哑巴。

以上驳论,假如与梁启超在 1906 至 1907 年发表的宪政言论对照,可以见到马相伯的见解不但相符,而且表达更简单有力。

不过马相伯应梁启超的邀请,于 1907 年 12 月中旬由上海抵达东京,就任政闻社总务员,则是明白地是为了帮助梁启超摆脱困境。

原来,政闻社筹备已近一年。筹备过程困难重重。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主要策划人杨度,先同意与梁启超合作,又中途翻悔。原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早已声名狼藉,梁启超若要自任政闻社党魁,一则必然冒犯康有为的权威,二则他仍是清政府通缉的国事犯,出任党魁必定妨碍新党取得合

法地位，三则是自从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结果是反对“排满革命”的《新民丛报》被迫停刊。梁启超历经辛苦，总算在1907年11月在东京正式举行政闻社成立大会。岂知同盟会的著名斗士张继、陶成章等率领大批留日学生冲击会场，大打出手，连梁启超也在逃跑中挨了耳光。

显然迫于内外压力，梁启超急中生智，想到要求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六十八岁老人马相伯出面帮助他渡过难关。那时马相伯正与上海一批士绅为了争取铁路民办权而忙得不可开交，但立即同意前往日本。可以想见梁启超多么感激。“此公之持积极主义，其勇更逾吾辈”，“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之最大之幸福也”，如此等等见于当时梁启超兄弟的私信，可知他们真是把马相伯看作政闻社抓到的一张王牌。

然而马相伯既非保皇会元老，又非政闻社实际组织者，临时被梁启超拉出来充当“总务员”，也只能享有虚名，是不消说得的。梁启超决定将政闻社总部迁至上海，一个理由是希望使马相伯成为“实际的总务员”。问题是他也无法控制他的同事们各行其是，于是马相伯只可能充当名义领袖。

不过马相伯加盟政闻社，也使这个组织增添了活力。马相伯东渡日本后，曾以政闻社总务员的名义发表长篇演说。他自少年时代便学习古罗马西塞罗的辩论术，似乎在年及六十八岁时才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这次演说，经过梁启超的记录润色，刊登于《政论》上，曾给革命派以很大震动，致使《民报》总编辑章太炎不得不亲自撰写《驳神我宪政

说》的长文，专门破除马相伯论证君主立宪有理的哲学依据。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读到这篇演说，见到其中“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二语，不禁击节赞赏，叹为“中国第一名演说家”。然而最令梁启超得意的，也许正是马相伯的加盟，使成员日益增多，甚至吸引了现职官员入社。但也许“福兮祸所伏”吧，正是担任清政府现职官员的一名社员的冒失行为，毁掉了政闻社好不容易取得的半合法地位。此人名叫陈景仁，是清政府法部主事，忽然在1908年7月以政闻社成员名义发电报，要求清政府在三年内召开国会，而且指名要求清政府将考察宪政大臣革职问罪，惹得慈禧太后大怒，除了将此人革职，还以“阴图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查禁政闻社，并下令通缉该社成员。政闻社被迫宣布解散，马相伯也就失去了他的名义领袖地位。

就在政闻社被禁的同月，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及议员的选举章程，次月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1909年10月成立的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名单中，没有马相伯，是可以想见的。但这并不表明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丧失了影响。相反，由于专制国政长达四十六年的慈禧太后，已在1908年11月与光绪皇帝同时死去，帝国政府的控制力越发削弱。摄政王的政府被迫屈从各省咨议的联合压力，于1910年10月举行了“资政院”的首次会议。这个资政院名为预备立宪的咨询机构，实则颇似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二百名议员半由钦定、半由民选。马相伯的姓名便出现在江苏省咨议局推选的民选议员名单中间，那时他又已回到复旦公学担任校长。这个资政院的活动，至今仍缺乏

研究。我们知道它存在的一年多里有两件事引人注意,一是迫使清政府把预备立宪的限期由九年改为五年,二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推举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同南方革命军议和。然后它就和清帝国一起在历史上消失了。至于马相伯作为资政院议员起过什么作用,同样不清楚,但他似乎没有出席这年10月推举袁世凯组阁的会议,因为接着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江苏军政府的成员中间。

5. 为了宪法和民主

1911年10月革命,使清帝国的统治体系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只有一个多月便有十四个行省宣布脱离清帝国而独立。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在三天内相继独立,并迅速组成江浙联军攻克南方政治重心南京,给清帝国的打击最重。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代表立即决定把南京作为拟议中的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这个临时首都的第一任市长即南京府尹,就是由江苏军政府都督委派的马相伯。

那时中国的南北双方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已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新独立的各省还是联而不合,各行其是,新旧地方势力为了争夺军政权力闹得混乱不堪。孙中山只做了四十四天临时大总统,便宣布辞职,让位给表示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紧接着就发生首都所在地的争论。南方政府组织的参议院,被迫同意首都仍然设在北京。

我们不知道马相伯做了几天南京"市长"。关于这段历史,马相伯本人记忆最深的,则是"和几百个鸡毛帚周

旋”——那时的革命军将领的军帽都插着一朵白色翎毛,因而马相伯戏称他们是“鸡毛帚儿”。他说,那时云集南京的新式将领们互相争功大闹都督府,只好由他出面泼冷水。他的说辞详记于《一日一谈》两则文字中,未必就是当时的原话。然而他指出“革命”为什么,为国家为民族呢,还是为自己而“自居革命的功臣”,却符合当时南京政府面对的实情。但除这事以外,马相伯还办过哪些事情,至今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民国成立后,他的职位已变成江苏都督府的外交司长,并由今存的一份布告《劝勿为盗》,得知他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还在代理江苏都督,代替原来曾任清朝江苏巡抚的程德全担任革命后的省军政首脑。

马相伯的传记作者们都很重视他的这份布告。的确,这位已届七十三岁的代理都督,在布告中既表达了他对专制君主的憎恶,也表示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专制之君,可以领土为私有;专制之官,可以所辖为私有。”现在是“民国”了,一切官员都应该成为“大众的公仆”,因而没有各级议会的决定,任何政府官员都不能假公济私,把属于人民的公产的土地随意处置。但传记作者们都忘记指出,这种孟德斯鸠式的政治见解,只对一个人有约束力,此人就是马相伯自己。那时的“革命”,已经显示有军就有权,有权就有法。此老居然对这班只知道中世纪的权力即法律原则的新旧官僚军阀,讲什么“三权分立”,岂非如同聋子对话吗?于是马相伯不得不下野。他何时卸任江苏代理都督,同样不清楚。不过不会迟于民国二年,因为这一年马相伯已应教

育总长蔡元培的聘请,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很快辞职,却是由于就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缘故。袁世凯与马相伯是三十年前在朝鲜的故交。马相伯一直讨厌袁世凯,但袁世凯没有忘记马相伯,不消说是觉得这位德高望重的耆老对他仍然有用。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特别在各省各部选派的成员之外,指定八人列席,其中就有马相伯。接着马相伯就获得了袁世凯赏赐的一连串头衔,除总统府高等顾问以外,还有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议员、平议院平政等。

假如不抱成见,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史,则不能不惊异当年鲁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中间唯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较对稳定统治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一个不如一个。革命如章太炎,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守旧如王闿运,叛变如刘师培,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加上有天主教背景的马相伯,诸如此类在信仰和政见方面绝不相同的人物,袁世凯居然都能容忍乃至利用,确实比他后起的段祺瑞、蒋介石高明。

在袁世凯企图利用而没有驯服的名流中间,马相伯既不如甘作囚徒也不屈服的章太炎,也不如表面顺从实则反袁的梁启超,甚至不敢像康有为、王闿运那样给袁世凯造成尴尬。由此可见他在政治上至多不过具有中国传统所谓的“中人”素质。

然而中国传统所谓的“中人”,本来指个人选择可上可下。马相伯尽管不敢在政治上公然反对袁世凯,有两点却

表明他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袁世凯在清帝国危难之际出卖清政府,利用南方政府没有站稳脚跟,由帝国总理大臣而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而变为正式大总统。下一步就必然如日本诱使他签订全面出卖中国主权条约的使者所说的,“愿贵大总统高升一步”,不消说就是由总统变为皇帝。

马相伯不是政治“鸟人”,没有落入正在得势的权力者的门庭,也许同他憎嫌袁世凯有关,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恪守自己的政治信念。中国俗谚有“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说法,但清末民初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而向袁世凯上书请求他“帝制自为”的事例多得很。这时马相伯虽然不敢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但第一他坚决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第二他不理袁世凯要求学术依附政治,而为建立独立的中国人文科学院即“函夏考文苑”而奔走吁求,这正表明他在困境中“取法乎上”的一贯态度。

关于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留下了1916年马相伯写作的很多文章,需要略加陈述。

这些文章至少有十篇以上,集中讨论宪法中应否规定国教的问题。马相伯坚持反对宪法规定把孔教作为国教。由于他的家族和本人的宗教信仰背景,人们很容易认定这种意见是天主教徒的偏见。马相伯确实有宗教偏见,他宣传宗教的论说,在教外人看来可以理解而难以苟同。但他对传统的儒学倒没有晚清在华传教士那种常有的偏见,而是如晚明的利玛窦、徐光启那样,对儒学抱着尊重而同情的态度。我不能判断马相伯的神学造诣的深浅,却可以指出

他的传统儒学修养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贯通。他熟读过《四书》,时常引用其中所载的孔孟言论,但只是以王阳明式的态度拿来为“我”所用,就理解的全面性来说不如徐光启。他也读过中国史著,时常引用历史的典故和名人的言论来支持或反对某种政见。但他最爱引证的是《墨子》、《公孙龙子》等古籍中的哲理,而他服膺的历史名人,首先是北宋的苏辙,其次是唐代的陆贽。而墨家、名家都曾与儒家辩难,陆贽、苏辙等人在中世纪也不算是儒家学者,正如他引用最多的古罗马政治家季宰六(Cicero,今通译西塞罗)并非基督教圣者一样。尽管如此,马相伯仍有资格从学术和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批评孔教论,因为他的主要对手康有为及其门徒、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一个是坚持复辟亡清帝制并成了历史伪造者,一个是中西学问都不通而且言行荒诞更胜过其师。而马相伯从捍卫民主政治和信仰自由的角度,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且同批评袁世凯以国家元首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一事结合起来,更使他在这场政治争论中处于有利地位。

这一争论并不新鲜。还在清末,革命和保皇两派的报刊,已就所谓孔教问题吵了十年。新鲜的是康有为、陈焕章等组织的孔教会,在民国既建后非但旧案重提,要求政府定孔教为国教,而且将它同民主共和制是否适合“国情”的问题联系起来。孔教会的总会长康有为坚持宣称民主共和不合中国的“国情”,并且与名誉会长、一个连《三字经》都没读完的文盲将军张勋一样,都拒绝剪辫子以表示他们的意向在于恢复清帝国。然而他们的复辟君主制的喧嚷,同样投

合袁世凯的心意。于是袁世凯在重用张勋大杀南方革命党人的同时,任命孔教会主任干事陈焕章做总统府顾问,并在把孙中山一派再度赶到海外流亡以后,亲率政府文武百官举行祀孔典礼,那就不奇怪了。

马相伯本来在专心筹办"函夏考文苑",这时也忍不住了。现存他亲笔拟订的《考文苑名单》,就有一条附注,指名把"说近妖妄者"三人排除在未来的科学院院士行列之外,其中就有康有为和替袁世凯设计祭天祀孔仪式的夏曾佑,另一人则为治学善变出名的廖平。但马相伯憎恶廖平的理由,显然在于廖平曾应邀出席孔教府第一次全国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所谓"孔经哲学发微"。1914 年 9 月袁世凯主持祀孔仪式前后,马相伯又公开发表《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一文,批评袁世凯不该违反民国"约法",否定不同种族、阶级、宗教的人民一律平等。文章写得很隐晦,一个原因就是马相伯仍在北京处于袁世凯的密探监视之下。

1915 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掠夺中国大量主权的秘密条约"二十一条"而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华帝国的锣鼓就公开敲响了。这年 10 月袁世凯迫使参政院通过法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后帝制复辟"合法化"。马相伯身为参政院议员,当然是出席参政院会议的。方豪曾在《马相伯先生文集》所收《民国民照心镜》一文的"编者按"内,说"袁世凯称帝时,其徒党曾伪造先生赞成之说,但先生此文上、中、下三段中,皆痛斥袁氏,读者可以恍然矣"。可惜方豪这个辩解靠不住。第一此文作于 1918 年,那时"袁皇帝"已死去两年,受到举国痛斥,马相伯

骂得再凶也无妨。第二马相伯作《国民大会说》一文，据方豪说是1916年所作，然而此说内容分明显示它是马相伯在参政院讨论《国民大会组织法》时的一件提案，其中第五项提出"大会所议之事，假令大会而欲改共和为君主制，可乎?"马相伯说可以的，既有比利时的先例，又有英国君主制可参照。尽管他把英国国王说成等于中国总统是为了把帝制复辟后的君主限制为"虚君"，但他确在参政院和国民代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时都没有投反对票，则并非袁党伪造的事实。

据方豪说，"袁世凯欲称帝，先生力争不听，密探已周布寓宅，乃化装买菜老家人，带一竹篮，逃出北平。"(《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五)这很有传奇色彩，可惜至今也得不到旁证。当时在北京曾化装逃出袁世凯控制的，成功的有两人，即后来发动讨袁战争的蔡锷和他的老师兼参谋长梁启超;不成功的有一人，即缔造民国的元老之一章太炎。没有任何记载说到当时马相伯也曾有这样的壮举。

马相伯在八十岁后曾多次回忆他的生平，无疑都是珍贵史料。然而老人往往记忆不清，回忆生平时又往往遗漏自身经历之外的真正大事，因而提供的材料可以供历史研究参考，但必须"征而后信"，就是说没有相应的直接记载作为佐证，则不能轻信。例如《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回忆李鸿章之死，说是李鸿章在1901年与列强签定和约后，每有新政建议都被满洲王公批驳，有天争论后愤怒回府，"连食粽子十九枚，大病不起"。李鸿章好吃糯米食品是有名的，而马相伯又曾长期担任李鸿章的幕僚，这则"秘闻"

似无可疑，岂知随即引起李鸿章之孙的抗议，说李鸿章死于内脏大出血，晚年甚至连糯米食品都不吃。其实马相伯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据袁世凯死后流播颇广的一则传闻，袁世凯称帝后忽然听说他最亲信的将军也背叛了，惶乱中连吃十几个大馒头而不自觉，从此病死，而马相伯显然记忆不清，张冠李戴。但方豪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摆脱“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因而搜集保存的马相伯的手稿最多，但作出判断时却唯恐损害他心目中的中国天主教徒“圣者”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予以辩护。其他研究马相伯的也有同病。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马相伯研究，虽然不像方豪那样具有宗教忌讳，但有政治忌讳。害怕承认国体政体讨论具有学术意义，因而避免涉及 1915~1918 年马相伯政论著作所表达的政治见解，这说来奇怪，实则不奇怪。

袁世凯做中华帝国皇帝，只有八十一天，便在全国反对声中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随即在 1916 年 6 月死去。但紧接着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没有一个不是袁世凯的老部下。段祺瑞曾赴德国克虏伯康采恩实习，在北洋军阀中堪称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在袁世凯死后出任国务总理，立即宣布恢复国会，继续制定宪法。1916 年 8 月国会在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部新的宪法草案，称作“天坛草案”。

表面看来，这部天坛宪法草案，又恢复了被袁世凯否定的基本准则，即重申中华民国“永为民主国”、“人民均为平等”。承认民主和人权是宪法的基础，不是很好吗？奇怪的是草案第十九条，出现了这样的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

道,为修身之大本。”所谓国民教育,指的是强迫性的初等教育。所谓修身,指的是人人必须具有的道德政治信仰。所谓孔子之道,当然不是指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办私学时教给学生的做人道理,而只能是已被1911年革命取消了的清帝国统治者肯定的那些中世纪晚期的伦理原则,例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妇女必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类。假如宪法规定这套道理必须成为全民道德政治教育的“大本”即理论基础,只许盲信盲从,不许怀疑批评,岂不是要国家返回中世纪君主专制的前奏吗?这一项列入天坛宪法草案,正是康有为、陈焕章和孔教会那班旧官僚政客活动的结果。他们有恃无恐,因为“辫帅”张勋在袁世凯死后已擢居北洋军阀的大军头,越发横行无忌。

针对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马相伯写了一系列驳论,共同主题就是人民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例如《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书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后》、《书请定儒教为国教等书后》、《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约法上信教自由解》、《宪法向界》,还有代天主教各教区信教公民草拟的“反对孔道请愿书”等,总共有十多篇。除请愿书外,有的是通俗小册子,有的是学术性很强的政论文,而且都是洋洋万言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说,1916年是马相伯一生中政论写作最活跃的一年。他的论敌,就是孔教会的康有为、陈焕章。

需要指出,马相伯不是这时首先驳斥康有为的。还在1915年9月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进入狂热之际,在上海便出

现了一家《青年杂志》。它的编辑作者似乎不屑议论帝制是非,却努力宣传科学和民主,公开提倡"破坏孔教"等等,并且一再刊文驳斥康有为提倡孔教和复辟帝制的言论,因而很快引起人们注目。这份杂志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迁到北京,改名《新青年》。它的主编就是陈独秀,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1916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胡适等共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我们不知道这位三十六岁的"新青年"和七十七岁老人马相伯是否相识。他们在宗教上没有共同语言。但都反对定孔教为国教,都反对强迫青少年尊孔读经,都提倡民主与科学。他们的分歧在于马相伯不赞成把革命理解为首先要破坏一切,但那时还没有凸显出来。相反,当《新青年》打着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以及所谓国粹和旧文学的时候,马相伯则扭住孔教会要把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这一点不放,坚持信仰自由实现政治民主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他仿佛与陈独秀们有默契,一则专攻要害,一则全线出击。

崇拜西塞罗的马相伯很懂得辩论术,善于抓住论敌的弱点进行批评。他熟知清末思想界的论战史。康有为的孔教论,本来是对德国马丁·路德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模仿,借口恢复儒家学说的原始教义,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康有为把孔子说成中国的耶稣,随意割裂穿凿儒家经典乃至伪造历史,早在清末就受到各派学者从不同角度的否定,连梁启超到后来也不再附和他的"保教"论。在这方面,马

相伯和陈独秀一样,都把康有为的经学主张看成是已经拆穿的纸老虎,而主要从反民主反人权的角度对其展开抨击。

马相伯认为,康有为等硬说孔子是宗教家,硬说儒学是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宗教,非但违反历史,而且否定人所共知的现实。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什么神都拜,就是不入孔庙拜孔子,什么佛道巫术的古怪道理都信,就是不信政府提倡的所谓孔子之道。即使清朝的皇帝官员乃至死后从祀孔庙的著名道学家,"大都孔亦拜,佛亦拜,拜了佛,仍不失其为尊孔子","虽将天下之教,一一崇拜,一一信从,于为名士、为名儒,一无所损";可见这些叫人信仰孔子的上流人物,都口是心非,自己并不真正信仰。

康有为等要在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的一则理由,即有欧美宪法的先例。马相伯驳斥说,第一中国传统所谓教,指的是饮食男女、伦常日用的守则,不是西方传统那种具有超越意义的信仰体系,因而从孔子以来所谓的教,其实是学,二者不能混同;第二,即使在欧美,政教分离早已成为潮流,不承认国民教育应该把超越性的神学作为修身的根本。"今日欧洲各国,若法、若奥、若义、若德等国,纷纷逐出学校中之耶教,置诸学校之外,即为此故也。何我国人尚不明世界大势之所趋,而必奉孔子之道,为国民教育修身之大本,且规定于刚性之宪法中,使之不可动摇哉!"马相伯嘲笑陈焕章的一个荒唐说法。陈焕章说孔教会所以坚持定孔教为国教,是因为考虑到中国若被外国灭亡,"入主中国者,必立孔教为国教"。马相伯说那可能是真的,但那时孔教也成了"外国教"。

中国俗谚说“姜是老的辣”。从清末到民初，抨击康有为的孔教论的论著不胜枚举，但没有人把这种理论与主张者的经济利益挂钩的。我们只发现马相伯作过如此揭露。

当年义和团曾宣称在华的欧美人士是“大毛子”，中国的基督徒则是“二毛子”，应该一概格杀勿论。十七年后孔教会的活动，使马相伯不由得想起义和团的先例。他说，假如规定教育的唯一根据是所谓孔教，则不信者“不谓之大二毛子，其可乎？犹不施以庚子年之杀戮，不成其为中华民国矣！”以后的中国史证明他的忧虑并非过虑，但1916年的中国环境仍然允许他假托大毛子和二毛子的对话，用嬉笑怒骂的口吻斥责天坛宪法草案的荒谬，并揭露“国教与国库之关系”。

> “大毛子曰：其关系人民之负担，殆有甚矣！西报载民国二年(1913)，有人呈请政府，令凡婚配者皆到孔庙，仿到教堂礼，每起收四圆，以四万万人数计之，一年婚配者可三千万，应收一万万又二千万圆。又凡纳妾者皆富户，初次征二百圆，以后依次加倍，计通国纳妾者，每岁不止二三万户，是收数亦颇可观。愿以一半归政府，余归孔教会。
>
> “二毛子不禁大声曰：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

这不是马相伯的夸张，而是陈焕章的算计，因而马相伯屡屡讥笑陈焕章，说孔教会与其奉孔子为教主，不如奉财神

为教主。陈焕章则从来不敢予以回应。

康有为和张勋被孔教会徒谀作文武二圣。笔者曾指出,在清帝国,“武圣”关羽的地位已超过“文圣”孔子。历史进入中华民国七年(1918),中国再次发生了“武圣”指挥“文圣”发动的帝制复辟事变。康有为紧跟张勋,用武力拥戴亡清末代皇帝重坐龙庭,没想到只有十一天,政变就失败了,比袁世凯做皇帝还少了七十天。在这次复辟事件中,康有为非但没有捞到孔教教皇的地位,只由武圣张勋封了个弼德院(上议院)副院长,却要成为这次政变的殉葬人,被迫逃到青岛,在德国人的庇护下郁郁而终。他从此被永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后来某些人怎样从政治上替他“翻案”。至于陈焕章,以后还依仗见风使舵的本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混了十年,做过北京孔教大学校长,然而终于也成为北洋军阀的殉葬人,在1928年后躲到香港,于1933年在寂寞中死去。

6. “民国民”的沉思

马相伯在1918年写了一部《民国民照心镜》,概括他从民国以来的政治见解。

这时中华民国虽然只有七岁,却已经换了五任总统,十名总理,遭受两次帝制复辟,打过三场全国性的战争,并且正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宁唯是,国家在清帝国被推翻后从没实现过真正的政治统一,而在上一年又再度陷入公开分裂,出现了两个国会,两个政府,双方都自称是中华民国的合法代表,正在酝酿新的内战。

行将八十岁的马相伯,已从北京回到上海。他在南北对峙中,既不支持北京政府,也不支持广州的军政府。“南风虽不竞,其足以致亡与北强同,容非一年半年所能解决者”(见“家书节录”二十六),这是他对当时的形势估计,着眼点并非哪一股势力更强些,而是谁能挽救中华民国。他的看法是双方都不行,因而他更认真地筹思有没有避免“致亡”的出路。

马相伯是个认真的人。他反对所谓孔教,却佩服孔孟所提倡的“士尚志”,以为孔子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说的“大丈夫”精神,很合乎欧洲宗教伦理所谓 La Liberte de Conscience 的精神,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故不志则已,既志焉朝秦暮楚,非人矣!”他十分憎恶中国读书人中间的这类“非人”,指斥他们“遇事接物皆无诚心”。显而易见,在他看来,陈焕章之流孔教会、孔道会徒众,多半就属于这类动物。结果,社会风气如此之坏,“举国崇拜大盗大骗,愈无耻,愈得意,尚何望来?”(均见“家书节录”)确实的,在近代中国的著名学人中间,马相伯的政见决不属于激进者流,但自从1911年站到共和一方后,他对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的必要性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民国公民,用普通公民的尺度来衡量民主共和制的问题和前景,这在当时政治家中确属罕见。

“八十老翁,宿抱外洋政治主义(即有人此有土节)办法,余非所知。”这是马相伯在1919年一通家书中的自白。其中夹注“有人此(斯?)有土节”,使我们可以断定,他所谓的“宿抱外洋政治主义办法”,指的正是他在1918年所著

《民国民照心镜》中所陈政见的出发点。

《民国民照心镜》,分上中下三篇,用汉语的文言文写成,白文(不含标点符号的文字)共一万八千字。八十老人,能够亲自写成如此长篇的论文,而且逻辑相当严密,是令人惊奇的。

全文导言很简短:“照心者,反躬自省也;镜者何?即一点灵光,‘民国民’所用以自照也;自照于‘民国民’三字,名与实相符否耶?一照何谓‘民国’,二照何谓‘民国’之‘国’,三照何谓‘民国’之‘民’。”

灵光原是禅宗的术语,意思是人人固有的灵性光明。十七世纪后入华的耶稣会士,借用它来指基督教经院哲学所谓的灵魂的认知职能,并把这种职能比作镜子,后者同样是中国人爱用的譬喻。然而,马相伯提出,身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应该自我反省“民国民”三字所涵泳的概念和事实的相关度,所谓“名与实相符否”,却是非神学的问题。就概念和事实的相关度而论,中国古典时代的各个学派都曾作过探讨,而马相伯的看法,更接近道家庄子学派提出的“名者实之宾也”的结论。

马相伯解析的三个问题,在1916年他写的《宪法向界》一文中,即已提出。“向界”(object),也是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参照佛学语言所定的译名,在现代汉语中常说成是“客体”或“对象”。马相伯以为,宪法的对象有三点,一是国体,二是政体,三是国权和民权。《民国民照心镜》三篇,所讨论的也是这三个问题,但把研究由客体移向主体,就是说前一文研究的,是民国的宪法应该包涵怎样的内容,而这三篇研

究的，则是作为民国的公民应该认知的根本问题。早在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国家论，已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探究过政治目的和政治秩序的因果联系问题，以后这类问题，在教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进行过长期争论。熟悉经院哲学兴衰史的马相伯，显然偏向于国家主义者一边，主张教会不可干预尘世统治权。这实际是他坚决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的一个出发点，而且也是他在教会内部具有“排外”倾向的一个出发点。但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马相伯在民国初期，则越来越背离托马斯国家论的一个主要观点，那就是中央集权的政府或君主政体，是实现国家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最好工具，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弑君或革命都是不正当的，只能诉诸立法手段，即通过宪法来建立神圣的政治秩序。我们已经看到，马相伯在1911年已从君主立宪论者，转变为民主共和拥护者，在1916年还力求制订完善的宪法，以否定教权和制止君主制复辟，可是南北再度分裂，制订统一的宪法以防止暴政已不可能。这就迫使马相伯把眼光投向民主政治的主体，即“民国民”涵泳的意义问题。

由《宪法向界》到《民国民照心镜》，讨论的内容是一致的，讨论的范畴则由客体转向主体。这无疑表征着马相伯对民国以来政治的失望。他没有放弃对于完善的宪法的追求，但他以为不首先解决民主主义的启蒙问题，任何法律都将变成“儿戏”。证据就是他在《民国民照心镜》三篇论文中，都猛烈抨击“袁皇帝”及其开创的武人暴政，比作不知法律的禽兽，而抨击所依据的学说，已是耶稣会士极力反对的

卢梭的“天赋人权”论。

《民国民照心镜》三篇,提要如下:

上篇。问:什么叫“民国”?答:民国就是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民国比君主制的帝国,符合“先天之理”,即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这个法则,规定人和人生来是平等的。任何国家出现君臣等级,都是“后天之事”,也就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的行为变化。君主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主宰一国的政权,但民主却能主宰包括政权在内的领土和经济的主权。所以人权先于君权。任何君主,特别是自称由于得江山而有权坐江山的皇帝及其依赖的武人,都只能称作最大的“天下之大盗”。不消灭这班东西,国民主权是没有保障的。但消灭了这班东西,“后天的君主”仍然可以用总统之类名义,专制行政权而实现复辟。因此,人民必须人人有国家思想并懂得自治,人民必须懂得法理,而自觉守法,人民必须人人懂得破坏旧事物只能限于以前的不平等,而不能借口革命而危害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公民权利。“袁皇帝”的可恶,在于他利用中世纪旧有的迷信,非但侵犯人民固有的政治权,而且侵犯政治权赖以产生的经济管理权,侵犯人民世代所有的物主权即财产所有权。结果在清帝国专制之下,人民还可以控告不法官吏乃至对不法官吏复仇,在袁世凯时代反而一切由持枪的武夫决定,所谓“国民为主”,名和实都不存在。

中篇。问:什么是“民国”的“国”?答:相对于异国,则本“国”是全民族的法人代表。就自身性质而论,则本“国”是全社会谋取共同利益的主权代表。但国家不等于国体。

国体是谁为全社会至高无上主权的寄托。寄托给个人及其家族者是君主制,寄托给一个群体者是共和制。共和制则分民主共和与贵族共和两类。所谓立宪,就是由民选的群体组织同意行使主权,最高主权不分割的是一统制,可分割的是联邦制。国体也不等于政体。无论国体是君主还是民主,在政体上只有两种:"任心"即从礼俗出发而凭良心为政的是专制政体,"任法"即制订各种法律引导主权行使的是法制政体。法律的精髓是保障自由权,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法律的制定权和执行权要各自独立,立法权应重于行政权,法制政体就是要使两种权力互相依存。宪法是保证民治的,民治的最要点是地方自治。中国政体向来只有专制而没有法制,但民国以来的统治者不要任何礼或法,只凭个人喜怒或伺察他人喜怒为政,连专制政体也不如。他们植党营私,非袁派不用,非军阀不用,滥用国家名义,专恃武力压制人民应享有的一切自由。他们眼里的国家只是可买卖可发财的权位分配工具。所谓中央集权,实为"中央集钱主义",所谓中国政府简直是一个"伸手大将军"。

下篇。问:什么是"民国"的"民"? 答:第一,这个名称的涵义只问一个人有没有国籍,只是"国"的对称。所以,"民"不是"君"的仆人,不是"官"的下人,不是"无爵禄"的专称;人和民在概念上没有区别;无论劳力者劳心者都应是生产者,也就是人民。但这层道理在中国不受重视,于是那班君主官僚贵族武人政客,作为国贼民贼,便难以根除。第二,"民"的自身就是全民族,民国民的表征便是贵自治贵自

立贵自由。无论是总统、督军还是议员,首先都是民国之民,因而他们贱视人民,摧残人民自由,便是自外于民族;人民当然认定这种政府绝非我四万万人民的一统政府。第三,"民"的自性(不变不灭的天性)就是要图自治图自立图自由,不能做他人的奴隶。国所以不配称为民国,就是政府不断在出卖民族出卖祖宗出卖国土,将使人民化作异族的奴隶。因此,人民应该秉诸自性,决不能听这种政府的支配,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民国之民。

以上《民国民照心镜》的诸要点,在当时远非激进的见解,甚至可说卑之无甚高论。我们知道,1918年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来的初期,一些激进人物正以为这是"庶民的胜利",而被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等理论所吸引;日本乘欧战之机不断加紧掠夺中国主权,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愤怒不已,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前夜。域外各种思潮和主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很快将马相伯的声音淹没其中。

然而,一种见解,在同时代没有受到注意,不见得是不值得注意。我们把马相伯的上述见解,与同时代的各种政论略加比较,便能发现他在其中还是相当出色的。

例如,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表过一篇著名演说,指控中国的政治腐败已到极点,以为这不是革命之罪,而是因为革命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的陈土,而地底的陈土便是前清遗毒的旧官僚、武人和政客。这同一年前马相伯的看法很相似。怎样改造呢?孙中山否定了三种着手方法,即提倡教育、兴办实业和地方自治。他否定的理由都是说官僚要阻挠和反对。因此,他强调首先要

用革命搬去那三种陈土。他演说的题目就是《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所否定的三种意见即“又有人说,立国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为最重要的事,现应从一乡一区推而至于一县一省一国,国家才有希望。”这个“又有人说”,其中便包括马相伯的《宪法向界》、《民国民照心镜》诸文的说法。

原来地方自治并非马相伯的个人意见,而是当时相当一批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和实业家的共同主张。其中包括清末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名流,如章太炎、蔡元培、张謇、张元济、汤寿潜等,多半是江苏、浙江二省人士。他们的具体意见有差异,但都倾向于仿照美国的体制,将中华民国的国体确定为类似联邦制,称作“联省自治”。马相伯对于这一设想十分热心,今存论证“联省自治”可行性的论说,也以他为多。

马相伯认为,中国的难治,在于地方太大,人口太多,而土地、物产、民俗等等空间差异更大,所以即使在真正大一统的元明清三代,也不能不在内地分省治理,在边疆分省统治。从中国历史来看,“合久必分”,况且世界政治潮流“已趋于国内联邦制,国外联盟制”,如美国、英联邦及奥匈帝国等。“每见兄弟分居,违言必少,又恶知一分再分,统一反出于真心耶?”(《书分合表后》)在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帝制复辟以后,马相伯认为南北已有两个政府,而各省都一独立再独立,事实上已形成南北分治和区域自治,为了兼顾全民族利益和促使地方在竞争中发展,不如实行联邦制,既能抑制把中央集权变成“中央集钱主义”,又可激发人民自觉保护财

产权、管理权和政治权的意识(《宪法向界》、《民国民照心镜》上篇)。他认为自治单位应该由小到大,即孙中山所引用的"从一乡一区推而至于一县一省一国"。

孙中山否定这个方案,只有一个理由,说是"现在官僚,何尝愿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奇怪的是,在同一演说中,他不谈马相伯等提倡地方自治由小到大也是为了养成人民自治能力的论证,相反却把他当年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归咎于"人民的訾议",说是"革命破坏清政府以后,一般人民每訾议(革命党)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经验,所以一般议论,都希望官僚执政。如袁世凯时代,几乎大家都说非袁不可。革命党自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舆论说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这一点。"真的"就在这一点"吗?孙中山把责任统统推给人民,似乎非常尊重"国民全体"。但他在1911年10月革命以后迟迟不回国,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只考虑如何调虎离山,在袁世凯口头表示赞成共和的当天便声明让位,问过"国民全体"吗?所以同样认为人民捍卫应享的民主和人权的自觉性不够,马相伯希望通过由小到大的地方自治予以培养,孙中山则认为这班愚氓,首先得军事管制若干年,其次得狠狠教训若干年,最后才可以允许他们有事可以诉诸宪法。后者就是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三阶段论,即军政、训政、宪政。他的接班人蒋介石忠实执行,用军政实施训政,训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反蒋派,最后想实行"宪政"也来不及了,只好滚出大陆去行宪。在这一点上,没有把理论付诸实践的马

相伯,在中国的有识之士中间,赢得比孙中山更多的同情,可能不仅是机遇。

7.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

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说法,马相伯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期逃出北平回到上海,就已经"摆脱了政治生活"。《民国民照心镜》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否证。不过,据马相伯晚年的言论和回忆,他在1919年后的十年间,退隐修真,不过问时事,连报纸也不看,则大约是事实。

那以后的二十年,马相伯仅两度担任过短暂时间的公职。1922年他八十三岁,被推举为江苏财政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但很快因军阀孙传芳占领南京而弃职回沪。1937年1月4日,他以九十八岁的高龄,被任命为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委员,直至去世。

据现存的马相伯给亲属的函件,他曾指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任中国驻梵蒂冈的使节。这是他主动的要求,还是别人的推荐?已不清楚。但第一,他谋求这项任命,曾得到法国和美国驻华使节的支持;第二,他对任命未遂,感到失望,并以为这是曹汝霖在暗中阻挠的缘故。

马相伯退隐后住在上海。他摆脱了世俗政治,却又介入了教会事务。他虽然早已不是耶稣会士,不是天主教司铎,但已是中国教徒中政治地位最高的耆老。他对当时在华的外国天主教士很不满意,不仅是因为以法国人为主的这班外籍教士把持教权,在教会内给人种族歧视印象,更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背叛了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

等先后相继的良好传统,即传教时与中国人完全平等。他在这方面的争论,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但由此可知,他在参政时竭力争取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是里外一致的。

毋庸讳言马相伯不喜欢共产主义。这可能由于他憎恶康有为,由康有为的《大同书》追溯到《礼记·礼运》,误以为近代共产主义与儒家大同说教是一码事的缘故。但马相伯似乎更被俄国的"过激派"所震惊。他以为俄国正在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中国古已有之。前引《民国民照心镜》下篇,他讥讽军阀武装时就曾说"中国之兵,自古皆过激派实行家,均贫富,共男女,而淫掠则过之"。1919年他为陈垣重刊的《灵言蠡勺》作序,又把二者相比。《灵言蠡勺》是十七世纪入华的耶稣会士毕方济申述灵魂观念的中文著作,由马相伯和英敛之共同校订。马相伯说此书证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人有灵魂,有良心;"否则为兵匪,实行无政府可也;否则为过激党……",那将导致夫妇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崩溃,破坏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但在这以后,中国真的出现了"过激党",马相伯却不多公开批评了,理由尚待研究。

马相伯说他在八十岁后便"厌闻时事",除宗教书以外,有时会翻翻有关科学的刊物。如此度过了十年。那十年他一直幽居在上海徐家汇由教会管理的一所孤儿院内,生活由震旦大学补助,相对地说比较平静。然而外部世界并不平静。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给中国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但没有带来人民所需要的科学和民主。南北依然分裂,军阀们互相混战。北方三大派系的军头争夺北京政府的权

力闹得如此火热,致使这个政权在1928年底垮台前的九年内换了二十八任国务总理,其中还有一年多不设此职。同北方的黑暗相比,南方似乎稍微光明。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政府,一再上台又下台,靠着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忙,实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在广东开始站住,接着在1925年去世。然后国民党组织北伐,然后国民党内部又分裂出两个政府,然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并开始内战,然后蒋介石下野又上台并与同样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各派系军头大打出手。这就是马相伯九十岁前的中国情形。他说讨厌听闻时事,可见这时的心态并不平静。

其实马相伯的隐修生活也不平静。当年他曾坚决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是"五四"时代新青年们的共同要求。然而事态很快就变得异样。马相伯要否定的只是一种"国教",目标是实现信仰自由。但在"五四"以后却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倾向于否定一切宗教,急切地要消灭宗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了"非宗教运动",鼓吹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反对所有宗教"迷信",尤其反对基督教。

卷入非宗教运动的成员十分复杂,有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有学生、教授、学者、科学家和各类政治人物。马相伯的老朋友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演说,根据孔德的实证主义公式,宣称宗教只能满足人类低级阶段的精神需要,如今要陶冶青年的高尚情操,已不必借助超自然的信仰,而代之以美育。这篇温和的演说,竟使蔡

元培被看作非宗教运动的领袖。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但他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朱执信，也于1919年在上海的国民党报纸的一期基督教专号上发表《耶稣是什么东西?》抨击耶稣是个偏执而自私的伪善者，是座被基督徒捧出来的偶像。这篇激烈的文章，连陈独秀也觉得过分，而接着在《新青年》上著文称道耶稣的人格是好的。但朱执信文却受到非宗教运动的青年们很大欢迎。

马相伯可以不理睬各种报刊所登载的辩论文章，但不能不注意1922年形成高潮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波及教会学校及至危及教堂的活动，也不能不阅读上海一些大学生投给他的《非基督教旬刊》之类宣传品。他的《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等文，就是对这些激烈反教的言论的回应。

然而这场被马相伯称作"誓反教"的非基督教运动，无论参加的成员、追求的目标，还是发生的原因，都和当年的义和团运动大不相同。这是马相伯由开始起就清楚的。我们已经了解马相伯在半个世纪以来，曾经同自己教会的西方教士屡起冲突，他曾经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取消了神父职务，被开除出耶稣会，回教会后捐献全部家产创办震旦公学，又被迫两手空空离校而另办复旦公学，退出政坛后生活没有着落，反而要依赖他创办的震旦大学的"施舍"过活。但作为虔诚的信徒，他对此都没有怨言。他不能不生气的是那些外国教士对待中国信徒的不平等态度，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既无知又蔑视的沙文主义态度。他与英敛之、陈援庵等一再设法校印十七世纪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论著，正是对他同时代外国一般教士的批评。

这在民国初他致英敛之、英贞淑兄妹的多封书信中已有清楚的表露。

1920年2月马相伯《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更是以正式答复罗马教廷巡阅使光主教询问的形式,直接批评外籍传教士的行为是造成中国人反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例如说,西方教士总是依仗本国官员控制教务,所谓依仗强权谈道,怎能使华人不疑忌不反感?例如说,某国人任主教,他的辖区便成为本国本会修士独占的地盘,即使人数不多,“又不准他会或他国修士,设立高等学堂,及关于科学等种种建设,而又不能抵制誓反教人”,怎能使教外华人相信?例如说,华人司铎在教会内不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由于外籍教士书信往来都以嘲笑中国人、中国官、中国事当作时髦,则他们在教外人眼中怎么不被看作外籍教士的“小小当差”?马相伯特别指出,到中国传教,就理应学习中国的普通语言,使用中国的通行文字,然后才能对社会情形不隔膜,互相交往不猜疑;“可惜西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十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至今教与教外,判然两国,格不相通”,著书讲道,没几人明白,而主教也更加躲着不见教友。结果呢?他们根本不懂,如今的反教者目标与从前大不相同:“誓反教颇能迎合现今社会,结交官长,征集会友,广立学堂,培养科学适用之人才”;而传教士则只会说大话,声称那班人反正得不到天主恩宠,“听其下地狱可也”。

马相伯警告说,这种情形再不改变,传教士与反基督教者之间已经逆转的优劣对比便无法扭转:“颇闻修道院内,

中国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但中国现今批驳教友者，不独教外人与誓反教，诚以游学欧美，能英语者有数万人，能法语者有数千人，或于报纸，或于杂志，译有欧美教育家、政治家、社会家、历史家、科学家等名姓书籍（名姓犹言"名家"——引注），以批驳圣教会者，往往而有。传教士，学问不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

在这道上书中，马相伯等人提出，中国教务应由中国籍人管理；外籍主教和各修会会长如要在华传教，应该改为中国民籍，应该同他们的本国政府断绝关系；传教士必须通中文；各主教区必须多多设立学校和从事公益事业，包括通力合作，研究学问，等等。

人们一看便知，这个建议就是后来中国的天主教"三自"（自立、自养、自传）的先声。研究过 1914～1918 年马相伯言论的学者，当然可以发现这样的意见在他已经酝酿已久。例如 1918 年 9 月 9 日他致英敛之的一封信，在又一次批评某些外籍司牧背离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传统的同时，更严厉地斥责他们"以国力传教"，背离《圣经》教义，而反如"虎狼入羊群"；因而他认为应栽培华人司铎主持各方教会，"不当使中华教会，常为寄生物、殖民地之类也。"

孔汉思曾把"三自"首倡权赋予英国圣公会教士罗兰·艾伦，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伦便诉诸《新约》要求各国的教会独立，自立、自养、自传。早在共产党之前，我们已有了'三自'主张！"（见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书店 1990 年版，页 223）最后一句

俏皮话犯了双重语病:第一,"三自"主张不是中共创议的,现存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著名领导人之一吴耀宗的日记手稿证明,他开始从事"三自"运动,是在1927年由美回国以后,那时同中共没有联系;第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相伯便酝酿中国天主教会自立,至1920年正式提出,没有任何资料可证他曾汲取艾伦的主张,却有确凿资料可证他在那时(中共尚未成立)便反对苏俄式的共产主义。

因此,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形成高潮的非基督教运动中,马相伯便陷入困境。一方面,作为宗教信徒,他必须保卫自己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必须反对任何的消灭宗教的企图。另一方面,作为民主与科学的主张者,他又不能不承认非基督教运动的参与者决非义和团式的"愚民",而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他们指责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变化取向相悖,指责西方传教士依仗强权贱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这方面马相伯本人的批评甚至更严厉。既要坚持信仰自由,又要坚持民主进步,然而又受到教规和誓约的束缚,对非基督教运动大加谴责或公开同情都不行,这个处境实在令人不会感到舒服。也许这也正是马相伯在那十年"厌闻时事"的一大理由吧?

马相伯不是那种任凭困境摆布的人。他尝试解困的意向,一见于前引1920年《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希望从内部改革教会组织和传教方式,但这等于要突破梵蒂冈控制世界教务的中世纪传统,因而他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是必然的。怎么办呢?1924年北京政府迫于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舆论压力,明令禁止各级学校设置强迫学生修习

的基督教课程,首当其冲的就是天主教学校。这使八十六岁的马相伯不得不出面帮助拯救天主教的公众形象。1926年上海天主教友创办《天民报》作为自己的言论机构,由马相伯任总主笔,他撰写的《发刊词》,长达二万字,首先不是引《圣经》而是引《孟子》,大讲办报是为了发扬中国古老传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但要始终以"民国民"自居;然后大讲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迫切性,要点仍是重申《民国民照心镜》的主张。至于宗教,在这篇文章中只有短短数语,将它列为与合乎天理人道的道德同一范围,说是属于救世精神,而不属于物质性的科学之列。"以故凡言形下之科学愈发明,形上之真道德、真宗教愈无用者,皆呓言也,梦话也。"但接着马相伯又说,这类"梦话"还算上等,比把淫画当作美术品、淫药当作长生药等等要高级得多。他以此来暗示非基督教运动攻错了方向,放过了危害社会最大的恶行,反而攻击有利改良风尚的善教。然而这样的辩护淹没在强调社会政治改革的大量言辞之中,不正好表明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没有真正摆脱心态失衡么?

非宗教运动原是五四运动的一种继续。那时互相厮杀的北洋军阀各派首领无不有外国势力支持,而除苏俄以外的欧美各国政府大都对南方革命力量抱着敌视态度。因而非宗教运动在政治上表现的"排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是把基督教看作他们认定的帝国主义阻挠中国进步的精神侵略工具。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蒋介石左右开弓,先驱逐了苏联顾问并把共产党赶入地下,又用武力击溃北洋

军阀并迫使北洋军阀中的最后控制北京政府权力的张作霖退回东北，随即这名土匪出身的大元帅被日本关东军谋杀，他的继承人张学良宣布归顺南京的国民政府。这期间欧美各国纷纷承认南京政府。非宗教运动既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攻击目标，又由于蒋介石反共而失去了极端反教斗士。于是这个运动不了了之，便是不奇怪的。

1928年5月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盛大集会，按照中国传统，提前一年祝贺马相伯的九十岁生日，可以看作是反基督教人士和中国基督徒和解的信号。集会的发起人首先是蔡元培、于右任。蔡元培原是非基督教运动的领袖，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审计院长，他虽是马相伯的学生，但对天主教素无好感。参加祝寿活动的还有非宗教运动的著名学术界领袖胡适等。当时上海、天津、北京的教会报刊都非常兴奋地报导了这次集会。天津《益世报》在次年为马相伯正值九十岁发表的社论，还特别重提上一年预庆会时蔡元培的代表祝词，说是中国科学的发展，出于宗教家而提倡科学的马相伯早年宣传的力量。

看起来，马相伯真的可以不问政治，安度余生了。谁知天算不如人算，形势到底使年过九十的马相伯也不得安宁。

8. 呼号抗日的"老青年"

马相伯首次出国是去日本担任外交官，再次出国是赴朝鲜而与日本势力抗争。他毫无疑问属于近代中国的"知日派"。他本来对日本没有恶感，相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

好感,在朝鲜时曾劝闵妃仿效日本送太子赴欧洲留学。但至迟从民国以后,马相伯的政治态度,就越来越倾向于反日,终于在八十岁后成为坚定的反日派,凡日本的一切都予以否定,包括对法国在华天主教传教人士的态度,也以法国政府支持日本与否作为衡量的尺度。在他的教友看来,这迹近"排外",但在他的教外朋友看来,这正是"爱国"。

马相伯当然是爱国者。他早已表明,如果由外籍教士控制的教会当局,强迫他在做中国人还是做耶稣会士二者中间选择其一的话,他宁愿舍弃用了二十年才博取的司铎职位。用中国传统尺度判断,他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典范。

然而晚清慈禧太后的政府残酷镇压"排满革命"的事实,使温和的改革论者马相伯,也发现他很难彻底否定同盟会报刊的革命言论。1907年马相伯出任政闻社总务员之后,曾在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长篇论文,讨论政党的责任。其中为了回避他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即腐败透顶的清政府用假立宪欺骗国民的阴谋早已揭穿,而梁启超等仍然宣称这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谁对呢?马相伯显然发现右视则取媚专制,左视则伤害民权,总之最终信念和渐进策略难以调和,于是不得不诉诸良知,就是他不满君主专制而又主张君主立宪,完全是受到同情苦难人民的良知驱使。"吾侪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组织此政闻社;吾侪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组织此政闻社。"没有料到这个说法受到《民报》主编章太炎的大大奚落,指斥马相伯的"神我说",不过是附会印度的数论哲学,变相地稗贩罗马教的灵魂论,用它来说明国家起源,更是不通之论。至于用王阳明的致良

知论,替满清的民族压迫和君主独裁辩护,其实替罪恶开脱。这使马相伯大为丧气,很长时间从事反帝制运动,却不再强调出于良知。

然而马相伯始终以为人应有“良心”。他以为朱熹强调《孟子》所说的“良心”,王守仁强调《孟子》所说的“良知”,是一回事,即都是指上帝赋予人类的区别善恶和行善赎罪的本能。他在出任《天民报》总主笔后又特别强调良心说,应该说是他没有放弃早先信念的例证。

至少在九十岁前后,马相伯仍然可以用自己没有脱离隐修生活的说法自慰。哪知中国儒家定命论者常说的“天不从人愿”,竟在反孔教的马相伯身上获得应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强行驻扎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关东军,突然进攻沈阳,随即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全境,并宣布建立由亡清末代皇帝溥仪为君主的“满洲国”。这个消息激怒了全中国人民。略知历史的正直的中国人,包括原隶汉军八旗的非中原汉人,都群起坚决反对。

于是我们看到,隐修已十二年的马相伯也怒吼了。他在隐修期间抑制的民族情感,犹如突然遇到了宣泄的缺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立即同意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协会领袖。紧接着用他的名义发起组织了多个支援抗日战争的团体。在1931年他已有九十二岁,如此高龄而投入如此紧张的救亡活动,用于右任的赞语形容,他的确是一位“老青年”。

马相伯在晚年自号“华封老人”。汉语中的“封”字,有

国土、祖先坟墓等多重涵义。华封老人的命义,显然与他先前自称的"民国民"意思一致,即以"中华民国老人"自居。这位"华封老人"投入抗日活动,其活跃程度真是令一般年轻人自愧勿如。他用笔和舌鼓动人民奋起抗日,拯救危急中的祖国,那些言论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

假如马相伯的言论仅止于抨击日本侵略,那么纵然由于他年高德劭,在众多的抗日言论中引人注意,但注意的理由也不过是偌大年纪的老人仍不忘爱国而已。出人意外的是这位华封老人在严厉谴责日本侵略的同时,不仅积极参与组织救援难民和抗日伤员的活动,而且发表宣言和广播演说,追究引狼入室的责任,声讨对日本侵略军不抵抗的祸首,并且大嚷要动员全民抗战必须首先在国内实行民主改革。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夏天,马相伯和政界元老章太炎、熊希龄、沈恩孚等,左一道"三老通电",右一道"二老宣言",都是谴责国民党当政后厉行一党专制,政治腐化透顶,官僚贪污空前,"党已显然破产";除非立即结束所谓"训政",把政权还给全体人民,召开国民大会,选举真正能够实行全民总动员的救国政府,则中国不会有救。他们警告蒋介石等国民党头目说,如果蒋介石们在大难临头之际还不用事实表明自己的悔罪诚意,那末"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所谓"全民悲愤,不甘坐毙",当然是指人民将用革命手段推翻媚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这样的声明肯定不会使蒋介石感到悦耳。

1932年4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马相伯委

派他的门人徐景贤携带他拟订的提案出席。这份提案得到上海出席会议的十四名人士的赞同,题目就有挑战性,唤作《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提案的理由和附加说明,更不会使蒋介石愉快。马相伯在提案理由中劈头就强调“民治为举国一致之要求”,附加说明中更说他认为理想的民主政治,就是根据美国林肯总统的“正义造成力量”的原则,仿照华盛顿创建的“州联宪法”,在中国也实行由乡而县、由县而省的“州联”制,人民有“天赋人权”,政权由直接选举,土地基本归于国有。如此等等,表明九十三岁的马相伯,还是坚持他在反袁世凯时期的基本政见。因此,他署名的种种政治改革宣言,并不是出于随和朋友的行为,而是由于其中意见真的符合他的看法。

在蒋介石看来,马相伯老人非但在民主政治问题上固执己见,更糟的是被反对派组织拉拢。例如1932年12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蔡元培等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马相伯居然应邀加盟表示支持。1935年12月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上海组织各界救国会,马相伯也同意出任名誉领袖。他的年龄使他不可能从事任何实际活动,但他的名望却足以被用来号召景仰他的正直人品的各界群众。最难得的是这位老人对自己承诺的每个名义职位都认真对待,都要就名义而发表言论,那内容也就是他从《民国民照心镜》到《天民报发刊词》的一贯主张,就是中国要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内部团结自强,而自强的关键就是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不消说必须结束个人或一党专制。

9. 国民政府委员

1936年12月马相伯由上海移居南京。移居的理由，据以往马相伯的传记作者的解释，是由于天主教南京教区新任主教于斌邀请他前往帮办教务。十分熟悉马相伯晚年历史的方豪，则说他移居南京是由于蔡元培、于右任的建议。到底为什么？马相伯的孙女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1936年11月救国会的领导者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被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下狱，马相伯极为愤慨，与宋庆龄等联合发表宣言，为“七君子”辩护。蒋介石对于右任说：“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于右任不得不借于斌的手，请马相伯移居南京帮办教务（参看马玉章《怀念先祖父相伯公》，《上海地方史资料》第四辑，1986年12月）。

后一说法仍有待佐证。但马相伯“闹得实在太凶了”，则不但有宣言通电之类文献可证，还有马相伯那些口授作品可证。例如1935年冬天，天津的《益世报》逐日连载马相伯的《一日一谈》，时间长达三个月，1936年2月还在上海租界内结集出版。在这部口述的著作中，马相伯显示了超凡的记忆力，并证明他已九六高龄，仍然思路清晰，目光敏锐，每篇谈话虽短，却在评论政治现状时庄谐杂陈，往往一语破的。而他所集矢之“的”，正是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及其效应。

不妨略举数例。

当时国民党正在制订宪法。马相伯却说那是自欺欺

人,“宪法的第一任务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然而现在的宪法,本来就不是由人民大众的意思来写成的。至于‘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的法律,更是由少数人任意规定的,于宪法上所许给人民的自由平等,都可由少数人订定一种法律把它取消得一干二净。”

当时南京政府颁行法币,禁止“行使现金”。马相伯立即从物价腾贵、纸币贬值的现象,指出这种新货币政策违反“民心”,“最苦的是小本经营与劳苦的人民”,“现金外流并不是小百姓所能干的,都是富商大贾干出来的,他们的神通广大,‘苞苴夜进,贿赂公行’,什么关节都能打通”,“虎兕出柙,是谁之咎!”

当时蒋介石正在亲自出马提倡“新生活运动”,一时全国到处尊孔,党国要人纷纷出面鼓吹“礼教”。马相伯对此尤其大加批评,连续多次谈话,都以坦率而尖锐的语言,指责“孔子的学说不成为一种哲学”,“他一生最大的功劳就在‘正名定分’,替宗法社会的封建制度做了两千多年的‘叔孙通’;正名定分的流弊便是率天下后世以伪相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谎”,“中国历代专制帝王莫不尊孔,就是觑破了这一点;东邻某国与所谓满洲国之尊孔,也是觑破这一点”,“以我经验看来,真正能懂得中国旧礼教的能有几人!至于真正躬行实践的更是凤毛麟角”。“他们提倡礼教,自有他们的用意,因为他们心目中总横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糊涂主意,以为提倡礼教便可使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听他们摆布。这么一来,他们便可稳坐江山,子孙万世,实则大错特错!”“所以我说果真实行礼教,则第一个受裁判的绝不是我们人

民，乃是‘监守自盗’、‘知法犯法’的若而人！”——最后一语也是《一日一谈》的结束语。

诸如此类言论，怎能使蒋介石受得了呢？可是对这一位年高德劭的爱国老人，怎么办呢？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仿效明朝正德皇帝的故伎，将他讨厌的元老“一脚踢到楼上”。

193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相伯为国民政府委员。任命的具体理由不清楚，但在任命前两天，国民政府已根据于右任的建议，准备对马相伯毁家兴学、造就人材的贡献颁令嘉奖。所谓毁家兴学，就是马相伯捐献全部家产创办震旦大学的往事。因此，下面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马相伯住在上海的生活费，本由震旦大学按月供给，但去南京后，法国传教士便违反诺言停止发钱；于右任闻讯大怒，说：“以后不用他们的钱！”于是设法安排马相伯担任政府委员。如此说来，九十八岁的马相伯出任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官职，当然可说他德高望重，直接原因却是南京政府对法国人和教会当局的行为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固然可说是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表现，但既已认定法国传教士违反诺言，便理应支持马相伯及其家属通过法律手续予以解决。而南京政府却用安排马相伯做官的方式，达到既解决马相伯生活困难又向法国人表示不满的效应，恰好反证当时南京政府没有实行法治，把官职作为酬应和调节人事关系的手段，却不论任职者是否有能力承担这种责任——谁都知道一位年届百岁的老人不可能从事政务活动。因而上说不可能是唯一的理由。

对于马相伯来说，做了国民政府委员，固然意味着有了饭碗，但也意味着成了蒋介石的“花瓶”。从此他是政府官员了，再也不能以民间人士或民间社团领袖的身份，站在政府外面指手划脚地批评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或压制民主之类政策了。“马”被套上了笼头！

从马相伯做了政府委员之后，虽然“国难”愈加严重，他的声音反而小了。有记载说马相伯在九十九岁那年，“亲自撰写《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一文在各大报发表，其中有‘慨然甘抛弃一条老命，与广大爱国民众携手前进，共同抗日救亡，直到胜利’等语”；然而笔者几年来遍查 1938 至 1939 年的在当时后方出版的主要报刊，均未发现这篇文章或有那几句话的报导。马相伯由激昂地呼吁抗日救国，到相对地变得沉默，无疑是因为他更加年老体衰，但分界线出现在他任政府委员的时候，便很难令人不会想到那也可能是蒋介石的“花瓶”政策的效应。在用高官厚禄当作羁勒套住反对派人士这点上，蒋介石虽然不如袁世凯玩弄得高明，但他在执政初期至少在表面上还尊重所谓社会舆论，而且还懂得学者名流都需要吃饭，就比他在退出大陆前那几年只会依仗军警特务镇压反内战的知识分子的手段高明。

1937 年 11 月 12 日南京政府弃守上海，除被称“孤岛”的外国租界以外的地区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同月 20 日蒋介石便仓皇地用国民政府的名义通告中外，即日起迁都重庆。马相伯全家也加入了“逃难”人群的洪流，由广西省政府接到桂林居住。他的住宅邻近三百年前南明最后一个政权中领导抗清战争的天主教徒瞿式耜的殉难遗址，这对

他多少是一种心理安慰。可是,1938 年 10 月广州也被日军侵占以后,桂林也成了抗日战争的前线。重庆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挂念老师的安全,请求马相伯移居更远的后方,前往昆明或者重庆。交通困难使行程不得不假道越南。据当时报导,这位九十九岁的老人曾坚持不肯走出国境,照顾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儿媳马邱任我,不得不对他隐瞒实情。但他们到达越南谅山,便因马相伯的身体已极度衰弱,而留居在那里。直到去世,马相伯始终不知道自己已身居外国。

按照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传统,1939 年 4 月 6 日,马相伯已满一百岁了。人活百年本来罕见,何况马相伯恰好出生在被众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开端的 1840 年,何况他曾亲身参与中国政治长达六十五年,正如著名诗人柳亚子所吟赞的,“一老南天身是史”。因此,当时的后方为他的百岁举行了相当盛大的庆祝活动,包括于右任等在重庆举办的庆祝典礼,用国民政府名义发布的褒奖令,政府高级官员和政党领袖纷纷致电向他祝贺,政治倾向各异的大小报刊纷纷发表祝寿社论或文章,许多地方也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庆祝会。当然,国民党、共产党和各中间政治党派及其报刊,也都借这个机会申述了一番各自的政治主张。

1939 年 11 月 4 日,备受光荣称道的马相伯,在越南谅山的幽居生活中去世。据说他是听说政府军击败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役胜利消息,而过度兴奋,终于不起的。重庆政府和各界人士又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他去世前两个月,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去世后两

年，日本对英美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没有等得及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按照实际年龄，马相伯在人间总共生活了九十九年六个月又二十八天。

参考文献

（1）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1947。

（2）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北平，1948。

（3）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上海，初版1932，增补版1933。

（4）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记：《一日一谈》，上海，1936（有两种版本）。

（5）马相伯：《捐献家产与学字据》，1900，上海市高教局档案第599卷。

（6）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政论》第3期，1906（东京出版）。

（7）《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同前刊。

（8）马相伯：《华封老人宪法意见书》，北京，1914。

（9）《马良君与毕葛德君之宪法一夕谈》，北京《宪法新闻》，1914。

（10）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长沙，1939。

（11）钱智修编：《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载《中央日报》1938年5月16日。

（12）凌其翰：《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申报》1932年5、6月。

(13) 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逸经》31~33期,1937。

(1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北京,1988。

(15) 方豪:《马相伯先生在教事迹年表》,《益世报》(昆明),1939年11月12日。

(16) 盛成:《马相伯先生百年大事记》,《扫荡报》(桂林),1939年12月13~19日。

(17) 庆贺马相伯百岁的文章、报导、社论、贺电等,见《中央日报》(重庆)1939年4月,《新华日报》(重庆)1939年4月,《大公报》(重庆)1939年4月,《新民报》(重庆),《新蜀报》(成都),《救亡日报》(桂林)1934年4月。

(18) 哀悼马相伯逝世诸文,同上引各报1939年11月。

(19) 朱传誉、王茉莉主编:《马相伯传记资料》,台北,1978。

(20) 朱传誉主编:《马相伯传记资料》,台北,1979。按,本册收文与前册均无重出,当属续编。

(21) 李青崖遗稿、马玉章校补:《马相伯先生传略及其办学经过》,《上海地方史资料》第四辑,1986。

(22) 韩景琦:《记马相伯先生二三事》,同前刊。

(23) 马玉章:《怀念先祖父相伯公》,同前刊。

(24) 《马良》,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1983。

(25) 赵少荃:《马相伯传》,《中国天主教》1984年第4期。

(26) 娄献阁:《马相伯》,《民国人物传》卷一,北京。

(2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1983。

(28) 刘凤翰编:《于右任年谱》,台北,1967。

(29)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北京,1980。

(30)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1979。

(31)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1981。

(32)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适可斋纪行》。

(3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1984。

(34)《清史稿》,上海影印二十五史本。

(35)《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一、二、三卷,浙江,1982~1983年。

(36)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一、二卷,北京,1982年。

序

余去岁执笔侍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近三月，所述老人之“一日一谈”，曾载天津《益世报》，寻又转载天主教某杂志，北方士子莫不翕然。惟两报所揭橥者尚非全璧，余方且惜之。适新城主人谓余曰：老人南人也，而其道不南，吾侪后生之耻也！曷请诸老人？仆愿服刊印发行之役。因请诸老人，老人欣然曰：诺。惟关于国家学说，意犹未竟，阐发余蕴，俟之异日。余退而以全稿付新城，因述其颠末于此。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王瑞霖

一 莫索里尼的算盘

记者和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今朝七时,时老人方在他的小客厅里进早餐。他的早餐很简单:两个鸡蛋打碎,用开水冲一大碗;吃完后,再进苦咖啡一杯,佐以饼干少许;末了,则进水果(香蕉)一枚。我问老人,中餐与晚餐吃什么东西,他说:和早餐一样。老人起居虽须人扶持,耳朵亦不大方便,然而精神却很饱满,和他谈起话来,还是滔滔不断,并时做手势以助其语气。据友人告我:老人从前非常擅于讲演,现在看他口讲指画的精神,始信友人之言为不诬。我们正谈话时恰好今天的报纸送了来,打开一看,方知我们几个月来所猜度的“意阿战争”,已于昨日开幕。

记者 遂将报纸指给老人看过,并叩老人有怎样地感想,老人很兴奋地述说他对于这一战争的观察如下:

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在两千年前就有关系,所谓希腊、罗马的文明与埃及的文明,同为地中海两岸的产物。罗马

古代有句俗语:“替黑人洗脸,枉费肥皂。”可见非洲与意大利的关系由来已久,不过意大利从希腊罗马以后,又有文艺复兴,到了近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统一成功,经济发展,慢慢地已经走上了工业文明的阶段,而阿比西尼亚这个非洲的“硕果仅存”的帝国,直至今日还滞留在封建宗法社会时代,没有多大进步,遂不免于今日的局势。

在未批评意阿战争之先,我要说一段插话。说来也奇怪,就是从社会学、文化学以及语言学考察起来,阿比西尼亚与中国民族似乎有过极密切的关系。埃及的语言以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二三百字和中国语言相同,譬如“山”“水”等字,在形体上差不多是一样的(美洲的野人和墨西哥的人常用一种祷雨,或祭祀的典礼,就是对一块石头行礼,法国人遂把它运到巴黎,便视为古董。这一块石头上所刻的碑文,就是上面一横,下面四点,上面一横像天,下面四点像雨,这也和中国语言的“雨”字正相符合,可见北美野人和墨西哥人也和中国民族有密切关系。)所以谈到阿比西尼亚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抱着十二万分的同情!

此次意大利之对付阿国,与日本之对付中国,如出一辙。莫索里尼口口声声说意大利必须把阿比西尼亚放在他的铁腕统治之下,夷为保护国,才可以补救意大利经济上的危机,这就是日本人说的中国 (尤其是东北四省及华北) 是日本的生命线一样, 就是要用他一民族或国家的幸福做他的繁荣的牺牲品, 这在三尺童子也都知道是极不公道的事!

意大利这次对阿比西尼亚作战准备了大半年,运到非

洲前线的兵至少有二三十万,飞机数百架,就军队的器械及军事技术说,意大利的胜算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以我观之,莫索里尼的如意算盘,恐怕十成有八成是打错了。因为:(一)就气候说,阿比西尼亚虽然是非洲高原,有时天气也很凉爽,然而通常它的温度总在一百三十度(有时要到一百六十度)以上,在欧洲舒服惯了的意大利的兵士,一定耐不得。(二)就地理说,阿比西尼亚既多高山,又中隔沙漠,而且没有人烟稠密、工厂林立的大都市,意大利的飞机、坦克车都不能施展它的威力,军队的给养与饮料又都异常困难。(三)再就政治上说,意大利这种侵略行为,不但阿比西尼亚的整个国民对之同仇敌忾,就是非洲的其他黑色人种都要起来一致反抗。(四)不但非洲的黑色人种一致起来反抗,即全世界与之同病相怜的国家以及民众都要起来站在阿比西尼亚一边,古语说得好:"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莫索里尼所领导的意大利恐怕也免不了这种命运!孟子也说过:"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设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所以我们应该起来反对意大利这种战争,我们不要像墨子所说的"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那样,不知道是非公道。(五)我们知道:意大利这种行动,不仅是同英国争非洲的殖民地,不但是同他争地中海、红海的霸权,并且是给英国对于印度、澳洲、加拿大等等的统治和太平洋的市场以极大的威胁,英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八九六年法国帮助阿比西尼亚,而意大利在阿杜瓦大吃败仗,今则大英帝国又完全站在阿比西尼亚一边。合之以上五种原因,莫索里尼对于阿比西尼亚更是没有把握,或许

又有第二个“阿杜瓦”的一幕悲剧收场在那儿等着他呢！

一九三五，十，五。

二 谈 华 侨

记者　老先生今日精神好吗？

老人　昨天夜间不知怎的，不曾困着觉。今天我们快点谈，因为上午我还须到复旦中学去讲演，明天则此地还有聚餐会。

记者　什么人在此地聚餐？

老人　胡文虎先生。他对于祖国社会事业非常热心，对于教育事业也是尽力帮助。像胡君这些人着实难得，他们出国的时候，都是赤手空拳，到了南洋全凭着个人的努力，致有今日的发展。他们虽然拥有巨金，但他们的金钱是从商业上的正当途径弄来的，与官僚之剥削民脂民膏而发富者迥然不同。他们因国家地位关系，在外国不知受了人家几许折磨，故他们对于祖国前途至为关心。他们心目中都迫切地要求产生一个富强的中国，使他们在外国可以抬起头来，不致动辄招人家的白眼和虐待。

记者　是的。华侨实在对得起祖国，然而祖国却对不住华侨。

老人　这话非常对！说来，我们都应该惭愧！华侨移居南洋各地时，在那儿还没有欧美人的足迹，而当时土人非常信仰华侨，他们实居于指导的地位。假使我们中国政府稍微像个样子，有计划的予以助力，与当地土人打成一片，发展商业，振兴教育，则南洋早为我有，且可以其经济力量帮助祖国一切进步，又何致使欧美日本人后来居上？到了而今我们的侨胞在那儿几至不能立足。我们的政府与祖国同胞对他们能不愧煞！

记者　不过，华侨诸君并不以此有所慊然！他们还是热心地关切祖国一切前途！

老人　这更使我们祖国的朝野上下无地自容！你想想看！他们平空中每年要汇三四万万款子回来，即这一层，对于祖国的经济生活已经是大大的助力。况且他们自清季以来，直接间接参加改造祖国政治运动不遗余力，或以金钱，或以性命，这是人人知道的，尤其是现在掌政权的党国诸君大都身与其事，他们应如何澄清政治，发愤自强，使外人不致因我之国力削弱而凌虐我侨胞，积极地维护侨民利益，才对得起他们！

记者　侨胞对于祖国的热心，例如，胡文虎（从前的陈嘉庚）诸君，谁也不能不钦佩他们。但是就记者个人的见解看来，现在华侨领袖诸君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努力祖国的社会事业，并且要放开眼光，研究改造祖国政治的途径，加上一鞭，使它勇猛精进，那不是更有意义吗？这岂不是他们更重要的使命吗？

老人　足下所言，固属有理，我想凡是一个明白国际局

势与祖国地位的侨胞,绝不会忽视这一点,而且他们所身受的痛苦比我们更亲切,更难过,所以他们要求祖国的政治改进的心思或许比我们更迫切。我们且慢希望侨胞怎样怎样,我们(上自政府下自全国同胞)应该先反诸其身,来搜索一番看,若只希望人,那岂不是自待太薄吗?

一九三五,十,八。

三　人物月旦

1

有清中兴功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李(文忠),均为一时豪杰之士。曾天资不甚高明而用力独勤,其治学治事都极有条理,有规矩,其为文与诗亦极用心思,然而规矩准绳过于形式,往往失之虚伪。其用人也亦不能容物,每每好用不如我者,故功名之际,未免娼嫉之见存,左文襄所以与彼"凶终隙末"者以此。

2

胡文忠气度局量在有清中兴诸大吏中为最宽宏。当咸同之交,曾氏兄弟用兵皖鄂江赣各省,胡氏虚己以听,周旋

于亲贵与诸将帅之间。其调和维持之功,实非局外人所能洞悉。即曾文正亦谓其进德之猛,实所罕觏。惜其中年捐弃,不然其功业当在曾、左之上。

3

左文襄天资豪爽,在清季诸人中为独树一格,然其为人颇喜铺张夸饰。彼于曾氏兄弟攻破太平天国(南京)时奏报清廷之文,颇多微词,所言固甚中曾氏之病,然其攻剿新疆也,劳师靡饷,以少数回民盗弄潢池,而动十万之师,围攻数年,仅乃克之。后世言边功者,每侈谈左氏"头白临边",古今罕觏,实则亦未免为左氏铺张所误!曾文正招募湘勇以抗太平天国,谓之湘军,李文忠募淮勇继之,谓之淮军。淮军军费共四千万;湘军亦如之。然左氏剿回则前后用去八千万两,恰等于湘、淮两军军费之合,即文襄自身亦不得不曰"惭愧惭愧"!

4

李文忠为人,在余看来,未可厚非。彼对于新政的远见实比曾、左、胡高明。且彼对于一事一物都肯虚心研究,不敢自是。如与外人交际则必先请人为之讲解"进退揖让"之节,曰:吾一人代表国家,断不可失之轻率。(说到此处记者插口问道:"李文忠多有谓其为官未免贪婪,确否?")至于有人谓李为贪婪,实亦不确。接收淮军某大官告我:李交代淮军时,所有剩余饷银一百余万均扫数交出。据说,李实未尝滥取国帑以入私囊。(记者按:老人在清季与李合肥为知

交，其言似非虚造，然就余辈所知，证以俄国维特伯爵的记载，李与张荫桓诸人，实有受贿卖国之嫌。姑志之，以待史家的公评。）

光宣之际，如吾省冯梦华，韩紫石辈亦皆为官清慎，在君主专制时代，固属难能可贵，即置之民国，恐亦为凤毛麟角。彼等为督抚或司道多年，仍是两袖清风。今则不然！一师长，一县长，三数年，便腰缠十万或百万矣！四川军人预征地丁钱粮，竟至民国六十年，而江浙农民之苦，亦不亚于四川，天下安得不乱！

一九三五，十，九。

四 袁世凯之为人

袁世凯幼年在家遭了讼案，往依吴小轩（长庆）。吴与袁氏先人本为世好，遂收纳之。时吴为高丽钦差，彼随从至高丽，因缘际会，得由末僚而知府而道员，由道员而驻韩商务大臣。余与吴小轩为至友，袁因以前辈视余。迩时郁郁末僚，尝问计于余：如何可以飞黄腾达，直上青云？余会其意而笑谓之曰："惟厚赂宦官，由宦官而结纳亲贵，便可越级而升，宦至督抚不难也。"袁果信之，如法泡制，其效立见。袁氏复欣然告予曰："验矣！"复又问余曰："先生见事如此透

彻,代某筹策如此奇效,为何不躬自为之?”余笑应之曰:“余言之而不能行,是以未免终为书生也!”彼不知余之前言本出之以戏谑,而彼则奉之以为作人科律,又竟由此而售,遂以为我之为人果亦犹是,其浅薄如此!而民国竟以此人为开国总统,国事又安可问耶!

袁氏之为人如此。其头脑始终不出封建帝王思想,其视民国也本如无物,故对于总统丝毫不感兴趣。且彼之左右又皆欲“攀龙附凤”,“封妻荫子”,于是便千方百计拥袁做皇帝。当时余为参议员,袁命其长子克定宴余及侯官严复等,征求余等意见。余告之曰:项城果称帝,国民对之是否帖然,姑且不问,外交方面,必有强邻借此百端要挟,以遂其大欲者。袁克定唯唯不敢决。未几,彼又宴余等,欣然相告曰:外交已无问题,日本方面表示赞成。余知非口舌所能争,遂不多言,而严几道氏遂与孙毓筠、杨度诸人,入其网罗,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号称“六君子”。其在小站练兵所造就的一班武人如段芝贵,张怀芝,倪嗣冲等,则自称各省公民上表劝进。日本觑破袁氏心肝,乘虚而入,于是而有廿一条的要求。袁氏既欲称帝,势必结欢强邻,以为镇压国民反抗的奥援,其不能不惟日本之命是从,势也!二十一条中所谓第五条(此项完全把中国统治权置之日人操纵之下)一方面为希望条件,不强迫袁氏允诺,使袁氏好借此欺骗国民,以为“据理力争”,好似彼辈尚非甘心卖国者然。一方面伏此一项,预为后来进一步吞并中国地步。今则并此第五项亦不算奇事,且更有甚于此者矣。袁氏作俑之罪,固不容诛,然而就今日之局势观之,徒责袁氏,实为不恕!

袁氏之所以身败名裂，国家亦因之而残破不堪者，皆私之一念害之也。彼欲帝制自为，故不得不以国家为其帝位之牺牲，因此，更不得不“讳疾忌医”，“作伪心劳日拙”，结果，当时国民以及天下后世皆对之齿冷，真正值不得！余愿今之为政者，凡百政事全取公开态度，对于外交尤应如此。无论强邻对我何种无理要求，均须随时随地，尽情宣布，使全体国民知所戒惧，不致醉生梦死！且使强邻知政府诸公尊重民意，为民众所信赖，亦断不敢如此肆无忌惮。观日本历来对我要求，其第一条件，便是要中国政府严守秘密，虽其设词或曰，避免他国干涉，实则惧我民众群起而反对之，彼将一事无成也！然而吾国政府自前清以及袁世凯以来，均奉命惟谨，一切外交，讳莫如深，斯真大可哀矣！

一九三五，十，十。

五　上下相蒙

国之亡也，莫不亡于上下相蒙。明朝无论矣，有清末造，此种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中国的外交屡次失败，割地赔款，何尝是战败的结果，都是守土官吏平时则文恬武嬉，战时则闻风而逃，逃之后又复捏造事实，欺蒙政府，以致陷国

家于屈辱窘迫而不之惜,只要他们自己借此得免于拿问,或升官发财便得。此种事体,我所耳闻目睹的真不一而足,兹举其要者略述数事,以见一斑。

当鸦片战争既起,英国兵船唾手而得舟山县。当地守将,不战而逃之后,上了一个奏章给政府,说明英兵占领舟山的原委,他说,我们的防御是很严密的,炮台也很坚固,守土将士亦皆忠勇奋发。不料英夷乘着该地土人赛会迎神之际,装着乡民进城进香的模样,闯进舟山,虽经殊死抵御,无奈敌已入我门户,无法抵拒,只得退守云云。你想:外国人的面孔同中国人的面孔相去天渊,他们如何可以装扮中国的乡民模样?稍有常识,便知其妄,然而清政府竟被他瞒过,真是可笑!

当英国已对中国宣战并占领舟山以后,上海的镇台上了一封公文给制台说:卑镇对于防守上海事宜已有十分把握,我把我的部下的兵士从上海一直扎到舟山,层层布防,步步为营,那怕夷人来攻?你想:那时的镇台照例额说,固然有好些营兵,然而他们自上至下,没有不吃兵额的,所以实际上,一个镇台那时至多不过一千多名老弱残兵,从上海到舟山,有千把几百里路,怎样能以用他一千多兵去布满?这不是一个大笑话吗?然而清廷不察,竟为所骗!

再者:我们镇江那时城上原来安设了几尊自造的火炮,当英国兵船停泊在镇江江面时,城上守兵已闻风先遁。有一个剃头司务,下午生活做了之后,吸着烟上城隍上面闲逛,看见有几个铁炮在那儿,他本人并不晓得这种东西的厉

害，并且不晓得里面装满了子药。但他的下意识却已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偶然用他的旱烟头对着铁炮后门敲了两下，那晓得烟袋的火正碰着引火绳，于是轰然一声。这个剃头司务看见闯了祸事，连忙偷偷地跑了。但是他这无意中的一炮却正打在英国兵船上，虽没有打到要害，然而总算是打中了，英国兵船的舰长便着了慌，以为中国起来反抗他了，并且已有很好的炮手，这还了得，"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于是，英国兵舰真的开跑了。镇江的守将本来听说什么人放了炮打了英国兵船，以为这末一来，要"吃不清兜着走"了。后来，听说英国兵船开走了，他们却堂哉皇哉，上了报捷的公事，铺叙他们怎样对英兵作战，怎样开炮，怎样打得英国兵船丧胆而逃，一篇"丑表功"的文章，说得天花乱坠，清廷果然照着斩将搴骑，攻克城池的先例，赏赉有差！这些零星的轶事，似乎有点不近情理，然而确是清末的史实！（记者问：现在的中国当局视前清末造怎样呢？老人只露出满脸的苦笑来！）

一九三五，十，一二。

六　德俄之战与日俄之战

记者　今日叩老人以意阿战争若果延长，欧洲局势，将

有若何变化?

老人　(大声道):变化大着呢!若果战事延长到几个月,欧洲便会大大地改观。因为德国必然要趁着意大利无力顾及欧洲的问题时,与奥地利、匈牙利及波兰联合,这种联合结果就是对法俄的战争。

记者　又问:若果德与俄法果有战争,胜利究竟是在哪一方面?

老人　(斩钉截铁地答道):胜利自然在苏俄。因为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有苏俄那样的强力;因为除了苏俄,没有一国不是四分五裂的,他们的政府对于人民只能拿住一小部分,对于一大部分是处在敌对的地位,所以对外的力量是要大大地打折扣的!苏俄则不然。他有一万万几千万人民,他的人民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他们无论对于什么事体都是用全国的整个民众的力量去干。就是说,他们把一万万几千万人民结成一个单一体,试问世界上有哪一国能以集合如许的力量去和他厮拚?结果,只有他能战胜敌人。单就这一桩说,我是赞成苏俄的。不过他的集中主义太厉害,结果,个人得不到什么自由,这一层我是大不以为然,也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

记者　又问:若果德俄战争起来,日本是否和德国结成联合战线,东西夹攻呢?

老人　(很慎重地答道):自然,日本的军阀们很愿意这样做,但他们若果不先把中国问题妥当地解决了,那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呵!因为日本的军人虽然对中国是万分颟顸,但他们对于苏联,恐怕不敢这样造次罢!

记者　又问:老先生所谓对“中国问题妥当地解决”,是不是指把华北政权完全拿在手中而言?

老人　(摇摇头):这还是形式!这一层或许在日本的军人不大为难,我的意思是说:日本若能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国家观念,以及人民实际利害的冲突,消灭得泯然无迹,那时,他们便可放手同苏俄作战。不然的话,恐怕要日本军阀政府的命的,不是苏俄,而是普遍地深入中国民族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情绪!

记者　又问:华北问题,照现状看来,日本帝国似乎已没有什么忧虑?

老人　(又摇摇头并且摆手抗声道):不然!不然!日本帝国绝对不能达到这种目的!须知中国究竟不是朝鲜。他的政治,在现在虽然令我们处处抱着悲观,然而他的社会深处却燃烧着火山似的烈焰,这种烈焰是近数十年来的中国自身之发展与国际间的历史所赐与,任何强力都不能消灭。不但不能消灭,日本政府的行动适是“火上加油”,终久他只是“惹火烧身”,“蠢蚕自缚”罢了!

记者　又问道:“然则日本帝国终不与德国东西夹攻苏俄吗?”

老人　这自然难说!或许日本政府要视此为千载一时的机会,到了那时,历史是会给他一个正大公平的严厉的裁判!

一九三五,十,十三。

七 关于本届全国运动会

记者 日来在上海开的全国运动会,老先生对之有何感想?

老人 我对于这个运动会很有许多感想。先就好的方面说,在这个运动会中,全国有三千多男女选手,他们有健全的体格,有各种运动的技能,凡于东西洋青年学生所能以表演的技能,他们也都能应有尽有地表演,与东西洋所谓文明国家的运动家相比,可以说,毫无愧色!而且我们的所特有的体育如太极拳,实比西洋的各种激烈运动更有益于身体。总而言之,这个体育会,就是表现给世界各国人士看:他们所能的,我们也一样地能。我们平常最惹西洋人看不起的,就是中国的女子,他们以为中国女子总是小脚并且纤弱不堪,现在我们的女青年的好身手,哪一样比她们西洋女子不如?她们一样地有西洋女子的健康美,而且是独具东方风格的健康美!说到这儿,我非常快乐!

记者 老先生足迹遍东西洋,在老先生的观察看来,东西洋文明国的女子品格,比之我们中国的女子究竟如何?

老人 那也要算我们中国的女子为最好。西洋的女子,譬如德国或法国的罢,百人而九十九都淫乱不堪,就是说,她们无所谓贞操。政府大员都是公开的宣淫。在巴黎有一个笑话,叫做"评箫",怎样叫做"评箫"呢?就是巴黎有一个顶出色当行的名妓,她的色艺俱佳,而尤善于评骘当世名人如达官贵人的下体——生殖器,那时凡巴黎的名人的

下体没有一个不经她鉴赏过,评骘过的。生殖器形似洞箫,故名曰:“评箫”!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中从来不曾有过。在东洋某国也和西洋一样,彼国女子与人发生肉体的关系,简直是家常便饭。当我在东洋时,有一个法国朋友,他是法国驻日大使馆的参赞,曾经告诉我,此间的女子最好纳交,任何女子只要我看中了意,没有不是“探囊取物”似地,从心所欲。但是我曾恋爱一个广东女子,用了三年工夫,竟然不曾到手!任你送她什么东西,都不能打动她的心!云云。这一层我们中国人也足自豪!但是足下要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的青年男女故步自封,而是要她们知道:我们只须学人家的长处,但不得连我们的自己的长处也抛弃了。

记者　老先生对于中国男女的体育问题及我们中国女子所固有的长处,说得非常中肯,但是老先生相信中国的女子将来不会也变成和东西洋文明国的女子一样的行为么?

老人　这却不敢说,但我总希望她们要保存着我们的固有的好处,以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最妙!

记者　但是我对于这次体育运动会的意义,还要有所请教,就是在这个国难临头的时候,朝野上下用全力来干这个运动会,对于亟亟可危的国家局势究有几微之补否?

老人　(摇摇头并且蹙额而叹曰):那却是“文不对题”!“文不对题”!这种选手运动不但于国家前途无几微之补,并且有害于全国民众一般的体育运动,因为这种运动是畸形的发展,只足以耸动人的耳目而已。且就余个人

办教育的经验看来，此种运动给各校的学生造成一个特殊阶级，这些选手平常只注重运动，十有八九，其他功课都不能及格，然而学校当局为的要他们在运动会上撑门面，遂对于他们事事优容，结果遂害了他们。待到他毕业以后，除了在学校中任畸形的体育教习外，简直没有他种生活技能，这实是当前一个大问题，余希望全国教育界诸君子深切地注意及之！《申报》记者似已顾虑及此（见十月九日《申报》时评），可见非余一人之偏见也。

一九三五，十，一四。

八　中西学术的谈屑

“致知在格物”这一句话，在哲学问题上，非常要紧。所谓“致知”就是哲学，即西人所谓 Philosophy，所以 Philosophy 应译为“致知”，“哲学”二字实不妥当。致知的工夫即是格物。不过中国二千年以来，没有人真切懂得这两个字，朱熹的话，所谓“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实在是“囫囵吞枣”，没有道着痛处。到了阳明，更是笑话，他遇物便格，弄得头痛，更是不曾摸着“格物”一词的边际。实则所谓格物，第一步工夫就是把各种事物下一个 Definition. 这个字，徐光启先生把它译做“界说”，真

是恰当之至。所谓界说,就是“分析”,就是把事物分成各种类别,使它有一定的界限。(记者按:荀子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而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而后止。”(见《正名篇》。)亚理斯多德之所以为西方哲学的开山老祖,其功也就在于“分类”,在于创定“界说”,给后人指出致知格物的门径。(按老人此种说法,殆就形式逻辑的哲学言之也。记者。)

“方程”与“比率”。余少年时代,研究数学,对于中国的《九章》颇曾用过一番工夫。中国的“勾股”就是西洋数学当中的微积分,而中国之所谓“方程”就是西方数学当中的比率。方程之义,古云“方此程彼”,譬如“一与三之比”的一个算式,以此一方式为比方(亦云“效也”“仿也”),为准则,便可以推出“彼”一方式,就是“程彼”,如“三与九”之比,这便是比率。

“少广”与 Extension。Extension 义云“扩大”,“外延”,“伸张”,又曰“广袤”,在数学上则为以长度,阔度,高度,加上时间(故称之为四度空间),以测算物体的方法。中国数学上的少广,也是推算从小推而广之的数目,物体或时间的。“少广”就是西洋数学上的 Extension。所以译 Extension 为“少广”,以余之意,再恰当没有了。把中西的数理,融会

贯通起来,也是我们研究西洋科学的一种乐趣!

一九三五,十,一五。

九 我的幼年

我的祖籍原来是丹阳,而我自己却生在镇江。兄弟五人,夭者二而存者三。余居次,后来做《马氏文通》名建中的,是我的老三。父亲年十四岁时便孱弱多病,因研究医学,廿七岁身体重新健康起来,遂在镇江行医。他的心非常慈善,对于贫穷人家,一律送诊,分文不取。遇有害疮疥痈疽等症的,亲手替他们洗涤,敷药,包扎,我小时看见了便恶心,他却处之怡然,一点也不怕龌龊,其惜老怜贫如此!

我八岁在家塾里正式读书,到了十一岁时,独自一人从镇江跑到上海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晓得,自己积得几块钱盘川,搭了内河民船,遂离开我那可爱的第二故乡(镇江)。现在从镇江到上海,若是坐火车,顶多不过四五个钟头,乘大轮也不过一天的工夫,但是我那时坐民船却整整走了十天。

到了上海之后,因为友人介绍,我遂到徐家汇这里来,进了法国人的天主教会所办的学校。当时这个学校只有四十个学生,我在同学中间,天资还不算坏,晁教习很喜欢我,

他教我各种自然科学,我非常有兴趣,而我对于数学更特别欢喜。到了我的自然科学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又教我致知学,即世俗所谓哲学(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我这时已二十岁了。然而当我十四岁时,已在学校任助教的职务,一面当学生,一面做先生。因为我的国文比较有点根底,本校各班的国文,经学,都是我教,这其间我却得了不少的教训和经验,"教然后知困",于是我的学业,自己觉得比从前更有进步,更加切实。

到了二十三四岁时,我开始学习天文学,并且一方面研究西洋的数学,一面研究中国的数学,如开方,勾股,等等,初学时甚为艰苦,中国算术中的开方中有所谓"赤方""王方",当时我简直莫明其妙,后来不知道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这种算法,始得到理解。我得到会通中西数理的枢纽,心中异常快乐,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灼灼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于是我始悟韩昌黎所谓"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实为笃学之士的甘苦之言!

后来我又读了四年神学,神学在教会学校中是最高的学问,又做了一年为神学而做辩护与宣教的研究,经过考试之后,我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但是我虽研究神学,却没有放弃我的数理的工夫,我遇到对于数学有创获时,都笔之于简册,后来竟积有一百二十多卷,余命名曰《度数大全》。惟在少年时代,一往直前,不知道爱惜和保存以前辛苦所得的成

绩,公之于世,遂令其散佚无存,到今儿想来,实有点可惜!

一九三五,十,一五。

一〇 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

余正式在学校读书的生涯,至获得神学的学位便算告终。毕业而后,我们教会里就教余在徐汇中学任校长并兼任教务。余当时的研究有三方面:一,神学,二,哲学,三,数理。神学为我们宗教徒必修的科学,而且为最高的学问。哲学与数学则为余最有兴趣的科学。神学的对象为第一原理,为造物主,其最终解答为不可知,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哲学与数学的对象则为可知之物,即由浑而求其画,由显而求其微,由具体而求其抽象,或由已知推知其未知。余当时虽任教职,却仍努力于斯二者。但余对于校务与教务,亦未敢丝毫忽视,学生每逢考试(科学与童子试),应试者颇多,余必亲自送考。说来也很奇怪,这些学生虽已入学堂,而应旧时考试者反多能获选。故余虽为教徒,而对于学生的中国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颇知注意。教会中人因此不放心余,惧余把学生都变为异教徒(孔教),遂命我专任研究天文的责务。但这时徐家汇还没有现代研究天文的仪器,只有利玛窦从

前用过的一架旧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就转而专攻数学。但是,就这样他们还不放心我,终把我调到南京,派我译数理诸书。余颇不耐,因为余在徐家汇已译著有数理书百余卷,尽皆束之高阁,不为余印行问世,多译多著何益?(余意当时余之著述之不能出而问世,实有两种原因:一,不以余为然者的作梗;二,无人能鉴别余的著作的好坏,遂使余数年辛苦,付之蠹鱼!)兼之,当时在南京教会中一个厨子是一个极龌龊的外国人,他做的饭食简直不能下口,而且极有碍于卫生,于是我就不辞而别,自己一个跑回上海。

这时予长兄建勋在淮军办理粮台,深得李文忠公的信任,而山东藩司余紫垣先生,是长兄的至友。因命予往山东就余学习作宦。余因家兄之故,极优待予。又因予谨慎,遂命予掌理文案。后来他兼署鲁抚,遂把他的藩司的牙章交予,除极必要的公文须请示于彼者外,均由予代为画行。余藩司的幕僚以及山东官场中人,皆乐与予谈,因为那时一班旗汉的官僚,眼光均未出国门一步,对于世界各国的情形,一点也不晓得,予则与教会中西人往来者多,又因余多读西书,故东西南北,四海九州,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这在那班面团团的朋友们看来,我实在了不得,故遇有国际问题发生,多就商于予。然而彼辈因谬于中国独尊之见,总是“夜郎自大”,与之谈瀛寰事,犹之乎同他们谈《西游记》“华胥国”差不多,未尝置信也。李文忠却不然。文忠极好问,彼与曾文正不同:文正庄严自重,文忠则脱略礼貌,好与属僚谈心。有不知未尝不问,问后未尝不解。余当为之讲述西洋哲学问题,文忠闻而豁然贯通。忽一日问同乡某道员道:

“何为抛物线?”某答曰:“撒溺就是抛物线。”文忠哑然!文忠之问固可钦佩,而某道员的善于譬喻更是妙不可言,真如庄子所谓“道在溲溺”了!

一九三五,十,一六。

一一 杨谷山孝廉服官秘诀

余前面已说过,余紫垣先生很优礼予且信任予,当他兼署山东巡抚以后,便委予接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差事。当时这等局所都是红候补道的美差,他们只要得了这种差事,便可赚一笔大钱。我却是一个书呆子,方在强壮,满心想做事业,并且极力要好,但是也就马上碰壁。山东机械局也是那时的新政之一,听我差遣的人员不下一二十位候补官员,工人有二三百人,还有二百多名卫兵。局长月薪五百元,这是那时山东候补道班的差事中最高的薪金,局长以下,依次递减,但薪水都比其他局所为优。由此就可见全局的开支是如何浩繁了。但说到它的成绩,那真令人好气又好笑,气要气得你怒发冲冠;笑要笑得你肚儿作痛!所谓机械局,其实就是制造枪械火药的工厂。试问它每月造多少枪支呢?在余任事之前,十天只出一支枪(记者按:现在的政府究比前清高明多了,譬如马尾的海军飞机厂,每年能造一架飞

机,虽然重要机件还是舶来品,然而飞机是如何庞大的东西,一年一架,在中国已属难能可贵,那时山东机械局,视之诚有愧色!)它造子弹火药也都用的是土法,每月出品自然同样有限。予任事之后,完全改用西法,制出火药,要合三钱五分一斤,但是呈报到了户部(即现在之财政部),户部批驳了,说是照例,火药每斤只费成本七厘,如何现在反要三钱五分一斤?不准。实则从前的用土法所造的火药成本虽轻,然而它的质却较余用西法的出品差得远,就是说,用西法所制出的火药其爆炸力比用土法制的强得多。但是上行下的公事是没有理可讲的,怎么办呢?于是就不得不请教于户部中的部员。适有户部郎中杨谷山孝廉,是予长兄的朋友,我写信去问他,他回信说:这事容易,你把"斤"字改做"磅"字,重新呈报上来,我包你批准。余如法泡制,果然,不久户部回文到了,"准如所请,实报实销",你看!前头三钱五分一斤(十六两)说是太贵了,不准,后来三钱五分一磅(十二两)倒准了。前清政府的官吏,尤其是旗人中的官吏之昏愦糊涂到如此地步,焉得而不亡!

说到此地,余又想起了杨谷山孝廉的另一妙论。他在李文忠公处过得很久,深知文忠之为人。他告余说:上公事给中堂,到了公文的末尾,总要故意弄出一两句似通非通的话头,中堂虽然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日万机,然而他的书生积习未除,遇到属僚上他的呈文之中有一两处不通的,他一定援笔批改,但是改过之后,这件公事便立刻发下施行。若是你的公事做得一点瑕疵没有,他看过了,随便朝旁边一放,那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把它批出来。这也是我

屡试屡验的。一个身当大任的人,只要有一点短处,左右都要乘隙而入,此在专制时代,固然没有例外,即在现在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社会未底于真正的民主政治,此种现象绝不能消灭,无论如何明察的人都无术以自免。

一九三五,十,一七。

一二 文 谈

记者 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学有什么见解?

老人 以余看来,研完中国的古文,自然要以《左传》为第一部好书。它的好处在什么样的体格都完备,什么样的美都有。有时候大气磅礴,真似长江大河;有时候细针密线,又似天衣无缝;有时挖苦人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时同人辩驳又语妙天下。此种谨严巧妙,几夺天工的文章,不但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视为宗匠;即现在做白话文,也应当奉为圭臬,至少要把它的不朽处承袭将来。

记者 太史公的文字怎样呢?

老人 太史公的文字实在是直接左氏的薪传,不过左氏之文,只是所谓"记言""记事"之文,而太史公则进了一步,他的《史记》实是对于当时政治的一个反动。他的《史记》不独记言记事,并且含有一种极悲愤的情绪,如他的《游

侠列传》,竟说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这已非左氏之文所能有。至于他的《平准书》,尤其是《货殖列传》,更足见《迁史》的经纶。

记者 《左传》文字前半部与后半部简直两样。前半部的局势谨严,后半部的气度恢宏。

老人 (反问一句)什么道理呢?

记者 或许是春秋前一期还是封建经济时期,局度还限于部落的比较狭小的范围中,到了后来,经济发展,交通日繁,商业资本形成,已开战国之局,故其为文亦变而为浩瀚雄伟。

老人 (点点头又道):说也奇怪!左氏与司马迁之文与李、杜之诗,真是百读不厌。李太白的天马行空的天才,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他的诗却不能学,我们亦不宜教后生去学他。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而他的性格却与李不同,他处处要积极救世救国,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也是无美不备,细腻处真是“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意境高妙处,却又是“想入非非”。我们虽然学不到它,其实更不必死板地模仿它,然而它确实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极好的模范。不过杜诗虽是千古不朽之作,而他的赋却就一无可取!于此已可窥见文学与实际的社会生活密切的关系!

记者 唐代诗人以李、杜为之最,而文章则多称韩愈,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先生以为如何?记得顾亭林曾说过,假使韩文公仅作《原道》等等几篇文字,便无瑕疵可寻(大意如此)。实则此言大谬,先生又以为何如?

老人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实在是一篇好文章。至于《原道》诸篇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实在不成东西。后人之所以称道他的，全是儒家守旧的见解，不足为训，足下之意恰与鄙见吻合。《祭十二郎》的好处就在它完全出于天真，不是矫揉造作的。这其间也透露出文学上的必要条件。

一九三五，十，一八。

一三　我与高丽

余从山东潍县机械局交卸以后，即离开那儿，后又奉李中堂之命去那儿调查矿务。余告中堂，山东无多矿产，何不到山西去调查？中堂慨然道：此非余权力所及，奈何！余遂往，勾留半年。余留山东前后计有三年之久。光绪七八年间（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随黎公使（庶昌—记者）赴日，任领使馆参赞，后改任神户中国领事。约大半年，旋因大家兄病，回国。到南京，适李中堂轮泊金陵，友人怂余往谒，时为七八月之交。余着纱马褂，纱袍，见中堂。中堂一见之后，便命余随往天津。余一身之外，无一物，随侍中堂做长谈。中堂面舱门而坐，余则背舱门而坐。轮出吴淞口时，皓月当空，凉风飒飒，已是深秋气候。中堂御棉绸短袄，而余则单纱披体，寒气砭人肌骨，然而余时作客，不便多言，

只得勉强支持。中堂初不留意，后忽然看我独着单衣，回顾自己，猛可地道："来人！快开余衣箱，检两件衣服给马先生穿！"其待人之不拘常礼，而寒暖与共如此！

到天津后，适高丽政府向中堂请派三舍弟建忠（号眉叔）往韩，襄助办理该国改革新政事宜，中堂方需三弟甚殷，不能放他去，遂命余前往。高丽政府亦晓得我，表示欢迎，余遂乘丁雨亭（汝昌）兵舰赴高丽。原来高丽政府分两派：一派以大院君为领袖，反华亲日；一派以闵妃为之魁，反日亲华。余到韩后，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改用西洋操法，请先以千人试办。不到一月，居然步法整齐，军容甚盛。次则整理他的外交，从来西方人士对待中韩政府外交官吏，傲然自大，一点礼貌也没有，余则先就学问知识方面折其气，并暗示彼等：君等勿傲然视中国人士，君等所能，吾亦能之；君等所知，吾亦知之。然后居之以礼貌，绳之以法律。不久，他们便彬彬有礼。但高丽政府暮气已深，余虽拼命地卖气力，他们始终口是心非，敷衍搪塞。举凡我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开头时，他们莫不一口应承，即时兴办；然而过了两天再去问他，则又喃喃然答道："容再商量！"于是百般计划都销磨于无何有之乡了！

余所处的地位如此困难，所谓"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又默察高丽社会的等级制度太严，如全社会分三等：贵族，士大夫，民。平民不得与贵族士大夫齿，虽位至将相，见了贵族或士大夫还必定要磕头行礼。此种腐败情形简直和中国一样，故余常言：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因是我就回天津见李中堂，报告一切，并陈明不

愿再去。中堂问:何以故?余劝中堂对高丽应早决定政策:或听其自主,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亲差大员,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高丽始有挽救的希望,中堂道: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言下有不胜其太息者,然而中堂之言却果然应验了!

一九三五,十,一九。

一四　袁世凯与丁汝昌

袁世凯与丁汝昌这两个人,都是中日战争中的重要脚色,也是余在高丽时与之极有关系的人。袁世凯到高丽时,年纪还轻,大约只得十九岁的光景,在中国军队驻扎高丽的总统吴少轩(长庆)之下当一个小分统。余在高丽任改革彼邦政治襄助事宜,与吴总统开诚相助,关系极密,而吴又与家兄为把兄弟,故视余为兄弟行,呼余为"老二",而以老大哥自居,故袁对余甚恭谨。但余对袁凡百皆处之以公正的态度,袁往往以私相干,余不能尽如所愿,故毁余于吴,说余常挟妓饮酒,在公署带着妓女困觉,官方不检。吴小轩人甚正派,且平生不二色,所以最讨厌这种事情。袁的谗言,吴虽不完全相信,然心中终有些怀疑,且他又待余甚厚,必须将此事调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一日清早(大约四点多

钟),余方在酣睡,小轩忽一人跑到余的办事处,直入卧室。余一榻独眠,相见甚欢。余问彼:何如是之早?彼含糊应之,未尝明言所以。余问彼:用过早点否?彼答道:不曾。余又曰:我命厨房预备一点咖啡面包做兄早餐。彼道:不必。遂命余陪彼到余办事处中各房参观一遍,匆匆而去。余当时茫然,后来才晓得是这末一回事!余莞尔而笑道:不但在余房中找不到女子,连一只绣鞋儿也找不到!然而余对袁并未尝有所嫌怨,因为余那时气概方盛,自待甚厚,不把此种事放在心里。到了余要回天津时,袁来见余,求余替他在中堂处说好话,保荐他为驻韩商务委员。余应之。见中堂提及此事,中堂道:这个年轻孩子,如何可当此任?余因知高丽之事已无可为,而一时又无相当人材,遂将此事陈之中堂,中堂遂允所请,而袁氏遂弹冠相庆矣。世人有责袁实系败坏中韩关系与引起中日战争的罪魁,言之固未免夸大,然而袁之做官心切,对于国事本无忠诚,恶恶而不能去,余亦不能辞其咎!

丁汝昌本为捻匪出身,人甚粗卤。后为李中堂收抚,遂任海军将领。他的为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到了每个地方,都要叫些妓女狂欢。但是他的精神却好,一旦上了兵船,便一心干事,不敢怠惰。兵船行驶时,他总是登在舵楼上,看着舵手驶舵。中日之战,中国海军精锐,全为日本所歼,丁雨亭也殉难。他的死实在很苦。当时中国本有四只“元”字号的大战舰,惟舰长(多福建人)皆庸懦不堪,未见日本兵舰,先就弃船而逃。而且日本陆战队由山东日照登陆,沿途经过吾国炮台毫未遇着抵抗。到了威海卫,炮台长官

又不战而逃,以武器送给敌人,于是日本兵就用中国炮台的炮攻打丁雨亭所统带的兵船,丁雨亭苦战三月,日本终日炮击,竟未能加害于他,然而他终于不屈自尽而死。据说,日曾服其忠勇,屡往说之,劝其赴日,皆被峻拒。世人纷纷说彼已降日本,并做了日本的驸马,真是妄言!那时中国海军还有一件最痛心的事。就是中日海战之际,中国兵船开炮,炮弹落在日本兵船上多不炸,剖开看看,则所谓弹药皆是泥土!一国不能自制军械而仰给于人,终免不了此种痛心之事。古人说得好:"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悲夫!"

一九三五,十,二十。

一五　和百十来个鸡毛帚周旋

武昌起义后没有好久,江苏的党人联合新军,也驱逐了盘据南京的张勋。江苏巡抚程雪楼,便丢了纱帽,做了本省的第一任都督。但是当时江苏(其他革命的省份,想来也大致都和江苏一样!)的头一任都督实在不容易做,因为一些革命党人和一些新军的下级将领,都荣升了高级将领,在那时,还了得!自然都是天之骄子。有一天不晓得因为什么事,有百十来个革命的军官都穿着礼服,头上个个都戴着礼帽,帽儿上都高高地插着一个白鸡毛帚儿,在都督府的大礼

堂上叫骂喧吵，互相争功：甲说：张勋(是我)赶走的；乙说：天宝城是我打下的；丙又说：不是我从孝陵街冲到城边，接应革命军，如何使张勋丧胆，弃城而逃？闹得一塌糊涂，甚至要挥老拳。程雪楼本是一位好好先生，又是初从清朝脱壳的官吏，已对这些革命将领输了一筹，他吓得简直要"逃之夭夭"了，大家自然以为这一着关系太大，不放他走。他于是便转而要求我去代他向这百十来个革命的"鸡毛帚儿"说话，意思就是敷衍敷衍他们。我起初不肯，笑着说：对付这百十来个志骄意满，将有大欲存焉的鸡毛帚儿，绝不是口舌所能为功的，无奈程雪楼苦缠不过，于是就不得不冒险尝试一下。

我见了那百十来个鸡毛帚儿，一个开山白道：

> "诸位！你们都是革命党人！都是为革命而志愿牺牲的革命军人！但是我要说一个故事，比方给诸位听：一个老妈子看护小主人，日夜吃辛苦，须得要报酬；但是皇太后抚养皇帝，皇后抚育太子，虽然，她们是在抚养一国的君主，功劳比老妈子看护小主人要大得不可比较，然而皇太后，皇后却不曾要报酬，要工钱。诸位！你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皇太后，皇后，而不是我们中华民国雇来的老妈子！你们的功劳辛苦虽大，却都是分所当然！

这样把他们一抬，他们始而有点茫然，虽然恭维他们了不得，骨子里头却是责备他们："你们纵然对于革命有功，也

都是分所当然,有什么希奇?”于是那百十来个鸡毛帚儿又快活,又难过,然而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确实被我这一盆冷水浇下去了!于是我又接着说道:

> 诸位中间一定有许多读过西洋历史或是到过东西洋的,我且说一件事给诸位听。当我在巴黎时,亲眼看见法皇拿破仑第三的骑兵队大操。当时参加操演的骑兵队总有八千,一个立正的号令出来,八千骑兵在旷野中一并排站着,马头低昂一致,好像刀切是的,这样的兵法部勒,可算是难能可贵,然而被毕士马克率领普鲁士的军队,打得他一败涂地,身为囚徒。诸位不要见怪!你们在军事上有谁能以学得拿破仑第三百分之一二?我大胆说一句,恐怕未必!那末,诸位也就可以恍然大悟了!至于张勋,本是一个粗卤武人,其军队又不堪一击;而且武昌既下,广东,山西,湖南,安庆,皖北,浙江,相继独立,其势已成了猫儿爪下的小老鼠,然而许多的猫儿守着一只小老鼠,竟被他逃过江去,还有什么功儿可言!

这一番话说得他们狗血喷头!然而转而一想,他们今日要功索赏,固属大失身分;但是他们总算尽了相当力量,于是又勉励他们一番,不要自待太薄,要做“中华民国的皇太后,皇后,而不要自居为一个雇佣,则某于诸君有厚望焉!”于是这一百多来个其势汹汹的鸡毛帚儿竟被我安然敷衍过去,替程雪楼唱了一出空城计!想来真是好

笑!

一九三五,十,二一。

一六　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第一个黄花岗纪念日

辛亥革命后第一个黄花岗纪念日,南京政府开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很多,而军人到的尤多。会场上的鸡毛帚儿一簇一簇地,压倒了一切,据说有千把。这些鸡毛帚儿的人物都自居革命的功臣:人人都自以为功高贵薄,心中“怏怏”,于是就形之于辞色,而“拔剑击柱”借端生事的情形,便时有所闻。南京政府大有“粥少僧多”应接不暇之势。纪念会时孙中山亦在座。我向来是喜欢躲在人后面的,但是到了开会时,他们定要我说话。我当时看了那成千的鸡毛帚儿的革命将领, 感触万端, 也想乘这个机会, 一泄胸中的块垒, 于是我就不客气走到演说台前。我说: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这两节话皆是做革命党的必要条件。但前一节的三句话,并不是并排的,而是说要不为威武所屈,就要贫贱不能移,然而贫贱不能移,我们

还可以做得到，至于富贵不能淫，便非有伟大的精神不能，所以这一层工夫最难。以上三者都是消极的革命精神。但是若果不具这三种精神，便休想积极奋斗，所以“人必有所不为”就是这三句的注脚。有了这三种“不为”的精神，才可以做有为的革命奋斗。黄花岗七十二雄鬼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榜样！

黄花岗七十二雄鬼，七十二烈士在生前都和我们在座的诸位同胞，尤其是在座的诸位革命军人，一样地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地有生活的欲望，但他们为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多数同胞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抛弃了他们个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为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幸福和生命，却先牺牲了他们自己幸福和生命。他们必然是先有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然后才可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的死不是消极的自杀，而是积极的革命。所以我说，黄花岗就是我们在座诸位同胞，尤其是诸位革命军人的一面镜子。请诸位各人拿这个镜子，趁着今天这个纪念日，先把自己照一照，古人说“人之心不同，如其面焉”，然而“诚诸中者形诸外”，大家对着这个镜子，看一看，那你的原形：

（一） 是不是真正为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多数同胞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而来革命？是不是为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多数同胞的幸福与生命而革命？”

（二） 是不是可以做到“富贵不能淫……”？返过来说，是不是为着都督、总司令或大贵大富而来革命？

（三） 诸位试将腔子里一些东西，都赤裸裸地拿出来

照一照,是不是有什么自己觉得惭愧的地方?

一定是"肺肝如见","须眉毕现",那这个镜子(黄花岗)可以成为一个"凌烟阁",也可以成为一个"照妖镜"。或此或彼,就在诸位的自身的行为与方寸的作用了!

我并不是要借故骂人,实在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大家居然不以我的话为太放肆,反拍掌欢呼,中山先生亦很以为然。然而黄花岗究竟作了"凌烟阁"呢?抑"照妖镜"呢?那却要国民自己来下判断了!

一九三五,十,二二。

一七　从高丽回国以后

我从高丽回国后,就跑去见李中堂,请他及早决定对韩政策:让其变成一个 Independent 的国家,或则积极整顿,做有力指导,如我前次所说的。中堂说:"话固然是不错,但要你自己去对总理衙门说去,我包你碰大钉子!"意在言外,就是说,他们如何能理解这些政策!我看了中堂这样的扫兴,我自然也就不多说了。从此以后,我便感觉到清政府的寿命已不得长久,旗人的脑满肠肥已万不足与有为,于是就决计摆脱宦场。这里我要插叙我亲身阅历的两件故事。高丽朝贺中国的使臣赵

某告诉我说：高丽每年朝贡中国，照例进贡高丽参一千斤，白银三千两。使者到了北京，并看不见清朝皇帝的面，所谓朝见，只是使臣到了宫内门附近望着理藩院墙壁叩头请安而退。赵某为高丽极有远识与才干的近臣，身受此种待遇，如何能有好感？而清朝犹夜郎自大，至死不悟——这是一件。第二件是清皇室贵族之般乐怠傲，无所不用其极。旗人上自王公下至士大夫终日无所事事，甚至在戏院中过生活。光绪皇帝的父亲是一个代表，他常在戏院听戏，大腿跷到二腿上，闭着眼睛，一手敲着大腿，拍着板儿，跟着戏台上哼个不歇！所以他们的知识都是从戏台上得来的。慈禧太后夸奖她的最得意的勇将道："你是我的黄天霸！"你想可笑不可笑！我看到这儿，更把从政的心事打消得干净，又重新过我的书生生活。继续研究数学，翻了一部数学书，又翻了一部西人优待海船水手的习惯法的书。但时事相迫，终不能关起门来享清福。李中堂时锐意举办新政，招商局办理有年，然成效甚少，每年需要政府补助经费至八十万两之巨。于是中堂一面任余三弟建忠为招商局总理，一面要彻底明白该局在全国究有几多财产。因三弟在中堂左右，一时不能离，遂命我赴各处调查，从天津，汉口，上海，烟台，厦门直到广州，我都细细地把它调查了一番。原来前清政府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是上下相蒙，报销总是以少报多，招商局在各商埠码的地皮是它的一部分大财产，然而实价一则报告政府总要加十倍。我到各处把它清理出来，并照当时实价估定数目，又按照商业发

展地价增贵。预计其增加的数目,一方面又计算该局每年经费若干,该局一切财产及营业收入若干,两项相抵,每年盈亏约若干,照此情形下去,再有若干年,便足自给,再进一步,便可获利,均一一列表陈明,中堂一见便了然于心。不过当时总理衙门对于李傅相之一切行动都要加以干涉,即招商局兴革事宜,也要得其批准后,才可施行;而且必须行贿,才不致横生枝节。中堂还有书呆子习气,不肯行贿,然当时之天津海关道,却背着他代为送人情给总理衙门及各重要中枢!

一九三五,十,二三。

一八　刘省三(铭传)与张香涛(之洞)

我因调查招商局事宜到广东,看见香港给英国人占了去之后,商业发达,不但广东的商业被它夺了去,即英人以外之外国商人也都受它的压迫,引以为苦。我上了一个条陈给两广总督:把香港对过的“九龙”辟为商埠,建筑市场,招引中外商人,到彼贸易,修一铁路直达广州。外国人士也都皆赞成我这种计划。但当时两广总督为张香涛,我和他不认识,只得把这个条陈托他一个同乡送给他。他看了道:“满好满好!”但是把它“束之高阁”,我直等了他三个月没有

消息,便讪讪地离开广东了。哪晓得我所乘的怡和海轮在福建海面遇了险，几几乎把我的老命送掉。原来这个海轮是铁壳子，很坚固，只因为该轮船长任职已久，照例再有一班便可给假回国。他老先生因此快活得不了，天天吃酒行乐，哪晓得“乐极生悲”，一大意便把船驶错了道路，一头撞到一个岛屿附近的礁石上。船主便命把下舱（三等客舱）关闭，这末一来，便要活活地把那一舱的中国客人淹死。我当时住在顶上头的官舱（即今日所谓“大餐间”)，听了这话，就去见船主，教他立刻开启下舱舱门。不然，我将来要在英国公使馆告他，他不得已才把舱门开开。我在这破船上守了三天，然后被怡和轮船派舢板船救出，送到厦门。

当时刘省三做台湾总督。他本是淮军的将领出身,我的大哥也是淮军中的官员,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家人。听说我到厦门,省三便电邀我到台湾去。到了台湾,他要留我在那儿帮忙。又因我稍稍读西书,研究一点科学,且稍稍会说几句外国语,所以对我很优待。我因为他个人喜怒无常,又好自作聪明,不可与共事,就托言:老母在堂,未便远离,不能久留。他留我在那儿并不是真要我替他做事,不过天天陪着他下围棋;又因为我的围棋是初学,天天输给他,他便高兴得了不得。他后来保举我,说我“学贯中西”,那并不是他看中了我的学问,乃是围棋输给他的缘故！在刘处住了不久,便接到李中堂的电报,教我到天津去。我到了天津见了中堂,便把我的计划——开辟九龙商埠——报告中堂,他拍案道“好极！我没法请总理衙门批准,但必须张香涛具

奏，我不好出面……”因此我的计划依然成了泡影！

一九三五，十，二四。

一九 其昌洋行与招商局

在未说“其昌洋行”与“招商局”的关系前，我先要说一说道咸（一八五〇年代）之交的外国商人在中国贸易的情形。那时西洋商人运货到中国，价钱卖得非常便宜，譬如一件商品的成本及运费，原来要值一块钱的，他们卖给中国人，只要三角，甚至还低。然而他们赚钱却不可胜计，何止“利市三倍”！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关键就在中国的金银价格的关系。道光三十年前后，中国的金子只有八换（就是说，一两金子换得八两银子），咸同之交，高到十一换，光绪以前，日本的金子只六换，然而那时欧美的金子已到了二三十换。外国商人运货到中国来，只求将货物卖出，换了银子，然后再拿银子去买金子，把金子运回本国，他们便大发其财。当时中国商人与他们往来，因此也往往获利，尤其是广东商人。那时中国的商人发了财，因为清政府官吏时常借端敲诈，加以虐待。他们无法，只好将自己的财产或商业，请一个外国人负名义。按年给他们以报酬，借此抵制中国官厅，广东的“其昌洋行”就是一个实例。其昌洋行原来

是一个广东大富商伍姓的轮船公司,看他的洋行名字还是暗切他的半个姓,而用中国“五世其昌”一句成语的意思,便可知道。只因那时广东的盐法道要借故没收他的财产,当他被查抄的时候,仓卒之间,就请了一个美国人顶着名义替他“扛木梢”,中国官厅居然被他吓住了,不敢难为他。因此负名义的美国人遂得作威作福,大赚其钱;无论中国人亏本赚钱,他们总是稳赚不失。美国人到也知足,他们干了三五年,自己觉得钱赚够了,便请假回国去享清福,又让他们同国的别人来接替,如是者有好几任,最末了一个外国人,我还记得,名叫施米德。他们的钱固然赚得多了,然而其昌洋行本身的亏累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多,到了施米德时代,已经不能支持,于是就把他们公司的几条年龄很大的船及其它一切不动产卖给招商局,招商局才形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轮船公司。

提到招商局,我还要补说一件事,当中法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我家三弟建忠(时任招商局总理)与其昌洋行商妥,把招商局以前旧有的轮船,全部押给其昌洋行,挂美国国旗,但并没有向他要押费,李中堂在天津听说,我们把招商局轮船押给其昌洋行了,莫明其妙,打电报来叫老三去,老三不能分身,遂叫我到天津去告诉中堂,为什么要押船的理由,中堂这才放心。因为我们晓得中法一开战,中国的海军不够保护我们的商船,不得已用假抵押给外国人的法子,免被法国船捕获去做战利品。至于我们为什么把船押给美国洋行呢?那是因为要押东西给别的国家,至少非六个月以后,才能生效,美国洋行则不然,只要谈判一经妥帖,签了字

便与马上生效,就是说,他马上对于所押的财产加以保护。其昌洋行与招商局因为有了这段姻缘,所以其昌后来归并招商局,是一种历史的关系的结果。

一九三五,十,二五。

二〇 借 款

其昌洋行既因亏累将其财产转售给招商局,从前因其昌而与中国人发生商业关系的美国人,不得不另做它图,于是就联合英、法、德、意、荷等国组成六国对华商业团体,我因与这一团体的组织者美国商人熟识,遂谈到借款问题。他们很愿意借款给中国振兴实业。我先和刘省三商量劝他借款开发台湾的经济,并经营其它一切军事政治,再以其余力帮助中国本部的实业发展,刘虽很以我的计划为然,但他不愿负向外人借款的责任,此议遂罢。

后李中堂和我们弟兄平居闲谈,大发牢骚;他说: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只给五百万银子,怎样能办得好!我们就对他建议说:"现在有美国大富商可以借钱给我们,中堂为什么不试办一下?"中堂听了我们的话,非常高兴,问我们,要借多少呢?我们说,至少五千万才能有

发展的希望,但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限制了中国政治家的眼光,中堂听了这个巨大的数目,颇觉踌躇,后来说,两千万罢。我们说,不够,至少要二千五百万。中堂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同住在天津的美国商人约略商定一种办法:借款二千五百万两,先开设银行,银行作为经济支出的总枢,各项新政经费皆由此行出纳,总行设法在天津、上海,各省得设分行。查账之权,由中美分负其责。议既定,中堂即派我赴美与该国银行家接洽。我和三弟请中堂把此事奏明政府,中堂大不以为然道:难道我一个北洋大臣又兼理通商大臣,连与外国商人商订借款的权柄都没有了吗?你去好了,我打电给美国大总统。那时李鸿章的声名在欧美各国非常大,欧美人士都叫做"北洋李鸿章",这就是说,李鸿章可以统制北洋,所以中堂一电,极有效力,美国的官绅待遇我的礼貌非常隆重。船抵旧金山,美国税关已得彼邦大总统电报,命其照外交代表的惯例免验我的一切行李;到纽约时,美国大总统特派侍从武官前来迎迓。美国的银行界各巨子皆来相会,我在中国临行时买了许多的中国的缎子和茶叶,这时就把缎子分送这些大银行家的太太们,茶叶则分赠各银行家自己。他们看见我们中国的缎子,简直"得未曾有"!曾记得有一个最有势力的银行家特向我要那片黄色缎子,他在他们第一次演剧欢迎我(这戏剧就是扮演我的故事)的剧场中,即着用我的缎子做的一身衣服,旁观者都啧啧羡慕不已!至于茶叶呢?他们不晓得烹法,我就烹给他们吃,他们也赞赏之至。我到纽

约之后,除了应酬外,便和他们大商家商量借款事宜,他们都争着要借,结果大家商订了的数目,凑拢起来,共有五万万两。我知道中堂一定不会答应,然而美国银行家的意思又不可却,于是我就同他们商量:以五千万为正式借款,以三万万为他们的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然后视中国对于财政需要之缓急以为因应。他们也赞成了,但是我将这种办法电禀中堂,中堂来电说,朝议大哗,舆论沸腾,万难照准,把我弄得进退维谷,简直不能见人,我没法,只好"溜之大吉"!

一九三五,十,二六。

二一　巴黎的金刚钻与"南京"

我因借款失败,从美洲溜到巴黎。法国的大商人都以为我是中国的大富翁,大阔老,于是争着来和我往来,欢迎我到他们的公司、工厂去参观,最令我有兴趣的,是一家珠宝店,这家珠宝店有五间非常阔大的、且很壮丽的楼房。楼上各房间,四壁皆是紫檀的玻璃橱,橱中陈列的都是价值巨万,光彩夺目的珠宝,尤其是钻石。钻石中最大的有鸽蛋那样大,其中有三个钻石是极可宝贵的历史上的遗物:一个是法皇的皇冠上所镶的钻石;一个是俄皇的皇冠上所镶的钻

石；一个是德皇的冠上的钻石。就大小说，俄皇的一个最大，有大鸽子蛋那样大；次则是法皇的，有小鸽子蛋那样大；而德皇的最小。就它们的品质说，法皇的最好。第一是它们的质地好，第二是它的做工好，因为钻石的形体越做得有轮廓越显得有光彩，据说，法皇的皇冠上的那颗钻石，光手工就耗去一百万，价值倍之。俄皇的那颗的做工没有法皇的好，德皇的又次于俄皇的，因为德国皇帝舍不得出大价钱。其它的珠宝也都是五光十色，巧夺天工。可惜巴黎的珠宝商人误认我这个从美洲溜到欧洲的远东老大帝国的措大的"外交代表"为富翁，实在是错转了念头，我算白白地参观了一场，一个钞的生意也不曾照顾他们！

其次，我参观"南京"公司，我骤然说出这两个字来，读者一定莫明其妙。原来"南京"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紫花布，这种紫花布到了欧洲，遂风靡一时。据说，罗马的教皇，不晓得什么人送了他一匹中国的这种紫花布，他如获珍宝，就把它拿来做了一件法衣，以炫耀他的众教士，可见他们是如何地羡慕这种东西了。至于这样东西怎样传到罗马教皇跟前，没有考证，依我想来，或许是利玛窦从中国南京带了这种布到罗马送给天主教会的，故遂以其出产地名之曰"南京"，而经营此种商业的公司遂名曰"南京"公司。

最后，我又参观巴黎的磁器公司，他们直呼磁器为"高岑"。原来中国的磁器最有名的是出于江西，而"高岑"就是江西省一个山名，大概这个山是因产磁泥而出名，法人即以此为中国磁器的通名，与英国人呼中国磁器为"支那"用意略同。

我因此发生一种感想,美国人那样宝贵我们的绸缎,嗜好我们的茶叶(如我在前日谈话中说的),而欧洲人又这样地喜欢我们的布匹与磁器,假使从那时我们就晓得讲求改良工业与对外贸易的方法,设法登广告,大事宣传,譬如,把我们的缎子和布匹,送一些给欧美各国的最有名的女伶或今日的电影明星,她们做成了衣服,在演剧时穿在身上,藉广招徕,你想到有多少人要买中国的绸缎与布匹?其它各种商品,亦用此法,必可向外取得一部分很有利的市场。可惜那时政府与商民都见不及此!

一九三五,十,二八。

二二　拿破仑第三的政变

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的侄儿,名叫路易拿破仑。一八四八年法国第二共和国成立(第一共和国始于一七九二年,终于一八〇四年),制定新宪法。按照这个宪法,共和国的形式应有尽有,并且实行普选。是年十二月十日选举总统,路易拿破仑遂以最大多数当选为总统(路易拿破仑得五百四十三万多票)。但是我们晓得,法国当时自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虽然共和再造,然而大多数人

民均因赋税繁苛，保皇党又从而“因风纵火”，于是对于共和均深抱不满。拿破仑第三本来就是一个目无共和的人，他做了总统以后，便把政府的要职都给了保皇党，又创立了所谓“十二月十日社”，搜罗许多社会上的高等流氓做他的爪牙，一方面拉拢军人，尤其是地位较低的军人。到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时候，路易拿破仑便实行政变。这时他已大权独揽，无异皇帝，但是他还要把这个责任，推在民众身上，于是就“制造”所谓民意，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由上议院上表劝进，路易拿破仑遂称帝，名为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政变到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兵败身俘为止，这二十年中的法国，历史家都叫它做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第一拿破仑称帝的时代，为法国第一帝国时代)。我们中国人应该晓得拿破仑第三同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继鸦片战争之后第一件外交失败的耻辱纪念就是“中法战争”，而这一战争(一八六〇年即清咸丰十年)就是拿破仑第三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一种表现。他借口清政府不履行和英法所订的条约，于是勾结英国，以英法联军打破了我们的京城，逼着清政府订定和约，多开通商口岸，又给他许多赔款。就这一方面看来，拿破仑第三也不过和其他列强的皇帝一样，对外发展其殖民地的政策。但是若就他在法国的政治措施及其才能说，实在也不可厚非。第一，拿破仑第三实在是使法国工业发达的一个大功臣，他即位以后，极力扩充法国的工业，而各大都市的工业人口也逐年增加。第二，拿破仑第三对于军事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著了一部关于军事学的书，在当时简直成了法国军队

的典范。第三,他在军器方面也有特殊的创造天才。大炮上的测量远近的表尺是他发明的,海军和要塞上用的电光探海灯也是他发明的。相传有一个笑话:当他发明了电光探照灯以后,一天,下命令给法国驻扎地中海的舰队,于夜间一定时刻举行大演习,但须不依照平时航行的航路,各舰应自由分散驶行并觅掩护。他又命最后的一队兵舰带了他的电光探照灯在黑夜中放光探照来追寻前批出发的军舰,于是前行的军舰都被它搜索着了;被搜获的军舰猛可地见了后面光芒四射的东西照了来,简直不晓得什么东西,都非常惊讶!

一九三五,十,二九。

二三　蔡孑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

我从法国回来以后,到了天津去见李中堂,结束我到美国去的使命,我很感慨向中堂说"很好的事体(指借款),被他们弄糟了。"中堂道:"政府不想好,有什么办法呢!"中堂其时不敢明说旗人之无用,就已慨乎言之!后来中堂见嫉于翁师傅(同龢),遂从北洋大臣调任两广。我也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重新过我书呆子的生活。

当时蔡孑民先生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

职,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骨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语文,那就无从了解。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烦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南洋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楼下就是大门),孑民先生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种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一点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二十四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法,只好教了。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以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季宰六(Cicera,今通译西塞罗)的演说。四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都居然写得出来,说得出来(发音自然有些不确)。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胡敦复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道,他们通统学过了。我说,你们且

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罢,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的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对于数理的研究有了深造。

后来我又教他们哲学,凡哲学术语,一本拉丁,"不徒欲探欧语之源流,并欲探希腊拉丁人震古铄今之爱知学也。"(见余所著:《致知浅说付刊叙》商务书馆版。)《致知浅说》与《拉丁文通》旧稿本已散佚,民国以后所刊,系"辑散补亡,勉续未成"之作。

一九三五,十,三十。

二四 从震旦到复旦

我教了二十四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 Akademie 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我们当时以为这样学校应该

把范围放大,借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

一. 崇尚科学;

二. 注重文艺;

三. 不谈教理。

不过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复旦初办的时候,经济非常艰窘,校址又没有。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玉山(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署照拨,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周玉山之所以如此慷慨,还是李文忠的一点关系,因为周氏本是淮军出身,我们弟兄也与淮军有关系,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假使当时两江总督是李中堂,那他对于我们的学校更要大大地帮助,文忠之豁达大度,信人不疑,当时阁臣疆吏中实无第二人,(曾、左都未免书生之见,与三家村的态度,胡文忠局度恢宏,然而天不永年,中道捐弃,可惜!)他于愚弟兄所创办的学校,定然另具一副眼光相看。

我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先生荐给我,他本是华侨,在美国读书的。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来我辞了校长的职务,李先生便继任校长,一直到今,还是他在那儿

维持。

记者按　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的教育要算是很注重科学的，且校风也很朴实，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能以卓然自立，而对于学术上有贡献的，亦颇不乏人，这不能不归功于马相伯老先生贤昆玉荜路蓝缕，艰难缔造，与夫循循善诱，启发奖进之力。且他们对于学生修身工夫，又能以身作则，树之风声。这一点实足为我们现在办教育的唯一好模范，不徒其学术足以诲我后生也！今之办学者徒以敷衍塞责为是，不然，则视学生为奇货而以学校为商场，粗制滥造者有之，以伪相欺者有之，平日师弟之间，痛痒无关，彼此相视，殆如秦越，又安能望其他？闻先生之风，其亦知所振奋乎！

一九三五，十，三一。

二五　意阿战争中的面面观

记者　老先生对于近来意阿战争有何感想？

老人　总希望阿国能“抵抗”（老人说出这个字时，声音非常宏亮而沉重）到底，给我们别的和他处于同一命运、同一地位的国家做一个好榜样！

记者　昨天（十月三十日）大美晚报哈瓦斯社巴黎电：

英法两国正在计划把阿比西尼亚的领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阿国本部;一为阿前皇所征服之各边省。把一部分领土割给意大利,另以一大部分领土作为委任统制地。老先生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么?假使是真的,那末,将来的意阿战局便可借此收场么?

老人　昨天的晚报我没看见,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尽是捕风捉影罢。因为英法何厚于阿比西尼亚,何薄于意大利?就欧洲强国的一般心理说,他们统统是视非洲为野蛮国家的。目前英国之所以毅然要拉拢法国以及国联各会员国来抑制意大利,绝不是为的什么"侵略""不侵略",而只是不愿意大利独吞阿国。但是英国因为法国的牵制,对于意国也不能"一毛不拔",老实说,英法都不愿意意大利因此损失他在欧洲的威望与实力,因为这末以来,德国便要乘机合并奥、匈,进而在欧陆造成第三德意志帝国。到了那时,法国必不得安枕,英国也难保其现有发言权。结果,只要把莫索里尼对于阿比西尼亚一口吞下的野心压下以后,总归要在阿比西尼亚割一大块土地给意大利以稍填其欲壑的。

记者　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及阿国政府文武要人皆一再宣誓:宁战败而亡,决不割让尺寸土地,老先生以为他们这种信誓靠得住吗?

老人　就现在阿国情形说,阿皇及其政府人员,似乎有抵抗到底的决心,然而我们统观中西各国历史,自古及今,没有见一个国家,其政府与人民截然分而为二(即政府以人民为鱼肉,视人民为草芥)而可以始终坚持抵抗外侮的。阿皇虽然英明,但其专制淫威,视人民如无物,实在是数一数

二。现因英国在背后策动,还可以勉强支持;英国一旦牺牲阿国一部分土地与主权对意实行妥协,阿皇恐怕也便要见风使舵,说什么“为维持和平”“忍辱负重”的鬼话了罢!中国的新闻记者对于阿皇,或许因“空谷足音”,尽力赞许他抗战勇气,“醉翁之意”,我们固当谅其苦心,洒一掬同情之泪。然而我们要放大眼光,对于阿国民众抗意敌忾与阿皇抗战决心,确应分别观察,不宜笼统。阿国民众只要政府不对外妥协,抗意敌忾是不会消灭的,至于阿皇的抗战态度与决心,究不可估量太高。但是我总希望他到了万不得已,就他自己的立场,以为必须与意妥协时,亦必定事事公开,即使割地赔款,也得使民众晓然于外交的真切情势。非洲人卖奴隶还得征求奴隶的同意,何况国家的土地与主权,焉能私相授受地送给外国人呢!

一九三五,十一,一。

二六 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却从拼音字母教起,使他

们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国语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却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狭斯丕尔等等的著作,给学生讲习,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各生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而且他们当我创办震旦时,都若即若离的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我因以上种种关系便毅然决然地离开震旦,组织复旦,我前次已经说过。复旦开学未几,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经过了一次"光复",复旦学校被军队占据,大家就带着全校学生跑到无锡,暂借李汉章的祠堂做校址。我好多年不上家乡的茶馆了,在无锡时,又常和二三友人在茶馆吃了几次茶。说来也很奇怪!无锡那时的茶馆,楼上楼下都是满座,但楼上从楼板缝里看楼下看得逼清,楼上人一行动,楼下的茶桌上便灰尘遍处,然而大家都安之若素,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我那时看了这种情形,便万分不耐,于是感慨万端。幸而我们在无锡住了一个月光景,革命后,我们又把学

校搬回上海。回到上海没有校址,于是我就写了一封呈文给江苏都督庄蕴宽,请他把李文忠公祠拨给复旦做校址。庄很好,马上批准了。李文忠公的儿子伯行先生对我大发其少爷脾气,说我不该强占文忠公的祠堂,我答道:并不是我强占它,而是庄氏批准的。同时我允他:凡于纪念李文忠的碑记,塑像,牌位,皆丝毫不动,一律保存。大家也很能尊重我的意思,一直保存到今。复旦在中国的教育上,总算尽了相当的作用,用李文忠祠堂来做它的校址,不但不辱没李文忠,实在是看得起他老先生。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于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找我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哄,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等等。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的了。

一九三五,十一,一。

二七　犹太人问题

今早往访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在座者一位不相识的

某君，谈起他要到意大利去，我顺便说道："阁下到意大利去，正好常常供给我们一些关于法西斯的有价值的新闻。"他喃喃地说道："不过，我想切实去研究一下，我想他们没有真正的爱国心，不知道真正爱国……"继而他又谈到希特勒驱逐爱因斯坦，并不是单纯地反对犹太人，并且因为他反对国社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我顺道答一句："这该是因为爱因斯坦，伙着法国的巴比塞、罗兰，英国的萧伯讷等，高唱他们的国际主义罢。"我又顺便加上一句道："但是反犹太人差不多是德国国社党的最主要的党纲，莫索里尼虽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雷厉风行，直言无隐，但是他也曾说过，他对于没有国籍的人是不能给以平等的待遇的（大意如此），这也就表示他并不反对人反对犹太人，而且莫索里尼治下的犹太人连大学教育都没有平等享受的权利（在他的自传中曾经提到这一层）……"这位先生又说："法西斯反对犹太人实有几种很正当的理由，第一就是犹太人与共产党有关系。"记者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味，就在谈话时征求相老人的意见，下面就是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简单谈话。

记者　莫索里尼的法西斯反对犹太人是不公开的，而希特勒的国社党之反对犹太人是公开的，而且是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但其反对犹太人则一也。实为何故？

老人　最要紧的是犹太人把持经济权，德国的大资本差不多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希特勒要造成他的纯粹的日耳曼人的第三大帝国，自然要反对犹太人。

记者　反对犹太人的运动并不始于德国，沙皇时代的

俄国实为反对犹太人的大本营。

老人 现在他们不反对了,而且执政的要人通统是犹太人。

记者 犹太人实有许多优秀天才,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实有伟大的贡献。

老人 (沉默了一下)犹太人随时随地同化于他们所居的国家,但他们却仍遵守他们犹太人自古相传的礼教与习惯,而且他们对于生计经营确有独特的观念,他们有句格言:“不能自养,便是强盗。”就是说,不能自养,便要食于人,中国人以食于人为可贵,而犹太人则以不能自养便无异盗人养。此种观念,诚未可厚非。

记者 从民族的立场出发,我们是不是应该反对犹太人呢?

老人 从民族立场出发,世界人类,一律平等,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歧视,犹太人亦其一也。

一九三五,十一,二。

二八 宪法总题

记者 老先生对于中国政治,就其荦荦大者言之,有何见教?

老人 我以为中国政治,最要的是应该有一个宪法。

记者 宪法现在已由立法院起草,经过六中全会修改通过了。

老人 我所谓宪法乃是能给人民以"实在平等"的宪法。现在所谓宪法,对于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切实保障。譬如,它一方说,人民有居住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这"非依法律"几个字轻描淡写,看来似乎平常,而且非常冠冕,然而一部"花团锦簇"的宪法这末一来,便轻轻地被它一笔勾销,犹之乎左手给人以物,右手马上复夺而取之,"狐埋狐搰",自欺欺人!

记者 "非依法律……"似乎是为慎重将事起见,事事以法律为归。

老人 宪法的第一任务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然而现在的宪法本来就不是由人民大众的意思来写成的,至于"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的法律,更是由少数人任意规定的,于宪法上所许给人民的自由平等,都可由少数人订定一种法律把它取消得一干二净。我之所谓宪法,必须由大多数民众举出能以代表大多数民众实际利益的人订定出能以使人民足以自养,而不用朝三暮四的手段限制他们的应有权利,使负政治之责者,人人凛畏"良心"之苛责,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严厉的法律制裁。

记者 "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则既闻命矣,但所谓"良心",愚还有所未解。因为良心人人都可假借以为护符,为民请命者固可以良心相号召,而独夫民贼也可以良心相搪塞。良心究为何物?如何表现?实成问题。

老人　良心随处可以表现，譬如强盗，他为什么要带枪刀，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要遭人激烈的反对的，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他不能不带武器自卫，从反面看来，就知道强盗也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即良心也。妓女也有良心。她固然知道，以她的肉身供人欢乐，博得金银以自活，然而必于私室行之，若当众宣淫，则虽在妓女，犹必拒绝，这便是她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亦良心也。

老人　（继而又谓）而且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如何能以建设真正的国家，如何能保全国家，又如何能以产生一种完美的国家的最高法典（宪法）。我们中国的国字，古写本做“囗”，就是古代社会形成国家之始，各各划疆自守的意思，但到后来，国与国间，战争日多，遂发现保障国家，必须一口一戈，即人人皆须执戈以卫国也。故古人常说，某国胜兵者口口万，就是说他们有多少壮丁可以当兵，于是就在“囗”字里头加上一个“或”字，意即一人一戈，用现代语言表之，即一人一枪也。必须一人一枪而后国家可保，真正宪法始可产生。

记者按：某所记老人所谈，容有未尽，然而大旨如是，绝无差池，记者执笔时绝不敢参加个人成见增损删润于其间，亦不敢以我见而有所去取，盖左史之职也。

一九三五，十一，四。

二九　新货币政策之后果

记者　本月三日财政部布告：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行使现金”。这末一来，中国的经济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老人　（叹了一口气，摇着头道）：结果很难说！

记者　财政当局为“防止白银偷漏”起见，此种办法或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老人　自然有他们的苦衷，然而我们所要谈的，是他们这一政策的效果，不是谈他们的动机。他们宣布这种货币政策的动机也许是很好的；然而很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效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物价的腾贵。据说，昨天财政部的这种货币政策一经宣布以后，物价便马上腾贵，一方面纸币便马上从三千三百文跌到三千（铜元）；从十二角三百文跌到十二角三十文；下晚又跌到十角四百七十文。像这样发展下去，物价腾贵，货币跌落，将来情势实不堪设想！最苦的是小本经营与劳苦的人民。

记者　政府现正调查物价，严禁市侩居奇，抬高物价，三木在复，谁不畏法？

老人　（笑笑）太史公说：“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无辜，时臣下凛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管子也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又说：“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现在政府的

货币政策若果非一般人民所欲,不“顺民心”,徒徒地严刑峻罚,又有什么用呢?而且既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钞票为法币,则其它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岂不是立刻要发生问题吗?

记者　三行之外的银行,以前由财部承认有发行钞票之权的,它们的钞票在十一月三日前发行的还可通用。

老人　政府既然宣布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货币为法币,其它各银行的钞票自然不为人所欢迎。结果不是很难说吗?

记者　政府此举在集中现金准备,据说将所集中的现金银,均化铸成条,存库做保证,这末一来,人民或许可以相信罢。

老人　这恐怕是一相情愿的算盘罢!银行的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信用:它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集中很充足的现金,准备人民于必要时兑现应用。然当它的信用完全保存时,人民为节省搬运,携带与储藏之劳,情欲用它的纸币,不欲兑现;到了它的信用丧失时,它的纸币便遭人民的拒绝而兑现风潮以起。可见银行之所以集中现金的准备,即在使人民相信:你要来兑现,我这里十足奉上,使人民有恃无恐。现在用强迫力量使人民用纸币,则集中现金于准备库,已失却原来的用意,不但不足坚人民的信仰,反引起人民的疑虑与恐慌。

记者　但是这一政策或许可以阻止现金外流?

老人　阻止现金外流,关键不在于禁止人民使用现金,而集中之于准备库,而在于海关能否严行禁止偷运。若果

此层办不到，则政府此种措施不但不能阻止现金外流，恐怕适足以加速现金之外流。而且国际汇兑的金银价的涨落之权操之于纽约、伦敦，若果银价一跌，对外汇兑不能维持，现金便不得不外流。至于入超国要制止现金外流，谁也知其不可能，况且现金外流并不是小百姓所能干的，都是富商大贾干出来的。他们的神通广大，“苞苴夜进，贿赂公行”，什么关节都打得通，刚在政府发布命令之前两日，伦敦市场还买进中国商人的巨量的金银，“虎兕出柙，是谁之咎”！孟子告梁惠王道：“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欤？”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足下以为何如？

一九三五，十一，五。

三〇　闵妃之死

我在高丽任指导改革新政事宜时，常有机会觐见闵妃。就容貌说，她实在是我有生以来所看见的第一个美人。她的身材适中，脸儿作鸭蛋形，鼻儿高高的，皮肤非常洁白匀润，乌黑的头发，态度也非常娴雅庄静。有一次她“托孤”于我，我们曾做过一度很详尽、很有关系的谈话。她问我怎样

才可把她的太子教养成人，担当国家重任，不致为强邻所吞噬（原来高丽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以大院君为领袖，一派以闵妃为领袖。前一派亲日；后一派亲华。闵妃已早知国家危亡之祸，即在旦夕，所以欲以太子托之于我）。我对她说：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到外国去留学，一来是因为日本一旦进兵高丽，中国若果不能抵御，太子必为阶下囚无疑。二来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东洋诸国已不复能闭关自守，若要对付四邻，必须有国际的眼光，丰富的知识，敏干的才能，这三者都非到欧美去锻炼一番不可。我说这一番话时，闵妃非常赞成，但是高丽的宫廷，也和我们前清的一样，暮气已深，因循苟安。你无论对他建什么议，他们答应得都好；但是任他答应得怎样好，总归是一事不做，过了几天，你再问他，他又很嗫嚅地说："容我们再商量，再商量！"高丽的国命就送在这个"再商量"三字中！还有一件事也是高丽宫廷的致命伤，就是泥古不化的习气，他们总以为"祖宗成法"不可变，若果有人劝他们改变祖宗的成法，他们嘴里纵或不说是"离经叛道"，心里也必以为是"非圣无法"的勾当，没有勇气去干，于是朝野上下就养成一种"泄泄沓沓"的风景，又碰到他的宗祖国的中国和他们一样地不争气，所以日本人一来，便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不旋踵而亡，"王子皇孙，辞楼下殿"。闵妃之死，更是可惨！当日本同中国开战，进兵朝鲜京城，围攻王宫时，太子被擒，闵妃自知不为日本所容，逃匿某寺院中，后被捕。不久便被人把她用棉絮捆扎起来，浑身灌以石油，活活地把她烧死了，然而她的儿子

还行所无事地替人空顶着一个高丽的王冠，毫没有一点思母之情，也没有国家兴亡之感。“此间乐，不思蜀也”，真是一个十足的阿斗！他之为阿斗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我当时从各方调查，深悉高丽宫廷的教育实在可怜得很。太子没事就伙着一班宦官宫妾，做许多极没道理的游戏，如斗鸡走马，养雀子，玩鸽儿等等，我之所以对闵妃建议，要她把太子送到欧洲去，便是为此。可惜她也逃不出高丽宫廷死气沉沉的环境，卒之身死国亡，而其子犹靦颜事人，闵妃地下有知，或要顿足而叹道：悔不用老身之言！

一九三五，十一，六。

三一　郑孝胥与溥仪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和清廷订立了使清帝退位的契约，每年由政府在国库项下支给废帝赡养费数百万元。当时清廷本请郑孝胥和我任溥仪的师保之责。我提议溥仪应出洋留学，开拓眼界，徒以清室没有人能以见到此层必要，溥仪自身又是更事未多，不能自主，而且那时民国政府也不愿他离开京津，何必出国，我的建议不为他们所采纳，我也就敬谢不敏，让郑孝胥一人去要。

后来，大约是在溥仪已由天津到了大连以后，上海五洲

药房的主人,请我吃饭,问我同郑孝胥熟不熟,我说,郑和我是老朋友,主人欣然道:今天有郑先生在座。未几郑来, 我和他谈心的时候, 又重新提起应该劝溥仪出洋留学的话。

我说:溥仪不早早到欧洲,恐怕终于要为人利用呢?

郑说:是的,但政府欠清室的经费没有还清,恐怕不能成行。

我说:一个退位的君主到了外国去,要人家看得起,并不在乎他的钱多,而要在乎他有学识。世界各国失了政权的君主逃亡到英伦的不下二三十个,其间受了尊敬的,并不是有钱的,而是有学问做过大事业的。

郑唯唯,后来他在上海匆匆地把他一处很壮丽宽大的住宅(在交通大学附近)卖掉了,不久便到了东三省,走马上任,做了所谓"满洲国"的开国元勋,内阁总理大臣。抱着不哭的孩儿,替人作嫁,到了此时,"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一举一动, 均如出嫁之妇, 一唯翁姑之命是听, 仰面视人, 啼笑皆非, 欲罢不能, 死而后已。溥仪固不好受, 而郑先生更不好受, 因为此行也, 郑为主动而溥仪为被动。郑氏于暗室屋漏之中, 夜气清明之际, 应该自己忏悔道: 吾误孺子!

一九三五,十一,七。

三二　再论政府的货币政策

记者　老先生对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已经告诉我们许多富于教训的意见。惟是近两日来,政府对措施似乎已经表现了事先有了很好的准备与缜密的计划,如管理外汇,统制本国境内的中外银行的货币,使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卖了他们的商品以后,不能不把他们所得的货币仍旧在中国市场上消耗了,即买了中国货回去,这一层似乎是政府的成功。

老人　是的,单就这一层说,足下所言极是。我从前在烟台遇见过一件事:烟台市上原来使用一种极坏的铜钱。俗名叫:"砂眼钱",是用极粗的铜砂铸成的。当时登莱青道是我一个朋友,我把这事告诉他,请他设法禁止。他说:"我也曾禁止过,但禁止以后,烟台的市面陡然萧条下去,我问当地人商,其故安在?他们说:因为市面流行的砂铜钱,所以各地商人农民运货到烟台来的,货物卖了以后,必定要用这种砂钞买了他们所需的货物回去。现在此种砂钞禁止了,各地商人运货来的,货物卖后,他们带了银子洋钱回去,不必一定要在烟台买货,故而生意清淡下去……"今政府禁止使用现金,通用钞票,得勿类乎是?

记者　除此而外,利弊究竟何如?

老人　我有两件事不放心:一件是属于客观的;一件是属于政府主观的。中国各银行的钞票大都是美国或英国代印的,我们自己在技术方面和物质方面都不得不仰给于人,

所以各银行的钞票的赝造品时有所闻。这种假冒，大致不外某国投机商人所为，中国各银行“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现在既通用纸币，最好自己印行，万不可再依赖外国代印，并且要十分小心地严防伪造。这是第一件。

记者　第二件呢？

老人　第二件更重要，也就更危险。各国对于发行纸币是非常慎重的，所有它的式样，特点，尤其是发行的额数，均应先得议会的通过，方能施行。现在党政府政出一门，无议会之监督，而又当民穷财尽，罗掘既穷的时候，从前有了兑现的恐慌在后面威胁他们，他们还不敢为所欲为，现在既禁止人民使用现金，而他们究竟发行多少纸币，又没有查考和限制。他们到了打饥荒时，只要把印刷机动一动，几千万，几万万便“俯拾即是”，得心应手，他们那有不情愿的呢？纵使现政府当局个个皆公忠体国，清白乃心，然而事势相迫，他们不知不觉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到了那时，整个的国家经济，固然弄得无法收拾，而大多数的老百姓，更是苦得要死！

记者　此外还有什么可虑的么？

老人　事实上，中国已不是一个能以自主的国家，在政府毅然禁止使用现金，原来为的是“防止现金流出”，然而结果怎样呢？自然，有一部分贮藏在民间的现金是流入中国的国家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准备库，然而另一部分（或许是一大部分！）却要“不翼而飞”地流到我们的邻国去了！一般市民和农民的心理，虽然政府严禁使用现金，然而假使不是万分不得已地要使用，必需以它去兑换钞票

外,还是愿意保存着所贮蓄的现金,而不愿拿它去换纸币。于是这一部分现金便要在较久时间,呆呆地困在妇女的箱夹里,橱柜儿的角落里!

记者　为什么一部分要流到我们的邻国去呢?

老人　我们晓得:原来有一部分的某国人是持有我们的银行的钞票的,这末一来,他们无论如何,是要把这种钞票卖出去,就是说,他们要用这种钞票来买我们的现金。中国人只要给他们一点小便宜,他们便肯了。譬如说,用一百二十元的中国银行的钞票换中国民间的一百块"袁世凯"或"孙中山"(指新铸的上印中山像的国币),谁能给他们担保道德上的责任,说未必如此!或许此事已在秘密地进行了!结果不是一部分现金反而要马上流出去吗?

一九三五,十一,九。

三三　拿破仑的军事天才

拿破仑的天才所表现的,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然而我独对于他的军事天才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这方面,他又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他在战术上所表现的天才;一个是他取得士卒的心悦诚服的情绪的天才。记得:我在六十年以前会见一个法国的老兵。这个老兵大约总在有五十好几岁

的老兵。我们因为他曾在第一拿破仑时代当过兵，就向他询拿翁的遗事。他一听见拿翁的名字便发狂似跳起舞来，高唱起马赛曲，简直疯了，狂舞酣歌直到他精疲力竭，人事不省，我们倒被他吓了一跳！以为他真的疯了。等到后来他慢慢醒来，才告诉我们说，法国的士兵对于拿破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当拿破仑头一次从他被幽禁的厄尔巴岛，逃回法国的消息传出以后，法国政府惊惶失措派了一营兵到他的船只登岸的地方去堵截他，但是他见这些兵士，只说了一句话，“孩子们！跟我走”，于是这一营兵士便听他指挥，做了他重整旗鼓，再和欧洲各国皇帝作战的基本队伍云云。其得军心如此。但是我们晓得拿破仑之得军心并不是建筑在光明正大的政治基础上，而是由他的笼络兵士的小恩小惠的手段。举一个例来说：他对于兵士自然不是人人都能以认得的，更不是人人都能受他的耳提面命的，他却有一个方法抓住军心。譬如，他找一个兵士来谈话，问他在某一次战争时，那些人们勇敢，那个兵士便告诉他，某人某人最勇敢。他又问他：这些兵士，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兵士告诉他以后，他便一一记下来。赶到他到了这些地方便把这些兵士的父母找了来，对他们说：你们的儿子托我带信问候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听见皇帝来问候他们，哪有不喜出望外的？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可写一封信给你们的儿子，我给你们带去。这些做父母的便恭恭敬敬各写了信托皇帝带去。拿破仑拿了这些信回去，便把那些兵士找了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父母托我带信给你们啊！”这些兵士受了这种荣宠与家人父子的情爱！

哪有不为他效死的道理？所以他对于法国的兵士能以指挥如意，为所欲为。他的一些最有名的大将都是他从士卒间提拔起来的。

至于他的战术的天才,也是同样地令人惊叹。我们知道:现在的步兵操典上,有三种放枪的姿势:一,卧放;二,跪放;三,立放。一般青年军人只知道这三种放枪的姿势,但不知道,他们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实在这就是拿破仑发明的呵！有一次,他同德国打仗,他的一营步兵忽然遭遇着德国一队优势的(大约五千)骑兵,拿破仑无法,一时情急智生,马上传令给他的队伍:把他们分做三层:最前一层卧倒;第二层跪倒;最后一层立着,皆上着刺刀。封着敌人的马首。德国的骑兵所骑的马,看见了法国兵的刺刀向着它们的鼻子,便死也不愿向前,再鞭策它们,它们便把身一转,奔回老营了。这就是步兵三种放枪的姿势所由来,这并不是由军事学家在教室所发明的,而是拿翁的临机应变的天才产物。

一九三五,十一,一一。

三四　儿童时代的幻想与儿童教育

我在儿童时代最喜欢仰观天象,并且喜欢追求天象的

根源。当万里无云的天光之下，我总喜欢看月亮。我天天看月亮，竟看到发狂，有一次在月亮地下拚命地追赶它，但是终于徒劳。又有一次我登楼开窗，拿着一枝竹竿去敲月亮，但是终于落了空！因此我就对我们的长辈发了许多的问题，如：月亮是活的吗？月儿生在哪儿？到了月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时，我又要问：为什么只有半个了呢？那半个上什么地方去了呢？但是不幸得很！我的这些问题，十有八九都要遭受长辈的呵斥，不然，就是瞎三话四地回答我。说什么：半个月亮被老虎吃掉了，等等。我总是不能满意。到了后来我研究天文学的兴趣，便是从这儿这时代，所发生的许多幻想发展出来的。但是有许多儿童不晓得仰观天象，这个问题，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告诉我的，我曾经在我们的近亲的许多儿童中实验这一问题，如某君所说，果然不错。任我怎样引诱这些儿童，他们大都不愿仰观天象。我想：这或许是儿童的天才与低能的分别。富于幻想力的儿童便是他的天才之萌芽。不过世间为父母和教师的，尤其是中国儿童的父母和教师，不知道戕折了好多儿童的天才或天才的儿童。他们对于儿童的好奇心或好动的倾向，以及时时发问的兴趣，每每报之以厉声厉色，使儿童惧怕，或则以谎语欺骗儿童，结果就把儿童这种天才或幻想毁灭了。所以我希望现在做父母或幼稚园及小学教师的，从我这种经验中得着以下的教训：

（一）　十分小心地培养儿童的幻想力，利用他们这种幻想力发展他们创造的天才。

（二）　对于儿童的发问绝对不可表示丝毫憎恶的态

度,不可有丝毫憎恶的心情,应当小心地解答他们的问题,甚至,在成人为极无理由的问题,都要设法指导他们。

(三)　父母和教师对于儿童的说话一点不可造次,要处处诚实不欺,更不可用鬼神的话来恐吓他们。

(四)　不要用食物的赐与或禁止为赏罚儿童的工具,因为这末一来,便种下他们后来争名夺利的祸胎。

我们谈及儿童教育,因而又想起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来。中国人民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饭吃,做父母的终日为衣食奔波,哪有工夫来讲儿童教育。至于小学教师之不能称职,一半是由于中国的师范教育之不善,一半也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困苦,使他们不能安心地研究儿童生活,忠于职守。说到这一层,又超出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范围以外,只好他日再谈罢。

一九三五,十一,一二。

三五　经学与“月亮”

中国的经学真正害死人!我从小的时候,有一位经学家时时为我讲解经书,常常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讲了两个钟头。他把从前各家对于这一个字解释一句一句地背将出来,甚至连这些经学家的名字都说得一点不错,却是对于我

一点也不发生好影响,他两钟头口讲指画地累得要死,我却不耐烦地告诉他:即使先生所背的这些经解都不错,究于我有什么益处呢?

后来,大约我到了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又曾经想在经学上用一番工夫,但我翻了一翻经学的注解,为了诗经上的"采采卷耳"四个字足足地写了三本书,他们这些注疏都是在书本上兜圈子,在字眼儿上打滚,不看还可以,看了,反把人弄得头昏眼花。所以,我毅然决然地把研究经学注疏的念头断了。

中国人受了经学的毒着实是很深的,因为经学完全是空虚的形式,大家中了空虚形式的毒,其流之极,便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冬烘头脑;一个是欺饰心理。这里我且说一个故事:——

清道光皇帝为人是很简朴的。有一次他的套裤面前正当膝头地方破了,他不愿做新的,把两支破套裤送给内务府织造局,教他们把破的地方织补一下,织造敬谨如命地把两支套裤破的地方织补了两个团块儿(一只一个,)形似月亮,故以补月亮名之。后来织造局特为这一织补奏报一笔报销库平银五十两。道光皇帝虽然勤俭,但他生长深宫,怎样知道民间的生活费用?自然对于这种报销也就信之不疑。后来有一天同潘中堂(苏州人)说话,不晓得怎样看见潘中堂的套裤也打了两个月亮,因而就问潘中堂:你打补这两个月亮,花了几何铜钱。潘氏被道光皇帝这一问,很为狼狈,明知道他这一问是有来历的,恐怕说少了,令内务府的人难堪,遂尽量地放大数目答道:臣的套裤上的两个月亮,费了

二十两银子。道光听道，颇觉惊讶，说道：为什么这样便宜？我补了两个月亮，却花了五十两银子！道光皇帝这种故事原来只是专制皇帝宴处深宫的必然结果，还不能算是什么冬烘头脑，而潘中堂的对话，却十足地表示中国的经学所造就成功的一班士大夫之说谎的习惯。至于中国士大夫的冬烘头脑，随在都可以碰得着。我前次所说我在山东机械局报销户部的那段故事，就是最的当的注脚。还有一个故事我可以说一说，就是前清道咸之间的广东的炮台。据说，两广总督建筑广东的炮台竟费去八千万两银子，但是它的内容的荒谬绝伦，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只说一事便可想见，广东各处炮台上都有通红的硃漆栏杆，你想：炮台怎样可以与硃漆栏杆发生关系，而我们中国的炮台，竟然饰以硃漆栏杆，这不是活活地画出我们中国士大夫的冬烘头脑与欺饰心理么？

一九三五，一一，一三。

三六　杜工部的描写天才

杜甫的诗可算无奇不有，而他的描写天才更是独步千古。他的这种技术实在妙不可言！譬如，他的赞马的诗，把马的状貌神态都一一描写入微，尤在他能以把一个千里

马的奇特的地方，提要钩玄地烘托出来，并且他所描写的马各各不同，我们且举两个例来说。他的《骢马行》有句道：

夙昔传闻思一见，牵来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态何崷崒，顾影骄嘶自矜宠。
隅目青荧夹镜悬，肉鬃碨礌连钱动！

头两句系结连一开始两句，写出渴欲一见，名不虚传的事实；入后四句便生龙活虎地写出骢马令人神悚的神态，“顾影骄嘶自矜宠”是看了马的“雄姿逸态”之后，马鸣时的神情，这一句已把这一神驹的身分说得入画，末后两句，乃是作者对于骢马全部身段细细观赏以后的描写，这十四个字无一字不生动，无一字不贴切，我至今心目中偶尔想到这两句，还浮泛着一个目光炯炯，肉毛森动的马在我眼前，你看这是何等技巧！他的《房兵曹胡马》一首云：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头一句开门见山，说明此马的来历，第二句便把马的骨骼先行打了一个轮廓，第三句紧接着第二句“锋棱

瘦骨成”,在形式上我们算已经得到了满足的解释,妙在一个“批”字,于是才十足地显出双耳之如何峻。但是没有第四句,此马亦不过徒有其表而已,这一句的妙处全在一个“入”字,有一“入”字则马快于风,已在言外,而第五句的一个“无”字,把胡马的卓荦不群,目无万里的精神,可算表现得“毫发无遗憾”了,像这样的马不但可以“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并且可托以“死生”,则此马不但其才足用,其德更足取了。工部此诗虽系咏马,实亦自喻然而此等名马往往不遇识者,伏枥以没,哪能不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瘦马行》一诗有曰:

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
谁家且养愿后惠,更试明年春草长。

此种情境恰与“真堪托死生”相反,然可互相发明,所以老杜的作品,命意,布局,造句,处处都登峰造极,其描写天才,尤令人惊心动魄,我从前每读他的集子,总是不忍释手。今天偶尔回忆及之,不能道其万一也!

一九三五,十一,四。

三七 谈 屑

1 心理问题

记者　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家佛劳以德(今译弗洛依德),即《精神之分析》(心理分析)的著者说,人类的两性爱并不始于青年男女,即幼儿与母,幼女与父间都有一种两性爱的现象,所以我们时常可以看见男儿妒嫉父亲,女儿妒嫉母亲的心理表现,此等学说,老先生以为如何?

老人　这也容或有之。因为幼儿对于母亲常常感觉一种吸人的气味,在生理(从物理学的见地说)上或许有彼此吸引的力,运行其间,使幼儿对于母亲发生一种两性的爱;反之幼女之于父亲亦然。

2 “创世纪”中的一个新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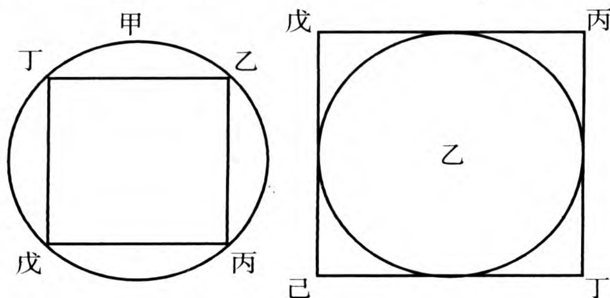
记者　创世纪上说:上帝七日七夜造成世界,从宗教史的见地说来,究应作何解释?

老人　一般人读创世纪都误解了这一句话,所谓七日七夜者,并不是指二十四小时的日夜而言,乃是指七个时期而言。这七个时期并不一定一般长短,而每一时期的经历,也许几万年,或几十万年。

3 “天圆地方”

记者　中国有“天圆地方”之说，就现代科学讲，显然是不通的，老先生精研中西数理，必然能以对于这一说法给我们一个确定的解答：此说究系根本不通，抑或为后人误解？

老人　实为后人误解。因为天圆地方之说，就我研究中国数理的结果看来，深知道，此种说法，并非断定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是用它来测算圆周的。譬如甲图，有乙甲圆周，即在甲圆周内做乙丙丁戊四边形，因四边形而求圆周与其面积，或如乙图：



在乙圆周外做丙丁戊己四边形，因四边形而求圆周及其面积亦同。可见古人并不是认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是因圆以求方的法。一班迂儒，拘泥文字，食古不化，遂把天圆地方解得不通，真是害人不浅。说来也奇，中国人早已知道算圆周的方法了，并且恰与西人的算术不谋而合。西人算术求圆周率是：三一四一六，而中国的圆周率是 22/7；

22/7 的得数与三一四一……一样的。此等解释,我从前都曾有过详细的记述,载在拙稿《度数大全》中,今已散佚。

一九三五,十一,一五。

三八 关于马眉叔先生

记者 老先生的文章与令弟三先生(建忠,字眉叔)的迥然不同,先生自己该也觉得罢?

老人 是的。眉叔的文章重气势,尚声调,我则反之,专以意思义经纬,君看我的《致知浅说序》,可不是吗?

记者 令弟三先生的《马氏文通》的序及后序,诚如先生所言。三先生之文固可传,而《马氏文通》,尤为不刊之书。此书对于中国文字之革新及研究方法,厥功甚伟。

老人 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但是梁任公对于我所删节的本子还嫌举例太多,殊不知此种研究中国文字的文法书,在《马氏文通》出版时代,实在是破天荒,举例过少,学者将莫由征信而解疑。

一九三五,一一,一五。

三九　孔教所给与中国的影响

记者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一种复古的倾向,在思想上则以尊孔为显著的特征。各处孔庙都大兴土木,孔丘与所谓四哲的后裔,忽然被政府优礼有加,在政治上、教育上均给以特殊的待遇,似乎有一种什么神秘作用,以为这末一来,便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古开太平"。记者不敏,实所不解,敢以质之老先生。

老人　足下须知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就这一点说,我对于孔子教义的态度,可以不需再加申说。但抛开这一层不说,单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见地立言,我对于孔子之道,更是没有肯定的余地。

记者　孔子的学说,在哲学上究居何等的地位?

老人　孔子的学说不成为一种哲学。我们晓得,哲学第一个条件就是思想的方法,由这种思想的方法,不但要解释人生问题,并且要解释人类所生息其间的世界问题,即宇宙问题。孔子一生最狼狈的就是宇宙问题,他对于两个儿童所辩论的"日"的问题,简直莫明其妙,其他可知。他不但不能解释宇宙问题,即对于人生问题的答案,也都肤浅拘迂得可怜!他一生最大的功劳就在"正名定分",替宗法社会的封建制度做了两千多年的"叔孙通"。正名定分的流弊便率天下后世以伪相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谎。

记者　孔子教人不要做乡愿,以为"乡愿,德之贼也",

然而遵孔子之道，其结果必为乡愿。先生以为如何？

老人　孔子生在封建专制时代，他的思想是在定于一尊，从来不许人有反对的倾向。他说的话，谁人要怀疑，他便不高兴，颜回对于他的话总是赞叹而不加问难，便最得他的欢心，并且赞赏他道："回也如愚。"又说："回也不愚！"子路对于他的言论行动时常抱着怀疑态度，有时他反对他的老夫子，且见之于词色，孔子总不对他详细解释，说明其所以，甚至弄得无法，情愿赌咒发誓（想见他老先生当时面红耳热的态度）！由此看来，他有什么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第一要有分析的态度，而孔子的学说只是东涂西抹，掠影浮光，对于人生又如何能有深切的认识？退一百步说，孔子学说，只是一种极肤浅的伦理学，即我所谓"行谊"学。他的教育就是要把一个活泼泼的青年拘束得像槁木死灰一样。请问："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这样教人作人，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且孔子是一个极吝啬不过而官气十足的人，当他的得意门生颜回死了，回的父亲请借卖他的车子给回买棺椁，孔老头儿不肯，还说了什么"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的一篇大道理，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做了官了，怎好不坐车子呢？你看，这就是孔子之道！

一九三五，十一，一六。

四〇 孔教所给与社会的影响

记者 孔丘本人所教人的思想,很少有逻辑的精神,但孟子、荀子确已包含了很好的方法论的精神?

老人 诚然,孟子已表现他比孔子的思想富于逻辑,荀子比孟更有条理。因为孟子处在战国"处士横议"时代,而各国的辩士皆以谈说驰骋当世,孔子之徒,也不得不讲求辩论的方法,因是就不得不有逻辑思想的萌芽。荀子的《正名篇》有许多话已经提示出逻辑的大本源,然而他们却都没有力量给我们写出一部像亚理士多德的 Organon 那样有系统的方法论。

记者 孔子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已大受各家批评,庄子一派的人骂他迂拘,所以无趾告诉老聃说:"孔子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墨家则骂他不知名理,老先生以为何若?

老人 庄子一派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悲观哲学,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有一部分超出孔子学说之上,孔子眼中的圣人,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凿聪明,所以无趾说:"天刑之,安可解?"就是说,孔子这种响响为仁,孑孑为义的酸气,乃是受天之罚,愈不可救药。至于墨家反对孔子。却是从积极的人生观出发。孔子虽然镇日价要"正名定分",但他所谓"名"与"分",都只是替少数治人者设下愚民欺众的弥天大谎,禁不得人家从实处追问。所以墨子对于孔子答叶公子

高之问，批评他不知道怎样为政(即不知“所以为之若之何也”)；并且笑话他对于问题不能追求所以然的原因，所以《公孟篇》说他对于“何故为室”与“何故为乐”的问题，答得不知所以。至于墨家为社会一般平民奋斗的精神，更非孔子所及。就逻辑思想说，墨子实胜孔子远甚。

记者　孔子学说对于中国两千年来的人心世道影响如何？

老人　我前已说过，教人“说谎”。两千年以来替历代皇帝说谎以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则又“炀灶蔽明”，说谎以欺君罔上。明末之洪承畴，就是孔子之徒之最好的典型。中国历代专制帝王莫不尊孔，就是觑破了这一点；东邻某国与所谓满洲国之尊孔，也是觑破这一点。所以尊孔的结果不但要把活泼泼的青年方兴未艾的天性戕折殆尽，恐怕连国民一点“白刃可蹈”的反抗精神，也都消磨于“规行矩步”之中了。天下古今讲形式的再没有出于孔子之右的了，他讲形式，竟会教人“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还可牵强附会地说是口味问题，请问：一块肉必然要让厨师切得四四方方才吃，这是什么人生大道理呢？然而这正是孔子之道呵！

一九三五，十一，一八。

四一 说 谎

中国社会上受了孔子形式主义的毒太深了,结果必然要随时随地去说谎,在朝廷则欺君罔上,在闾阎则欺罔小民,在家庭则父子相欺,夫妻相欺,不说谎便不能过日子。曾记得,曾文正公(国藩,号涤生)在江西内湖编练水师,同太平天国的水师相打,有一次打了胜仗,据他说,是水师统领彭玉麟的功劳,专折奏保,这篇奏章我曾经读过,说是彭玉麟当两军决战甚酣的时候,彭某手执大刀,奋身跳过贼船,当者辟易,斩贼渠魁,因奏肤功,云云。我当时读到这儿,实在有点莫明其妙。彭玉麟原来是个穷秀才,未曾听说他有怎样膂力,而且他原来又不是个生长在江湖上惯于舟楫的人,为什么他能以在两军鏖战时,从他们战船上身先士卒,就一跳跳到贼船上,如入无人之境?后来,我问了几个淮军已经卸职的军人,他们告诉我,从前打仗,实在好笑!两军在相距三里以外,便拚命地骂阵,所谓"骂阵"就是他们互相声震天地地骂对方。官军骂长毛为"贼",长毛骂官军为"妖",赶到越走越近的时候,只要哪一方有少数的人胆怯一点,跑了回去,其余的也就跟着往后退,于是敌方便乘机追了过来,在后面杀几个落伍的敌兵,就这样便大获胜仗了,而封疆大吏的幕府中总有一两把办奏稿的好手,轰轰烈烈,铺叙战功,俨若一场血战,于是一大批红顶花翎,便在他们的笔下产生出来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彭玉麟身先士卒,斩将搴旗呢?因为前清保奏军功的惯例,不斩获贼将,不能

保奖。曾文正公自己就是办奏章的能手,自然做得天衣无缝,如情如理,然而也就是说谎的能手。

中国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能合群,而不能合群的原因就在于两千年来的专制帝王的毒害太深,弄得人民只顾自己旦夕之安,不求人群社会久远的福利。曾记我小时在私塾读书时,常常对于皇帝发生疑问,先生总是骂我。有一次,我们江苏考试,某县童生做了一篇清顺的八股文,文为嘉庆皇帝所赏识,遂传旨各省都学部院,命以后诸生做八股文,均应以此文为楷模。先生给我讲这篇文章时,提到这种故事,我便很好奇地问道: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 先生大骂道:糊说! 皇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何况八股文? 这种心理是当时一班士大夫,尤其是一般服孔子之教、诵孔子之言的戴方巾朋友的共同观念,没有一个不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心理。由这种心理出发,小百姓自然是应该受苦,应该把天赋的人权(自由平等)牺牲得干净的。所以《大清律》上载有一条说:三十人以上在一块聚会,即以聚众论,格杀勿论。一个国家弄得人民束手缚脚,箝口结舌,对于国家大事不敢联合起来同负责任,任你政府少数人,有什么三头六臂,七手八脚,或是真像千手千眼的观世音那样,也无济于事,只有把国事败坏得不堪收拾。所以我始终主张,在任何贤明政府之下,任何时期,人民都应联合起来共同担负保卫疆土的责任,而政府之贤明与否,也就视乎它能否实行让人民尽量地结合起来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一九三五,十一,一九。

四二 关于货币之发行与现金储藏问题

我对于现政府日前所施行的货币政策，关于政治方面及施行后对于民生经济效果如何的意见，已经说过了，现在我要谈一谈关于发行货币的技术问题，与储藏现金的防范问题。

西方文明各国对于他们的货币发行莫不慎之又慎。我从前游历欧美时，曾访求他们关于此事种种设施，兹分述之如下：

（一）货币铸造与纸币印刷方面　他们铸造金银币的工厂受政府财政主管机关严密的监督，工厂所在地禁止一切人的窥探，该厂工作人员，上自高级职员下至工人，无论男女，在机械房服务者，均须赤条条一丝不挂。所有金银币铸造成功之后，均须由政府主管财政机关特派廉正大员并聘请金融界要人到场考察，举凡它的重量，成色，花样，无不细细检验，查其是否与政府定程式相合，吻合者收，稍有差池，便驳回重铸。所以他们的金银币的重量、成色、花样非常一致，故伪铸的事情，很难发生。至于他们印刷纸币，手续更为严密。第一，是纸的问题。他们的纸币所用的纸，都是用政府指定的工厂或特开的工场在严密设计与监督之下造成的，而且他们印刷纸币的纸张有各式各种，譬如一张纸

币有四层，则四层纸张各有特殊的花样，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张的各种纸币的各层纸张，又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特殊的配合，非身任其事者不得而知，故外人无从伪造。一来因为它的技术之巧，二来因为它的成本太贵，绝非某种投机商人所能仿造。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我们中国着实可怜。从前张香涛做两湖总督时，发行纸币，系托东邻某国商人代印，民国以来，所有纸币，则又全出于纽约、伦敦两市，不但国家体面攸关，亦且弊端百出，中间发生伪造情事，不一而足。在银行家本身为各该行对外信用关系，虽发现此种情事，而多隐忍不言，咬着牙关，甘愿吃亏。谋之不臧，至堪浩叹。深望政府注意及此，不要再蹈已往覆辙，致令奸商及专以牟利为事的邻国商人，有机可乘，以扰乱我国民经济生活。

（二）现金储藏亦应特别注意其安全　欧美各国对于国家现金准备，固极注意，而对于储藏现金之法，尤谨慎将事，务须使其获得安全保障。就中国现状言之，上海绝非可以储藏现金之地，因为现在的科学技术异常高妙，任你如何坚固的银库，甚至金属的门窗户壁，盗者皆有法穿窬而入，这是一。即在内地亦须讲求特别建筑，且须极严密，其储藏地点，勿使外人知悉。始可保无虞。此言前为粤中某军界朋友言之，他也同意我这种见解。这是二。愿政府诸公注意及此，勿使盗人盗国生觊觎之心。

一九三五，十一，二〇。

四三 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

我的家庭生活，总算很圆满，儿童时代，尤其令我留恋。我们家庭奉天主教由来很久，大约在利玛窦到中国来以后，我们的祖先便成为教徒。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奉天主教的。我小时，母亲教导我极为严厉，对于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肯忽视。譬如，同人说话，绝对不许加人以恶声，世俗的爷娘看见自家的小儿会开口骂人，便欣欣喜色，我的母亲则不然，口出恶言，在所厉禁。在桌子上和大人一块吃饭时，坐位不得侵占人家的地方，检菜不许越过自己面前的菜蔬，若果要吃对面那一边的菜，一定要请大人代检。到了外婆家里，母亲必每日照常课我一定的功课，如读生书几页，熟书几卷，临若干字等等，功课完了之后，才准出去玩耍。若果有什么不是，母亲必定要加以督责。但是在外婆家我是不大怕母亲的，因为有外婆做靠山。母亲对我虽厉害，但外婆对我却是恩爱逾常，每逢母亲要责罚我时，外婆便出来庇护我，母亲也无可奈何。不但外婆对我好，就是父亲也是很温和的，不像母亲那样严厉。因此，我也就不怕他，他被我弄得无法时，还有时轻轻地对母亲说，你给我管管孩子罢！其慈爱便可想见。中国社会治家的格言是"严父慈母"，而我的家庭教育却有"严母慈父"，然我因母亲督教甚严，却养成一种严肃的克己观念，后来处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对人无礼，皆在此时种下了因子。

我小时虽然受了母亲的严肃的教育，然而我自己的好动的天性还是活泼的发荣滋长。我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同学有十几个，我年纪最小，然而遇到事情，总是我做领袖。一来是因为我好出主意，二来是我本着我所受于家庭的严肃教育，律己律人，三来是大家皆服从我的指挥。我那时对同学的第一个戒律就是不许骂人，第二是不许打人。不过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不过是个顽皮的学生，我因为受了家庭的影响，对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已能不为那时中国社会传统的见解和习染所拘束。中国人对于儿童总是灌输其鬼神观念：平时往往以鬼怪之说，恐吓儿童，又因他们无论吉凶祸福都要求神拜庙，不知不觉就把儿童小小的心灵弄成一种愚昧无知，盲从迷信的状态，我幸而没有受过这种摧残。所以我对于当时士大夫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看得也很平常，我因宗教的启瀹，又知道天子也和我们一样，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并没有什么神奇。至于黄金、玉带，我更看得平常。当时我觉得黄金与泥土并没有贵贱之分，而泥土比黄金更有用，因为黄金只为少数人所有，而且饥不可以饱肚，寒不可以取暖；土则万物生焉，人类的生活完全取给于此，古人所谓“有土此有财”就是这种意思。我那时虽尚不能领会这一句的格言，但我直觉的思想着实已超过了这一句的范围，我后来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皆从这时顺着这种倾向发展出来的。

一九三五，十一，二一。

四四　杂　　谈

一　镍 Nickel

外国钱币之采用贵金属如金银之类,自然是因为它的持久性与价值高贵,便于携带。但货币的唯一作用就在流通,它终日在人手里转来转去,或打包封,或辗转搬运,或其自身互相摩擦,处处都有耗省,据外国货币专家的调查和统计,欧美各国金银货币之流通民间,每年此项损失,实是笔很可惊的巨款。又因工商业的惊人发展,金银币在携带搬运上还是不大方便,于是就创出纸币来,纸币耗损究属有限,而其功用更大。金本位国家以金币为主币,以银币为辅币。银本位国家则以铜元、银角为辅币。后来因为小银币的消耗太大,而铜币又实在笨重,于是美国人就发明了一种镍 Nickel,把它铸成辅币。自从美国铸造此种镍的辅币以后,商民大便,因为它为质甚坚,体又轻,欧洲各国亦多仿造,甚愿吾国财政当局注意此种金属,在适当时期也自铸此种镍币以代替铜圆。

二　袁世凯杀子

袁世凯做大总统以前,有人送了一个女子给他做妾,就是他的六姨太太,生了一个儿子,袁氏非常宠爱她们。袁当

洪宪皇帝末路时自己的腰子病(有人说他是梅毒发作,非也)发作,因而上冲及于神经,遂发狂。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一天自己用手枪把六姨太太和她的儿子都打死了,而他自己不久也就失却帝冠,连老命也送掉了!

三 中国的小说

中国的小说有一种共同的毛病,就是,它们不知道:小说的叙述,只是截取人生之历程或社会某部之一断面来描写,使读者于这一精彩的断面,可以窥得人生社会的缩影或轮廓。因此,他们一开始总是千篇一律地要从书中所叙的主要脚色的"三皇五帝"说起,弄得人莫明其妙。还有一种大毛病,就是小说家们到了书中的关节无法转变时,就如同打了结解不开时,便用神仙来救一下急,虽好的小说如《红楼》,《水浒》,《儒林外史》,《西厢记》等等都不能免。这便是第二种大毛病。

四 中国文字的短处

中国文字,至少是以前的中国文字,实在有许多缺点,而在篇章的结构上,更其不好。譬如苏东坡的《上皇帝疏》,王安石的《上皇帝疏》,都可算得有数的杰构,但它们都是有头无尾,述而不作,论而不断,弄得一篇皇皇大文,到末了只以寥寥数行颂圣的文字了事!我想这并不只是中国文人的过处,而是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之腐败的环境限制了它。

一九三五,十一,二二。

四五 “Being”的问题(一)

记者 老先生的《致知浅说》我已读了大半,这部书虽然只是介绍西洋哲学思想入门的“浅说”,然因其中的术语以及逻辑的各种必要的、应有的知识,都已提要钩玄,加以文字古奥,恐非中国一班青年学生所能领会。

老人 诚然,诚然。《致知浅说》实在只是研习哲学的入门工具,而不是哲学,但凡研究哲学所必需的知识,实已应有尽有;惟是当时对于西洋哲学中一些术语之迻译,颇费一番苦心。我所用的术语都是取自中国的古籍,因为中国的古书上有许多名词,实与西洋哲学上的名词相吻合。如西洋哲学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术语 Abstraktion,日人译为“抽象”,中国学者因之,然而我却用古书上“摛其象”的“摛”字而名之为“玄摛”。所谓玄摛,就是把我们所说的某种事物之属性或物德提要钩玄,于万有不齐中观其会通,于一般现象中分别差别,则《玄摛》一词实犁然有当。我们自己本有适当术语,何必拾人唾余?

记者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比之欧洲古代哲学,即希腊哲学思想,究有什么分别?

老人 说起来实在伤心!我们中国古代何尝真有如希腊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中国古代(直至现在)实在没有哲学思想,更精密地说,就是没有哲学。

记者　中国古代如孔、老、墨诸家学说，似乎也是一种哲学？

老人　哲学第一任务就在教人怎样思想：而思想首先碰到的就是 Being 问题。譬如现在我问：我们人类自有生以来第一思想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呱呱坠地以后，第一次的思想究是什么？那就是 Being 问题。Being 这个字中国人多译做“是”，或译做“存在”，或译做“在”（日本人亦有把它译做“在”的，中国关于 Being 的译语，大半都袭自东语。记者注）。不过“是”“存在”与“在”皆不恰当，因为必有物可指，然后才有是非；必先有，然后可以存在，或在。但是把 Being 直译做“有”也不对，因为中国语言中的“有”字涵义实不足以尽 Being 之意；而“在”字更不足以尽 Being。中国人之所谓“有”，只是指着此森罗万象中的一点一滴而言，如“今有人焉”之“有”。所谓“在”，也只是指着这个婆娑世界中某一现象之存在而言，如“某在斯，某在斯”之“在”。Being 之“有”，乃赅括大宇长宙之总体而言。人类自孩提时所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 Being，与 Non - being 问题。有了这种思想，才有分别识；有了分别识，则万物万事才能够在我的意识中各从其类而加以适当的区分；有了适当的区分，则我对于此万事万物才有认识可言。人类自从呱呱坠地便渐渐养成此种需要，于是科学便应运而生。

一九三五，十一，二三。

四六 Being的问题(二)

记者 老先生的意思是否说,中国古代的学者如孔、老之流只谈人生问题,不谈宇宙问题?

老人 不是。所谓Being不只是宇宙问题,实赅括人生问题而言。山河大地固然是Being的一部,而人之林林总总,相生相养,也是Being的一部分问题。

记者 那末,孔、老所谈,何尝不是人生问题。那末,他们所谈也就是哲学了。

老人 不然,不然。哲学的任务在追求Being的整体,不得已而用中国语言,我们可以说,它是要知道"全有"。大凡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物皆是Being的一部分,而不是Being的整体。孔子所言,皆是适应人生实际问题,他未尝对于一事一物下一确切的界说,就是说,他未尝告诉人,某事、某物究竟是什么。不告诉人某事某物究竟是什么,那就不能对于此事此物与以适当的处置。譬说,孔子对于门弟子的问"孝"的答语各有不同,论者以为这是孔子善于教人,始能如此"随机说法"。我则以为:孔子答人问"孝"各有不同,是否是他善于说教,我们暂且可以不管,然而孔子本身对于"孝"之一字究竟做何解说,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孝"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应该"孝"?这些根本问题见他老先生皆没有解决。他所言者,大都是应付一时的话,而没有解决人生根本问题,有什么哲学思想可言?希腊

哲学则不然。柏拉图已发其凡,到了亚理士多德,便给我们形成一个研究哲学的方法,即逻辑学,因此也就第一次给我们形成一个哲学体系。

记者　中国古代学者不曾谈到Being的问题,孔子没有谈过,诚如老先生所言,但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似乎不能说中国古代学者完全不晓得Being问题。

老人　老子的“无名”与“有名”之所谓有无,和我们所谓Being实没有共通的地方。老子的“无名”之无,正是我们所说的Being,即无限之有;至于他说的“有名”之有,则正是我们所谓有限之有。中国的学者以有无为对待,这是错的。就西洋哲学说,Being与Non-Being为对待,就是说,有与非有为对待,而不是有与无为对待。因为Being固然是有,而Being之否定也是一种有,即Being而不是无。因为任他什么天神,绝对不能从无生出有来。这便是自亚理士多德以来的西洋哲学与中国古代学说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古代学者的学说不能成功为一种哲学的原因。中国民族若果要救亡图存,发辉光大,一定要想法培植全国人民的哲学思想,就是说,要使他们人人能用他们的头脑去思想,去分别,去分析,去判断,夫然后才有民权自由可言,夫然后才有民国共和可言。

一九三五,十一,二四。

四七 杂 谈

1 西洋人给我们的教训

有许多朋友到欧美各国去,往往遭到他们的白眼。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到法国留学时,同法国交际,法国人看他的法国话说得好,学问也很好,便以为他是欧洲人,甚至有些法国人认为他也是法国人,故相待甚好。有些人以为他是安南人,礼貌也还是过得去。又有人以为他是日本人,那更是“刮目相待”。后来他们渐渐晓得他是中国人,便露出他们的鬼脸;有时见了他,简直避之惟恐不及。这种滋味,中国的学生十有八九都尝过,始而我总以为:或许是因为中国学生不修边幅,故易引起西人轻视之心,这次友人张将军从欧洲回来告诉我一件事,我才晓得不然。原来这位张将军是广东人,他在北伐军中,身经百战,世人所谓“铁军”,就是他所率领的一些青年革命军人用热血铸成的。他虽然没有发多大的财,然而我想他到欧洲去的行李与川资一定不是太减色的,所以他与西方人交际,对于这一层绝对不成问题。他告诉我,他居然也遭了西方人的白眼。事情是这样的。张将军从欧洲回来同船的一个西洋人,同他一路上谈得非常投机,他很觉得张将军是位很可钦敬的朋友,但是谈到正热的时候,无意之中问张将军道:你们贵国(指日本)近来对于俄国关系怎样,满洲国的情形怎样?对于中

国更将如何处置？张将军看他有所误会，便坦然地答道：鄙人不是某国人而是中国人。这句话刚落音，这位西洋人便掉头不顾而去。自此以后，每日和张将军见面便成了陌路之人！张将军对我述此一段遭遇，言下犹有余愤！

2 中国人的心理

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肯努力，说白些，就是好吃懒做。从这一种心理发展下去，便是亡国亡种的心理。大家都是各顾其私，只要自己过得衣食饱暖，什么国家社会，什么公共福利，皆一概不管。就是对于国家现状抱着忧虑，表示不满的，也只是在那里嗟叹或希望"天生圣人"来替他们打江山。这里我要说件故事：

据说，有两个叫化子在那儿"各言尔志"，一个说，假使我发了财，我买它五百石米，我睡在米堆里，饿的时候左边吃一口，右边吃一口，多么快活！另一个说，假使我发财，我一定买它一大堆棉絮，我睡在棉絮上头，左边冷了，向左边堆里钻钻，右边冷了，向右边堆里滚滚，岂不温暖一世！——这是一件。

又有人说：有一大群蛤蟆在池塘里商量，说蚂蚁有王，蜜蜂也有王，为什么我们不要一个王，于是大家就朝着天乱叫，叫得上天不安，从天空里降下一个大木板下来！落在水面上，把这一群蛤蟆吓得屁滚尿流，个个都伏在水底，不敢出头。其中有一个胆大地跑出水面，跳在木板上，以为很得意，大叫起来，其余的蛤蟆也都相继跳到板上，乱叫起来，上天听得不耐烦，道，这些东西真讨厌，它们要个"王"，好！就

降了一条赤练蛇下来。这条赤练蛇下来以后,便把那一群蛤蟆吞个干净。凡事之不能自救,不肯牺牲,而只希望外力来拯救者,皆蛤蟆之流,叫化子之续也!

一九三五,十一,二三。

四八　清季外交界的趣闻

清季外交的失败,半由于清廷之专注力于防内,遂不能不对外屈服;半由于清廷官吏懵然于国际情势,因应无方,动辙得咎。至于清季外交界之腐败无常识,举动荒谬,腾笑列邦,实在是"罄竹难书"!兹就余所亲见亲闻之事,略举数则,以示一斑。

薛福成的马桶　薛福成在前清出使钦差大臣当中要算是"庸中佼佼"的了,然而其为人之顽固,实在好笑。曾记得他出使外国时,钦差大臣的行李单里面有一件最足代表中国的物件,写在上面。这物件是什么?原来是"金漆马桶一只"!当他命人携带他的御用的金漆马桶时,有人告诉他说,外国轮船火车以及民房、客寓,均有抽水马桶,非常便利清洁,无需携带中国马桶。我们这位薛钦差大不谓然,谓中国大官所用马桶,何等讲究,而且使用已惯,如何可以改用外国马桶?执意不肯,于是随从们只好将钦差大臣的马桶,

带上轮船，放在钦差大臣的房间里厢，每逢外人走过钦差大臣的房间时，莫不掩鼻而疾驰，避之惟恐不及。许多外国人莫明其妙，经过一番调查，才晓得是中国钦差大臣的马桶的“声教洋溢”所致！薛氏不但宝贝他的马桶，并且宝贝他的痰唾。他的痰是不肯吐出来的。他的痰已经出了喉咙，都还要咽下去的。诸位不要误会，这并不是他怕有碍人家的卫生，而是他不肯损失他的原气的原故！

曾小侯与安南　安南这一大块土地，就是我们曾湘乡相国，曾侯相国藩的儿子曾小侯劼刚送掉的。后来有人责备李传相，那实在冤枉。原来当安南人民杀了几个法国教士，法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惩办凶手，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当其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这种交涉命曾劼刚与法国政府折冲，因为其时曾出使英法，清廷颇为倚重。但曾氏始而把这种事情视若无足重轻的瓯脱化外，对外人表示，中国政府不愿过问，由他们自己去处理的态度，于是法国始借口进兵。然而法国进兵的当初，目的也只在占领越南的东京，所以占了东京以后，便停兵不进。但是我们这位小侯爷却以为是法国人胆怯不敢进兵，于是便一变从前不闻不问的面目，奏呈清廷，主张与法人开战。战端一开，遂把整个的越南送给法国人。我并不是不赞成抵抗外侮，而是说，中国的外交总是始而懵然于事势之真象，一味敷衍，一味放弃，所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无切实准备，到了以后，又仓卒言战，徼幸一时，怎样不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中国出使钦差大臣公馆的“白旗”　当我到美国去的时

候，美国大都市都轰传一种笑话，这个笑话传到我耳朵里来，却真教我难堪！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的公馆里面，常常在楼房檐下，飘曳出许多白布长条子，每逢晴天大太阳时，总有这种东西出现。美国人士始而颇觉得奇怪，都以为这不晓得是中国钦差公馆挂的什么旗帜，或以为是哪一国的国旗。后来打听打听，才晓得是中国钦差大臣太太小姐们的“裹脚布”！

一九三五，十一，二五。

四九 菲律宾的独立

记者 菲律宾现已在政治上脱离美国而成立一个独立国家，这件事对于中国的影响将如何？

老人 菲律宾是从奴隶的地位进而恢复原来主人的地位，就是说，从殖民地的状态进而恢复他的独立国的状态，不但恢复而且要进一步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中国恰恰相反，是从主人地位，一天一天地降到奴隶的地位，就是说，从独立国家的状态，一天一天地降到殖民地的状态。现在菲律宾的新共和国的欢声送入我们静候人家宰割的中国人民面前，你想对于我们会发生什么影响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美国之放弃菲律宾，实在是他们的一个聪明的政

策：一来是，他们若果不放弃菲律宾，那他们每年要对菲律宾支出一笔很惊人的国防费，用许多力量来照顾它，所费实不赀，而在战略上实为美国的国防上一个破绽。二来执意保持对于菲律宾的宗主国的地位，反足以授某某野心国家以鼓动菲人反抗美国的民族心情的口实。现既承认菲人独立，美国既可减轻自己的负担，又可博得菲人的欢心，使野心国家无所施其技，所以我说它是一件聪明的事体。

记者　老先生相信美国果真完全放弃菲律宾么？

老人　那是足下的误会。美国明明声明菲律宾完全独立还在十年以后。美国人是否诚心扶助菲人达到完全独立的地位，这要看他们在此十年之间怎样帮助菲人而后定。若果在此期间，美国人真正站在菲人的利益上帮助菲人发展自卫的力量(军事的，生产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那美国人在菲岛的指导的势力只有一天一天增加的和巩固的，不然的话，美国人也要食其后果的。

记者　所谓“后果”，是不是指某国有乘机取美国之势力而代之的可能？

老人　美国人若真实地帮助菲人使他巩固其完全独立国家的地位，我敢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取他们的势力而代之的，不然的话，那就不敢说了。某国人对于菲岛的独立，自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美国既承认菲人独立，则他国将更多伸手菲邦的机会。惧的是，他自己方将出其全力以夷人之国家为殖民地，为保护国，而菲岛适以独立轰传世界，相形之下，实在是一件令他不欢的事。但是我希望菲律宾共和国由脱离美国的统治而进为独立国；再由独

立国经过自由意志的审量,加入美国的联邦,与夏威夷等国为美国共和国的机构之一部分,更为有益。

一九三五,十一,二六。

五〇 中国各大学教授所应做的事

记者 昨今两日上海各报遍载北京各大学教授因有人假借他们的名义擅发主张脱离中国政府,组织所谓自治政府的宣言,遂由蒋梦麟、胡适、任鸿隽、傅斯年等各大学教授签名发表声明,"除表示反对破坏国家统一外,并郑重宣称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完整"(见本月二十五日上海申报)。老先生对之有何感想?

老人 (很兴奋地叹息道):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古人所谓"作之君,作之师",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之所以形成,必须有两种人为之重心:一种是负政治上责任的,就是站在政府机关以内的官吏;一部分是负人民教育之责,为之师傅的人。前一种人是用政治(包括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军警武力等等)来统治人民;后一种人乃是用他们文化工具使人民增进知识,发扬信心,培养道德。就国家社会之所以存立的根本言之,后一种人,即今之大学教授以下为人师表的人更为重要。譬如人之一身:行政方面犹之四肢百体也,师者

脑神筋也。君者身也，师者心也。四肢百体固然重要，而脑神筋更为重要；身固重要，而心更重要。北平各大学教师早就应该站出来说话，直到现今他们才说，已经是太晚；然而他们还敢说几句应当说的话，这在我们的现时中国教育界实在是“空谷足音”！但是——

记者　“但是”北平各大学教授发表这种宣言以后，又将怎样呢？

老人　单只靠着一种宣言又济得甚事？宣言之后，必继之以行动，使他们的正确信念灌注到全国（上自政府下至民众），因此我希望北平各大学教授（自然也希望全国其他各省各大学教授以至全国的师表）：（一）要对于他们的信仰（即他们所宣言的）生死以之，不要学我们孔夫子的办法“可以止则止”；必须要使全国人民成为一个由头脑以达于四肢百体能言能行、敢言敢行的活人，不要只说了几句话就摆架子，让全国人民成为“活死人”，“死活人”！（二）要做中国的斐希特 Fichte，不要中国的康德 Kant。当一七五八年东普鲁士即船尼格士白克尚为俄兵占领时，康德因为要想在该处大学内补任一个正教授的职位，不惜卖却他的德意志光荣的学者的身分，上书俄女皇摇尾乞怜，并且署名道：“永为皇帝陛下底仆人英马奴哀·康德”。康德的哲学我们对于他虽然不得不表示相当的敬意，但他的拜倒在异族的统治势力的脚下的人格，实在是一无足取。斐希特则不然。他在哲学方面虽说是继承康德，但在行动方面却恰恰和康德相反。当法兵攻普鲁士，柏林已经在拿破仑第一的枪尖之下时，斐希特大声疾呼，到各处演说，唤醒德国民众反抗外敌

的自信力与敌忾，又抛却大学校长的地位到前线去宣讲，以事不果。而他的夫人因服务战地，得了热病，他因看护他的夫人受了传染，遂于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间接地做了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我们的教授们，起码要以斐希特为榜样，中国才有希望，他们也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的天职，才可以俯仰无愧！

一九三五，十一，二七。

五一　中西各国元首学问上的比较

西洋的文化比中国实在高得多，一般人民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且拿欧洲各国的元首来说一说。譬如第一拿破仑，谁也知道他是一个富于创造天才的军事家，秉有卓越的能力的政治家。但是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家的人，在中国还是很少。拿破仑第一之嗜学也迥异乎常人。他亲手写定法国的民法，这部民法后来为世界各国所仿效，虽至于今，犹为谈民法者所必读之书。以他的学问功名诚为不可多得，然而当他想到法国的 Akademie，去做一个学员时，犹为彼中所拒绝，西方学术团体之严格如此，而欧洲各国的元首之好学亦可见一斑。

法皇拿破仑第三后来虽兵败于德，身为俘虏，世人往往

便因此把他的一些长处都忽略了。他曾经在军事上发明过许多有用的兵器,如探海灯,火药,大炮上测算远近的表尺,都为现今兵器学上最大的贡献,而他的关于军事学的等身著述,更是至今以前各国军学家所珍视的宝典。其他如美国前任大总统威尔逊,英国前工党内阁总理麦克唐纳,以及苏联的开创者列宁,都是著作等身。他们在政治上,立场或许有大的不同,然而对于学问都有很大的研究与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说到中国的历代的元首,实在可怜得很。秦以前我们不说了,汉高祖本是一个大流氓,自然谈不到什么学问,项羽是一个莽荡丈夫,说白些,就是一个粗卤汉子,更谈不上学术。至于汉武帝、唐太宗,虽然有些事功,然而我们也找不出他们自己有什么学术的研究。明太祖也是一个草泽英雄,后来功成业就,虽然相传凤阳明陵的碑文(此碑文实在是一篇出色的文字)是他自己做的,然而除此而外我们就绝对找不出别的什么学问上的成就。数来数去,只有一个魏武帝(曹操)是一个著作家的元首,此外真正懂得文学的,那就要算是武则天了。清朝的康熙虽然会写几个字,会诌几句诗,实在不成个东西,够不上说著述,说起来实在可怜!有人说,唐太宗、康熙皇帝也有许多御制的东西,但那些东西都是假手于人的,不能说是他们自己的本领。中国的君主都是安坐而食,一点事不做,一点心不用的,这一点也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因为儒家主张“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或许儒家这种说法,只是从当时的政治实际情形抽绎出来的伦理观念。

但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治于人者”劳力,终身无休息,而“治人者”却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脑满肠肥”,蠢如鹿豕!真正可怜可叹!

一九三五,十一,二八。

五二　欧美的社会学者和历史家应当到中国来研究

中国这一个国家到了而今,实在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他之所以自处,也是古今万国找不到第二个。

他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他有一千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有五万万的人民,然而他犹如是一个臃肿不灵的动物一样,被外人征服了几次,受外人的统治前后不下四五百年,他们简直没有抗拒外来侵略的力量。明之覆元,民国之亡清,都是等到它们自己腐败衰老,而后从而摧毁之,然当其盛时,实不曾有过多少有声有色的反抗。最好笑是宋朝,那些君臣真是迂腐得难以形容,他们要算是虔诚的孔教徒了,当元兵已渡河,他们逃难在竹筏上还在那儿讲《大学》。到了明末,做异族开国元勋的,都是“峨冠博带”口孔子而文曾、孟之流。现在又要走旧路子了,但是当五全大会正开会时,消息传来,说政府对于华北已有适当办法,绝不使国家

领土,再有所丧失,不过今天(十二月一日)上海申报载有如下一段北平专电:

> “关于华北局势,以连日极紧迫,曾迭请中央请示办法,昨晚有电到平,谓京方现尚未有具体方策,仍希望北平方面,于苦撑之中,自谋办法……”

我的眼睛不大行了,耳朵也不聪了,遇有要紧的新闻,总是朋友们大声读给我听。当他们读到这个电报时,我始而以为是我的耳朵听错了,终而又请他们一读再读,总是这样说法!这也甚奇!中国现在这种局势以及政府人民所以自处之道,真是找不到前例!所以我说,欧美各国的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都得到中国来研究一番,一定可以给他们发见许多社会学上的法则与历史学上创例!

一九三五,十一,二九。

五三　生物学上的“亲善”现象

蜜蜂中的雄蜂是不劳动的,劳动的都是雌蜂。雄的镇日价居在窠里,专等着雌蜂采集食物,送来给他们享用。他们的用处在哪儿呢?就在给女皇做“面首”。原来蜜蜂的王

是雌的，一切雄蜜蜂都是供她的享用，同她交合，她不要的，方许其他一些雌蜂来享用。但是一旦她们都受了种子之后，到了冬天，便把雄蜂一律逐出窠外，委之于冰天雪地，不冻死，即饿死。雌蜂雄蜂之相伴，其关系如此！就是人间的夫妇之亲，其亲善可说是至为密切，然而一到了不需要对方时，也便“弃之如遗”，何况口头亲善专借之以为“蚕食”之掩饰者，世人读此，可以憬然悟矣！

记者按：螳螂的故事对于“亲善”所昭示的，更加深切著明，陶行知先生曾有这样一段纪述，今节录之如下：

“这位太太（雌螳螂）所以爱伊的可怜的丈夫（雄螳螂），不但是因为他能使伊的卵巢受精，而且是因为他的肉合乎伊的口味，早则当天，远则明日，他必定要被老婆捉着，照例在头颈上一口咬下，细细的吃，除两翅膀外，都被伊吃得精光。

而且雌螳螂对食色两欲是不会满足的。不论下蛋与否伊休息一忽儿，久暂各个不等，便能接待第二个丈夫，并同第一个一样把他吃掉。第三个接上来，尽了传种之责，是被吃掉，踪迹毫无。第四个的命运也是这样。”

今之所谓“口口亲善”，何以异于是！

一九三五，十二，二。

五四谈屑

1.“大局”

我常听见中国历来的政府当局，每每以“顾全大局”或“大局”、“大局”昭告于人，若似乎他们自己都是公忠体国，或民胞物与的心胸，实则一察其行为，无不和他们所言的相反。曾记得袁世凯也是常常对人说“大局”的，有一个人故作不知地问他：“大橘”(局与橘音同)究竟有多大？袁氏瞠目不能对。这位先生徐徐地自问自答，并且用双手合拢做碗口大的圆形以为譬道：“我想，‘大橘’有这样大！”袁氏很诧异道：“你怎样知道？”某氏答道：“他们的眼中只有金钱；胸中只有饭碗，吾是以一般人之所谓‘大局’，其范围绝不能超过饭碗，故云！”袁氏听了，嗒然若丧！呜呼，今之所谓“大局”，即若而人者饭碗之世界也！

2.我之一度被骗

民国初元南京临时参议院时代，我与我的外甥朱志尧皆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当时有人告我说，距南京不远的江边，有一块芦洲地，面积万亩，售价不过乙万数千元，若购得此地，每年所出芦柴便可获利数千元，以之兴办学校，何施而不可？我听了这话很快活，便设法筹款。但此一万数千金者，焉能咄嗟立办，于是我便同外甥朱志尧商量，把

两人每月参议院所应得的薪金夫马费各数百元一律拼凑起来,不够又从它处设法,一齐总筹了万余金,凭着前次来说话的某人立契付价,便把他说的那块地买下来了。有一天一位朋友知道了我做这桩笨事,跑来告诉我说:某人靠不住。当时朱甥在招商局任事,我便教他派一只小轮载我们到我所买的那块洲上去看一看,哪知道我们坐了小轮,照着我买的芦洲的地契所注明的地段去找,找了一天也不曾找着,才知道是真正被人骗了!

一九三五,十二,三。

五五 中国人的演说

当我创办复旦公学时,我曾立下规则:凡是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我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我并把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以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于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大概中国人对于演说,知所注重,恐怕就是从这时候起的。不过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种工具,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因此我想起法国的一个

大政治家，他的名字叫退尔 Thiers，他少年时只是一个店员，十八岁以前便常常投稿到报纸，大为报纸编辑所赏识，旋即被请去当编辑。他后来竟做了拿破仑第三的大臣，他的演说非常有力，当他任期满时，国会一般人对于他都反对，但当他在国会做一度辞别的演说时，国会又全体投票举他留任，如是者三次。但到后来，国会不许他再做辞别的演说了。可见天才的演说的“吸引力”之大！

一九三五，十二，三。

五六　中国人应该知道国家是什么

上海某报记载华北民众对于所谓自治运动的事实，标题曰：“华北民众死也不肯‘自治’”（大意如此），我看了很诧异，因为假使“自治”果真由于民众自身之意识出发，那自治运动实在无可厚非，因为“自治”本身本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人民而果能自治，本是国家的一件极好的兆头，但非所论于此次华北之自治运动。然而上海某报之标题，却未免大有语病，这个原因就在于不明白国家的真谛。西方哲学关于国家的学说且不说，我们且就中国古代哲人及历史家的话来说一说。书经上所谓“则君，所以自治也”。可见自治本是古代国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君有可以做民之则的地方，

始成其为君,民亦始认其为君。那末,所以立君,就是完成民众的自治,而不是如韩昌黎所谓:“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儒者末流之极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华北现在一种违乎国法人情之伪“自治”运动,遂并自治本身而痛恶之,因为人民若果不能自治,那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

荀子说得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穷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由起也。”制礼作乐都是国家的重要权责,若果没有制礼作乐的必要,则国家也就无从产生。班固因荀子之言而扩充之如下:

>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汉书·刑法志》)

君者所以为群,而群者即所以维持人类以与自然争,与害群者争,此犹就群以内之需要国家的事实而言,而国家之成立另一条件乃是对外保障本群之安宁。所以群愈大,抵抗力也就愈大。所抵抗者,有天灾,有人祸。天灾暂且不

谈,而人祸之最烈者,莫大于敌国外患。一个国家若果不能合群以抵抗天灾人祸,那已失却国家的资格,其名虽存,其实已亡。默察时局人心,一部分人宴安逸乐,已不复知有国家兴亡之感;一大部分则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救死扶伤之不暇。国家之为何物,一般人脑海中大都不曾有一种明确观念,又何怪乎偌大一个国家弄得七零八落,不可收拾。

一九三五,十二,四。

五七 所谓文化

现在常常听见人家说文化,甚至东里掘出一些石人,西里掘出一些石马,大家便欣然相告,以为“文化,文化”,若果问他们:这种石人石马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它们怎样成为文化?则瞠目而不能对。实则文化在欧语为Culture;义云“改进”,又云“栽培”。荀子有言:“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荀子·礼论篇》)举凡由人类的历史经济中所发现或发明的增进其明德和其物质生活幸福的技术,科学,美术,机械,建筑等等,皆谓之文化,而语言文字

亦其一端。因为它们能传达人类的思想、感情，不但传之远而且传之久，使万物经过语言而成为明确的意象，明确的意识。把这种语言笔之于书则为文字，有了文字，人类的历史才可以信今而传后，所以语言文字为文化的一种最重要因素。总而言之：凡由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万事万物足以备“五官”“三司”之摄取而足资感发兴起，或增进人类的物质生活者皆文化也。

文明在西文为 Civilisation，此字源于拉丁文的“城市”一字，谓城市居民的一切衣食住行之卓然可观，而表现出伟大的进步者，皆谓之“文明”。

一九三五，十二，五。

五八　谈　　屑

1. 胡适之的一鸣惊人

胡适之此次在北平，当该地长官邀集北平各大学教职员及地方教育界领袖商谈国事时，某官长告诉他们说，某国交一个名单给他们，要他们立即逮捕；这个名单一共有二十几个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领袖，有反对某方嫌疑的。其用意是在一方表示好意，说：“你看！我们如何能做这桩事！”但

一方也就是对这些教育家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些。胡适之声色俱厉地答复道:"我们到你这来,就是准备使你们逮捕的,并且准备你们把我们送到某国司令部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国家的领土!"云云。此种消息,果然属真,则我对于适之应致其极诚恳、极亲切的敬礼。就适之平素为人与其学养说,我也确实未尝十分注意,然而这次一鸣惊人,使我老人复感觉周身热血升腾,觉得中华民国前途,还有希望。尚望适之本此精神努力奋斗,并希望平津一班教育家均与适之戮力同心,共此艰苦,勿让适之独为君子! 我当朝夕祷告上帝为诸君祝福!

2. 敬以质之纠纠桓桓之士

从前绿营学会了请安,现在的军队学会了举枪,立正,举手。但是绿营的请安,学会了有三百年;而现在的新军举枪立正等等,也学了一百年了! 绿营只学会了请安(旗人的礼节),不能打仗(抵抗外侮);而现在的新军是不是也只学会了举枪立正等等,"执干戈"而不"卫社稷"呢? 敬以质之纠纠桓桓之士!

3. 买 办 头 脑

中国人不但懒于行动,尤其懒于思想,所以只重记忆。在文化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莫不如此,就是说,只知依样画葫芦,等于只知贩卖,不愿创造。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买办头脑"!

4. 上海汇丰银行开办时的大股东

上海汇丰银行初开创的大股东是“咸水妹”,因为她们的存款居最大多数。自今以前操中国的经济生命者为汇丰银行,而汇丰银行的开山老祖就是那些对于外国水兵水手卖笑的咸水妹。这说乍听,实在有点难以令人相信。但咸水妹虽操贱业而汇丰并不因此而不尊重其股东资本,西方人的伦理观念,究与东方人不同!

5. 磕头请安

袁世凯居恒告我曰:人民不知敬事长上,国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我漫应之曰:君所指者,殆即磕头请安之谓乎?果尔,便足以安邦定国平治天下,则予愿自今以往,朝叩一头,晚参一拜,日日勿懈,为天下倡!

一九三五,十二,七。

五九　再谈国家

我们上次谈到国家问题,觉得意犹未尽,今天再详细地谈一谈。最近我尤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中国现在一般人简直可以说:

一、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所以不爱国家;

二、严格说来,现在的中国实在不成其为国家。

那末国家究是什么一种东西呢?就是人群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在历史上,自今以前,也可以说是人群唯一的最高组织,古人说,"人生而能群",因为人之生也,无羽翼,故不如鸟之能飞;无捷足,故不如兽之能走;无鳞介,故不能如鱼之能游于水;又无巨牙利爪,故不足与毒蛇猛兽争一旦之命。然而他能凿山开道,驱猛兽,杀毒蛇,养生送死而无憾,唯一原因,就因为他们能群。动物中间,或亦有能群者,但绝没有人群这样的伟大,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古开太平……",皆是人群所担负的使命。

人群之最重要,最伟大(就历史言之)的组织,就是国家,我们已经说过了,但国家的使命在什么地方呢?约略言之,厥有两种:一种是Negative;一种是Positive。Negative与Positive这两个字,中国人翻做"消极的"与"积极的",这种译法是抄袭日本人的,实在不恰当,不但足以引起人的误解,并且在国民精神上,贻害无穷。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时常听见这两个名词。一个人在政治上不得意,辞官不做了,人便说:某人"消极"了,或是"态度消极";某人在政治上一帆风顺,兴高采烈地干,于是乎大家又说道:某也某也甚为"积极",实则这都是Negative与Positive之误译的谬种流传,害人不浅!所谓"消极"与其说是西文的Negative,还不如是佛徒的悲观思想,出世思想,因为就拉丁语Negaitve的意义说,绝不是像佛家泯绝一切,亦不像道家的"清净无为"那种说法。就是说,Negative并不是静,而是动;不是

无,而是有;不是槁木死灰,而是活泼泼地。所以我数十年来对于此两字 Negative 与 Positive 的中文译法——消极的与积极的,实觉其不当,然而因为思索颇久,没有相当的名词来替代它们,又不得不暂用它们来代表 Negative 与 Positive 的意思,深以为苦!

一九三五,十二,九。

六〇 三论国家问题(二)

近来我和朋友们讨论 Negative 与 Positive 这两个字,忽然想起一句成语,即“饰回增美”。《礼记·礼器篇》说:“饰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照《逸雅》说:“饰,拭也,物秽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后明,犹加文于质上也。”所谓“回”,就是“奸回”之“回”,恶德也。饰回,就是荡涤旧染之污的意思。所以我现在决定用“饰回”之“饰”来译 Negative;用“增美”之“增”来译 Positive。Negative 与 Positive 既得到恰当的译文,至少我们暂且假定它们是恰当的,等到我们把国家的种种事实叙述出来,且加所研究以后,不但我们对于国家的界说可以相悦以解,即对于这两个新译名的内涵也必定可以“豁然贯通”! 我们对于“饰”与“增”的两种作用看得一样重要,并且相须为用,缺一不可,没有“饰”的作用,便不能有

“增”的作用。譬之人身:四肢百体的细胞一天一天地“除旧布新”,就是说,一方面旧的老的细胞,已不能适应自然,不得不死去,不得不排除,而另换一些新的、少的细胞继续整体的生命。排除旧的老的,便是“饰”的作用,即西语所谓Negative的作用(亦即所谓“消极的”作用);布置新的少的,便是“增”的作用。譬之人类:从他的发展史看来,经过长期的生活斗争,渐渐排除他的不适宜的肢体,而变为适宜的肢体;渐渐排除不适宜的生活工具而创造适宜的生活工具;就心灵方面说,渐渐排除他们的不适宜的思想,而形成他们比较适宜的思想。排除的作用就是饰,创造或形成就是增。最后就国家社会说,卢骚的《民约论》说,国家由于人类的自由契约,实在不对。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在于他的“能群”,乃是由于天性,由于自发,而非由于外铄。他们的群发展而为国家,完全由于两种目的:一种是“饰”的目的,即所谓“消极的”目的;一种是“增”的目的,即所谓“积极的”目的。消除天灾人祸,为国家的最大使命之一所谓天灾是指水、旱、疫疠等等而言。所谓人祸,小而言之,盗贼之行劫,贪官污吏之虐民,皆是也;大而言之,内而权奸当国,外而强邻压境,皆是也。用严刑峻罚,使人不敢为盗,不敢作奸犯科,便是“饰”;用非常手段(如政变革命等等)诛锄权奸,澄清政治,甚至变革政权,巩固国基,或遇敌国外患则领导全国人民,“背城借一”,誓死抗争“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皆是“饰”的工夫。一个国家若果权奸当国便不能抗御外侮,故欲御外侮必先除内奸,然而锄奸御侮,其为“饰”一也。必然把饰的工夫做到,然后才可以说到“增”,所谓欲兴利必先除

弊，就是这个意思。“饰”与“增”其为用适相等，而饰的工夫还在先，所以古人不曰“增美饰回”而曰“饰回增美”，用意至为深切。因此我又悟到现在一般人高谈和平：实则今之所谓和平，乃是奴隶与主人的和平，而不是平等自由的和平，因为和平是“增美”，而欲得真正的和平，必须先大刀阔斧地与和平之障碍魔鬼和蠡贼作殊死战，把他们消灭后，我们才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在层层压迫或无耻的投降状态中谈和平，皆不知“饰”与“增”之道者也，皆靦然人面，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也！由事实证明：一般国人实不知国家为何物，中国现在是否还成为一个国家真成问题！国民乎！其起而共雪此耻也！

一九三五，十二，十。

六一 杂 谈

刘梦得《西塞山怀古》诗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好一个“一片降帆”，活画出亡国大夫争先恐后投降敌人的一幅画图！吾不知今之读此诗者作何感想！又不知高丽的李完用和中国的秦桧读此诗作何感想！

陆剑南《估客有自蔡州来者感怅弥日》二绝之一道：“百

战元和出蔡州,如今胡马饮淮流。和亲自古无长策,谁与朝家共此忧!"人家百战之后,才让胡马饮于淮流,才谈到和亲,我们现在并不以一矢相遗,干脆的拍拍屁股,拱手相让,假使剑南而在,北风不竞,敌机已翱翔我之天空,敌骑已纵横于吾之境内,东南西北,如入无人之境,其"感怅"又当何如!

洪大全兵败被执,清吏将其解至北京,誓死不降,清廷杀之,临刑之日,观者塞途,汉臣中有指而骂之者,大全高诵司空表圣句以答之曰:"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为清廷骂汉人者汉人也,为清廷杀汉人者亦汉人也。孰知数十年后,为某国骂中国人者亦中国人也,为某国杀中国人者亦中国人也!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乎"!

黄梨洲曰:"东汉太学生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孙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今则以国为盗,其祸患千万倍于东汉时代之"豪强",而国家存亡兴灭所关,又非如"李纲"一人之出处问题所可比拟,学生之不能默尔而息,亦不应默尔而息,乃必然之势,亦情理之常。此事一见之于"五四",而民气为之一振,国脉为之一苏,今则此事又将复见(参看十二月十日上海各报北京专电)。北京城头日已昏,其"衰世之事"耶?抑如余前所言"饰回"之必然现象欤!

今之人不可不熟读《明夷待访录》!

十二月九日上海《大美夜报》载宋哲元司令谈话表示三点:(一)不屈服于外力压迫;(二)服从中央;(三)对外决无任何秘密协定。善哉宋司令之言乎?老夫垂涕百读,心胆复壮,惟是仲尼有言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余闻宋司令之言矣,今而后将拭明老眼以睹宋司令之行也!“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宋司令勉乎哉!

一九三五,十二,一一。

六二　好　学　生

记者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对于政治运动已经成了消沉的状态,现在因华北问题,又有重整旗鼓之势。老先生对之有何感想。

老人　说到这个问题,我自然有不少的感想!但首先我要谢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数年来对于教育十分热心,他们教学生要爱国,要尽忠,要仁民爱物,要公而忘私;他们又教学生以“学术救国”。学生们也都很听他们的话,虽然,这几年来,时势大坏,国事日非,学生们还是极力遏抑他们满腔热血,闭明塞聪去领受我们许多教育家的“金科玉

律”的教训。你想这些孩子们多么可爱！这不应当谢谢我们的政府及教育当局吗？

记者 但是现在情势却不同了！青年们已不能再安心读书了，他们又回复到五四运动时代的兴奋状态了，或则更超过五四运动时代的兴奋状态！若果他们安心读书，我们应当感谢政府及教育当局，那末，现在他们不能安心读书，要从学校走到街头，抛却书本来干民众运动，那又当怎样呢？

老人 那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政府与教育当局，因为他们天天教青年们爱国，教他们要“忠”，要“勇”，孩子们看见国家到了“命在旦夕”的时候，出来呼告他们的父母兄弟，诸姑伯姊，赶快起来补救，这不是他们平时能以敬聆师长教训的结果吗？饮水思源不是我们政府及教育当局的耳提面命，以身作则的功劳吗？怎样不应该感谢他们呢？

记者 那末，政府及教育当局，既然教忠教勇，自然都是对国家而言，绝不是教他们对于某个人或某少数集团尽忠有勇可知，今日学生的请愿示威等行动，正是实验他们所受的教育，为什么军政警当局又严加干涉，甚至加以逮捕或施以各种压力呢？

老人 那末，这个……这个……这个问题我却不能答复，因为连我也不懂！敬以质之政府当局！

一九三五，十二，一三。

六三 “怯懦”与“残酷”

当我在徐家汇天主堂学校读书时，我的一个拉丁文的先生关于人性问题有一段很重要的谈话，今天特把它介绍在下面：

先生 人越怯懦其待人也越恶，越残酷。

余 就常理说，残酷的人一定是暴戾恣睢的人，胆怯的人似乎不敢这样乱干罢？

先生 因为大英雄豪杰真正公忠体国，爱民如己，居心也就坦白无私，他自己觉得对于人民大众没有私恩私怨，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所以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凡于这种人都很大胆，他们也不愿钩心斗角地防备人，就是对于敌人也只有极正当的防备手段，即使万不得已要武力，顶多也不过杀之而已。而胆小的人则不然。他们之所以胆小，十九因为做了许多“人非鬼责”、“天怒人怨”的勾当，他们在心田上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恐怖，前后左右仿佛都有人在暗算他，遂不得不严加防备。这末一来，便成了天荆地棘，甚至至亲好友皆变成他的嫌疑犯，所以他捉到了他认为仇人的，或谋为不轨的，总是加之以严刑峻罚，大都要之死地，不但要置之死地，并且要很残酷地结果人的性命。譬如奸夫谋杀亲夫，总不是止杀一刀，因为他杀了一刀之后，惟恐他不死，必须再重一刀，再重一刀，甚

至三刀五刀、七刀八刀才放心。权奸大憝之诛戮异己,亦复如斯。

余　权奸大憝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诛戮异己呢?

先生　权奸大憝,我们就拿甘心媚外的人说罢。他们甘心拜倒在敌国异族的脚下,但对于本国人民却又要以主人自居。就是说,他们做外国人的奴隶,便要叫本国人民做奴隶的奴隶,用中国古小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叫百姓做个"与奴才为奴才的奴才,"若果老百姓不愿,那他们自然要以严刑峻罚随其后了!

余　此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先生　权奸大憝既投降异族,必然要对新主人表示十分忠诚,于是就不得不对他的同胞露出极狰狞的面目,甚至不惜以同胞的多数生命做他孝敬新主人的礼物,此征诸史乘而历历不爽者也。因为他们以为不如此,既不能见信于主人,又不能镇压奴隶,便不能安享富贵!

一九三五,十二,一四。

六四　胜败的关头

犹太的古代史乘中有一段故事,极有异趣。故事是这样的:

犹太人有一次聚会起来大家商量要立一个王，正在商量不决之时，一个高个儿的小商人撒乌尔从别的地方走了来，那些正在聚会的犹太人便惊奇地欢呼道：国王来了，国王来了。于是就举他为王。撒乌尔做了王以后，颇能尽职，对于战争，也颇勇敢，差不多每战必胜。但是到了威尼斯人来攻他们时，情形却不同了！

威尼斯人军中有一个将官是一个巨人，这个巨人比春秋时代的鄋瞒国长狄侨如(长三丈)和汉朝的巨无霸还要高。他天天率领兵士到犹太人阵前去骂阵，挑战，没有一个将官敢出来和他对敌的。犹太国王没法，只得大张诏谕，宣示臣民：有能却敌者，允以公主妻之。太卫德本是一个牧童，顶多不过十八岁。听了这个消息，便去自告奋勇。国王一看，原来是一个矮小的少年，问他有什么本领可以与巨人对敌。他说，我是一个牧羊人，为了保护羊群免于豺狼攫噬，故习得一种武艺，能于百步之外，力发巨大的石弹击杀豺狼，百发百中。犹太王不信，他说："你让我试试看，不行也不要紧，然后你再选能将好了"。犹太王答应了，替他做了一身盔甲，又给了他一把钢刀。他都不要，只带着他一袋子石弹，一根长索，上了阵。那个巨人名叫哥利亚特的，看了大卫德便大笑起来，说道："你这个小哥儿，何必来送死！你的全身还没有我的大腿儿大，如何可以来同我作战？"正在奚落他的时候，他慢慢地说道："我们且较量较量看。"巨人哪里防备他。他说："我来了。"哥利亚德漫应道："你来罢！"说时迟，那时快，大卫德早已一弹子打中巨人的顶门心，山也似地倒在地下，大卫德看他倒了！手中又没有刀，

正急得没法，看见巨人腰间有一把大刀，于是跑上前去，用尽气力把它拔出，对着哥利亚德颈间，砍了多少刀，才把他的头割下，背到犹太王那里请赏。犹太王虽然重赏了，却终久没有把公主给他。我们从前曾做过巨人，被一个小伙子打倒了；现在临到我们做小伙子，而人家做巨人的时候了，但不知我们究有大卫德的勇气没有！

一九三五，十二，一七。

六五 所谓"礼教"问题

记者 现在党国要人皆极力鼓吹"礼教"，而此次宋哲元先生在北方宣布所谓"冀察行政委员会"开幕时，首先就揭櫫："发扬中国旧有的礼教"。究竟中国的礼教是什么东西呢？

老人 中国的礼教一般人都会说，几乎成了士大夫的口头禅，但以我经验看来，真正能懂得中国旧礼教的能有几人！至于真正躬行实践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就拿张宗昌和张勋两人来做个例罢。这两位杀人不眨眼而戕贼民生元气的刽子手，都曾轰轰烈烈地提倡过中国的旧礼教。试问他们懂得什么礼教不礼教？其他或先或后挂着中国旧礼教招牌的文武大僚以及所谓"遗老""遗少"，其与二张也不过

“五十步百步耳”,试问他们又懂得什么礼教不礼教?

记者　但是在老先生的意思,中国礼教的根本究在何处?

老人　要明白中国的礼教,最好莫如读一读《孝经》。因为礼教的大本原就在“孝”,《孝经》,据说是曾子记述孔子论孝之书。一班盲然提倡礼教的大人先生,果真理解《孝经》所说的话,我想他们必定要大扫兴,不但于他们无益,反而有损。

记者　为什么呢?

老人　“孝”之一字,实则就是“爱”的一个注脚,这在西方语言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英、德文你是读过的,德人之言“爱”曰 Liebe,英人之言“爱”曰 Love,所谓。Liebe 与 Love,施之于父母则为“孝”,施之于子女则为“慈”,施之于兄弟则为“友”与“悌”,施之于同国之人而推及于全人类则为“仁”,所以孔子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经》十一章第五)。又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同上《圣诰章》第九)。可见所谓“孝”就是人子对于亲的“爱”。

记者　记者也曾在旧礼教中受过洗礼,但就我的经验说,历来的达官贵人都莫不谆谆以孝昭示人民,实则他们本身之不孝不悌,差不多是百人而九十九,而愚夫愚妇口不道孔孟之言,耳未闻孔孟之教,然而在行动上实行孝悌者,也差不多是百人而九十九。由此看来,中国民众本来就是礼教的实行者,尤其是农民与城市贫民,而今之政府之三令五

申,实在是多事,先生以为若何?

老人　这倒不然。他们提倡礼教自有他们的用意。因为他们心目中总横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糊涂主意,以为提倡礼教便可使中国人民俯首帖耳,听他们摆布,这末一来,他们便可稳坐江山,子孙万世,实则大错特错!

一九三五,十二,一八。

六六　所谓“礼教”问题(前续)

记者　昨天老先生关于礼教问题,说提倡者大错特错,意果安在?

老人　他们提倡礼教只是单方面的。他们以为儿子对老子应当尽孝,人民对君上应当尽忠,老婆对丈夫应当尽礼。殊不知道:忠孝等等的礼教皆是双方面的,没有这一方面便没有那一方面,没有那一方面便没有这一方面。孔子本来说过:“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仝前书《孝治章》第八)。可见要事先君先“得百姓之欢心”,欲得百姓之欢心,必先善待“士民”“不侮鳏寡”,所以孔子又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仝前书《天子章》第二)。这个“人”字,近而言之,则为邻里乡党;远而推之,则为全国同胞以至于全人类。

今之人徒然号于众曰“忠”曰“孝”，而其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毫不爱惜，甚至对于我们所恃以绵延吾祖宗之血食的一般青年，不惜百计戕贼之，则彼等之所谓忠孝，所谓礼教，不过是欺人之谈而已！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大不忠、大不孝。从前“忠”是对君上而言（因为“朕即国家”），现在忠的对象，自然不是指着任何伟人，任何政府，而是指着整个国家与整个民族之利益与生存而言。政府之尽忠，即在保国卫民；人民之尽忠，亦即在“执戈卫国”。不愿执戈卫国的人民皆叛民也，不愿保卫人民的政府亦叛徒也。“贼仁贼义”莫过于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或坐视国家民族陷于危亡而竟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与夫阻挠人民之爱国运动。孟子有言：“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专制时代，君主不仁不义，不爱人民，且得谓之一夫，现代国家的政府更不待言！即单就“孝”之一字言之，政府自己对待人民如同仇敌，则所谓“视民如子”的父母政府，便是不“慈”，不慈便不“孝”。孔子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悖”。又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大学》）现在的为民上者却恰恰相反：“民之所好，恶之；民之所恶，好之！”无论用什么高明的化学家来给他们做定性分析，也找不出丝毫“礼教”，丝毫“孝弟”的成分！

记者　老先生专就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证明现在提倡礼教者，其行为根本与之背道而驰，实在是“犁然有当”！但不知衡之以墨家及庄、老之言又如何？

老人　若衡之以墨家及老、庄之言，那更是相差十万八

千里！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若果现在的老百姓真如一班政客者流，承认他们是“主人翁”，而政府当局只是人民的公仆，那所谓“不忠”的便不是老百姓，而却是另有人在。老、庄亦然。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老子眼中的圣人，孔子自然是其中的一个。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更把孔子所谓礼教打得一干二净！

一九三五，十二，一九。

六七　所谓“礼教”问题(再续)

记者　关于礼教问题，老先生所教诲我们的，真可算得发挥无遗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极关重要问题，要得请教：假使我们完全承认中国人的礼教的最主要的精神即在于“孝，慈”，那末，儿子对于父亲是只有服从，而无反抗，父亲对于儿子也只有慈爱了。不过假使儿子犯了弥天大罪，如叛国，卖国，替敌国做汉奸等等，则父亲对待儿

子,还是应该庇护他,还是应该同国民一样反对他呢?

老人　自然应该同全国民众一样反对他。这在西洋历史上已有了先例,古罗马与希腊作战,罗马皇帝看见他的女儿手上带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戒子,晓得这个东西是来自希腊,便留心侦察她的行动。有一天当两军交战时,他和她同在罗马城外一个高塔上观战,但他的女儿独自一个不得他的许可,走到阵前,正在企图把罗的军情通报希腊军,他便把她捉了来杀了。罗马人民无不称快!这便是"大义灭亲!"

记者　那末,父亲犯了弥天大罪,为叛国,卖国等等,儿子对他又应当怎样呢?

老人　自然也是同全国同胞一样起来反对他,因为国家是我们同胞生于斯,长于斯,养于斯,葬于斯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故土。他若卖国,不但是把他自己的子孙送到地狱里,并把全国的同胞送到地狱里,所以他是天下之大不慈的人,不慈则不孝,为天下同胞除此不孝之人,所以儿子也应该反对他。而且他不但害了现在的全国同胞,并且把祖宗坟墓之地,沦为异域,使全国人民的列祖列宗断绝血食,更是大不孝之人,为儿子的更应该反对他。到了这时,就不是反对父亲,而是反对全国的蠹贼,与祖宗的大逆不道的子孙,"人人得而诛之"(《孟子》)。所以我说果真实行礼教,则第一个受裁判的绝不是我们人民,乃是"监守自盗"、"知法犯法"的若干人!

一九三五,十二,二一。

附录

马相伯生平简表

廖 梅编

1840年 清道光二十年庚子 一岁

4月7日，农历三月初六，马相伯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父松岩，母姓沈，原籍江苏丹阳马家村，家族世奉天主教。据传远祖为元初江西乐平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但马松岩已弃儒经商，兼为中医，生有四男一女，长男早卒，次为女，故马相伯行四，却为次子。

马相伯，名良，以字行。曾名志德，字斯臧；又曾用名乾、钦善、建常，改为良，字相伯，或作湘伯、芗伯。曾署笔名为求在我者。晚年自号华封老人。出生满月，即受洗为天主教徒，取教名若瑟，故又号若石。

1842年　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三岁

患天花，赖姊悉心看护，脱险。姊之教名为玛尔大，后嫁原籍海门的上海富商朱姓，育子二，均为天主教名人。

1843年　清道光二十二年癸卯　四岁

开蒙。

1844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五岁

入塾，随陶姓塾师读四书五经，凡七年。由于教授不得法，引起马相伯对“经学”的终生憎恶。同时在家诵习《圣经》，由其母督教，尤强调按宗教伦理律己处世。

1845年　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六岁

弟建忠生。建忠，曾名钦良，字眉叔，也自幼为天主教徒，曾充耶稣会修士，后退出；于1877年由李鸿章选派，随福州船政学堂出洋学生赴法。曾任清廷驻法公使郭嵩焘、曾纪泽随员，并入巴黎大学攻读政治法律。187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应召归国入李鸿章幕府，长期充任李鸿章办理洋务与对外交涉的首要助手。卒于1900年，年五十六。著有《适可斋纪言》、《适可斋纪行》等。

1851年　清咸丰元年辛亥　十二岁

独自由镇江至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徐汇公学，对各种自然科学尤其数学特别喜欢，深得教习意籍会士晁德莅欣赏。

1852年　清咸丰二年壬子　十三岁

弟建忠亦入徐汇公学。晁德莅任公学校长。

赴南京应江南乡试,因太平天国战争,考试不了了之。

1853年　清咸丰三年癸丑　十四岁

始任徐汇公学各班的国文和经学教授助理工作,边学习边教书。

1854年　清咸丰四年甲寅　十五岁

诵习法文及拉丁文。曾随其老师参观上海洋行。

1855年　清咸丰五年乙卯　十六岁

诵读古文,服膺苏辙之文章及襟度。

1857年　清咸丰七年丁巳　十八岁

得徐汇公学圣学奖赏。"圣学"为研究天主教教义的课程,课本为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又列名于西文奖赏附录。

上海法领事聘马相伯为秘书,辞未就。

1859年　清咸丰九年己未　二十岁

得徐汇公学圣学奖赏,并列名于西文奖赏附录。

1860年　清咸丰十年庚申　二十一岁

太平军攻入上海，亲见李秀成驻军徐家汇，清早祈祷。

1862 年　清同治元年壬戌　二十三岁

入耶稣会，同时入新成立的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为修士。该院专务神工，尤以看护伤病者为日常事工。晁德莅担任该院院长。学习天文学，对西方及中国数学发生强烈兴趣。

赴苏州等地救护难民，染伤寒，病卧六十余日。

1864 年　清同治三年甲子　二十五岁

在初学院初学期满。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及拉丁文学。

1865 年　清同治四年乙丑　二十六岁

始习哲学。

1866 年　清同治五年丙寅　二十七岁

仍在耶稣会学习经院哲学。

1867 年　清同治六年丁卯　二十八岁

在耶稣会学习神学。

1870 年　清同治九年庚午　三十一岁

通过耶稣会通考，成绩“特优”。获神学博士学位，并祝圣为司铎。开始在安徽宁国和江苏徐州等地传教，得父同意，出家财数百金抚恤百姓，后为教会以违规禁止，并令马

相伯反省,与教会渐有矛盾。

入南京圣玛丽住院,随兰廷玉神父进修科学。

1871年 清同治十年辛未 三十二岁

返徐家汇,任徐汇公学校长。

1872年 清同治十一年壬申 三十三岁

丁父忧。

1873年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三十四岁

率公学学生应童子试。该校学生考试多能获选,故马相伯很注意学生的经史子集的讲习。

1874年 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三十五岁

任耶稣会初学院院长兼徐汇公学校长。仍努力于数学研究,译著《度数大全》等数理书百余卷,未能印行,后大多散佚。

1875年 清光绪元年乙亥 三十六岁

调徐家汇筹办天文台,当时仅有利玛窦用过的一台旧仪器,难以开展研究,又转攻数学。

1876年 清光绪二年丙子 三十七岁

调南京,专译数学教材。不久,退出耶稣会,离宁赴沪。曾致函文成章神父允许自己领受圣体。

任山东布政使余紫垣幕僚。时山东官场中人,对世界情形毫不知晓,遇有国际问题发生,多就商于马相伯,然对马相伯所谈瀛寰事,多将信将疑。

1877年　清光绪三年丁丑　三十八岁

调山东机械局总办。

1878年　清光绪四年戊寅　三十九岁

交卸山东机械局差事,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

结婚,妻为山东人。共育二子一女。

1881年　清光绪七年辛巳　四十二岁

随黎庶昌出使日本,任使馆参赞。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与日本维新要人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往还酬酢,并考察日本民俗。半年后回国探视病危的长兄马建勋。马建勋曾任淮军粮台。马相伯甚得力于马建勋的社会关系。

被李鸿章留作幕僚。本年末或次年初,受李鸿章派遣,代替幼弟马建忠赴朝鲜任国王的新政顾问。

1884年　清光绪十年甲申　四十五岁

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并派遣马相伯前往国内主要分局检查财务。马相伯作《改革招商局建议》。

1885年　清光绪十一年乙酉　四十六岁

受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赴台。途经香港至广州,向两

广总督张之洞献策,辟九龙为商埠,未得采纳。抵台后建议刘铭传借款开发经济,又未见用。

1886年 清光绪十二年丙戌 四十七岁

代表马建忠与美商旗昌洋行谈判,正式收回招商局的主权。

奉李鸿章命赴美借款建设海军,因借得款项数额太大且条件优惠,致李鸿章反遭清廷大吏怀疑,功败垂成。离美赴欧,在英、法等国考察政务民情,并赴罗马晋见教皇利奥十三世。

1887年 清光绪十三年丁亥 四十八岁

由法回国。

1890年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 五十一岁

在沪养病。

1893年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 五十四岁

妻携子回山东老家探亲,死于海难。

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五十六岁

母去世。马母生前信教虔诚,对二子退出教会一直心存遗憾。

1896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五十七岁

《时务报》发刊。教授梁启超等学习拉丁文。康有为询其以吸收欧洲文化之捷径,答以留学日本。

1897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五十八岁

通过沈则恭神父的斡旋,与教会建立融洽关系。将未成年的一双儿女托付给教会保育,只身重返徐家汇。并将大部分家产捐给教会,以作兴办教育之用。在佘山避静一月。

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五十九岁

上清廷书请设译学馆于上海,并呈请徐家汇耶稣会诸司铎襄理校务。

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一书脱稿。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六十一岁

马建忠去世。

1901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六十二岁

主持徐家汇天文台事务。翻译圣经。

1902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六十三岁

作《开铁路以图自强论》,谓洗刷国耻,努力自强,必以开铁路为枢纽。

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六十四岁

创办震旦学院，校址设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内。手订章程，行学生自治制。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1904年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　六十五岁

《马氏文通》由上海商务馆印书馆出版。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六十六岁

因反对外籍教士强迫学生守教规，率学生退出震旦学院，在吴淞另创复旦公学，任校长。但并未抽回在震旦的基金。

丹阳设商会，被推为名誉会长。

1906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六十七岁

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令，发动学潮，奉派赴日安抚学生，以“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名言，被张之洞誉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此条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目前未见中文记载）。

应两江总督之邀，赴南京讲演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宪法之真精神。

190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六十八岁

为英华政论文选《也是集》作序，强调立宪是“国民权利”，批驳清政府所谓人民程度太低、政府完全有能力自订宪法等言论。

年末，应梁启超之邀，东渡日本，就任立宪团体政闻社

总务员。提出“神我宪政说”,主张用基督教神学作中国宪法的基础。

1908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六十九岁

政闻社迁回上海,不久解散。返回徐家汇,但常应社会各界邀请,外出演说。

在《政论》第三号发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

1910年　清宣统二年庚戌　七十一岁

重任复旦公学校长。

夏,震日学院行暑假礼,出席演说,反复推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义。

“资政院”行开院礼,列名于江苏省咨议局推选的民选议员名单上。

1911年　清宣统三年辛亥　七十二岁

武昌起义爆发后,复旦公学由吴淞迁无锡,复迁上海,并改名为复旦学院。后校事停逾一年。复校后即改名复旦大学。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　七十三岁

曾任南京府尹(市长),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代理都督。发布《劝勿为盗布告》。

此年后,与章太炎等,欲仿效法兰西科学院,建立“函夏考文苑”。

1913年　民国二年癸丑　七十四岁

李登辉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此后马相伯脱离复旦校务。

北上,任北京大学校长,旋辞。

与章太炎、康有为等八人,列席袁世凯召集的"中央政治会议",并任约法会议议员、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参议院议员等。

发出《致江南公教进行会支部书》,要求各省教会通电反对"教育部率司员行礼及男女学堂均拜孔",主张信仰自由。

出版《新史合编直讲》。

1914年　民国三年甲寅　七十五岁

因袁世凯主持祀孔仪式,发表《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抨击袁世凯违背民国"约法"。

1915年　民国四年乙卯　七十六岁

出席参政院会议,对君主立宪案未投反对票。

与英华等同建辅仁社。

1916年　民国五年丙辰　七十七岁

与雍剑秋等在北京联合天主教教民,聚会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又与雍氏发起天津信教自由会,联合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信徒,拥护信仰自由。五月七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演讲《圣经与人群之关系》。

该年针对“天坛宪法草案”，著有《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书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后》、《书请定儒教为国教等书后》、《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约法上信教自由解》、《宪法向界》等文。另代天主教各教区信教公民草拟“反对孔道请愿书”五篇。均反对孔教立国，力主信仰自由为实现政治民主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必要条件。

1917年　民国六年丁巳　七十八岁

南下返沪，隐居徐家汇。

1918年　民国七年戊午　七十九岁

撰《民国民照心镜》。

1919年　民国八年己未　八十岁

教皇本笃十五，派光主教任中国教务视察员。因撰《答问中国教务》，建议各国教士“改为中国籍”，“迎合现今社会，结交官长，广立学堂，培养科学适用人才”。教皇颁发“夫至大”通谕，马相伯将其译成汉文，自费出版。

为陈垣重刊《灵言蠡勺》作序。

1920年　民国九年庚申　八十一岁

作《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建议中国教务应由中国籍人管理。

1921年　民国十年辛酉　八十二岁

南归，仍居徐家汇。此后近十年，生活由震旦大学补助。

1922年　民国十一年壬戌　八十三岁

被举为江苏财政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任期不详。

应《申报》五十年纪念征文，作《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

教廷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抵华，马相伯、英华等集资购赠公署。

1925年　民国十四年乙丑　八十六岁

英华于北京创办辅仁大学，请马相伯为校长，不就。

作《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

1926年　民国十五年丙寅　八十七岁

上海天主教教友创办《天民报》，马相伯任总主笔，撰《发刊词》，重申《民国民照心镜》中主张，并重申宗教与道德同属救世精神。

《致知浅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年　民国十六年丁卯　八十八岁

与徐允希司铎合译《灵心小史》。

1928年　民国十七年戊辰　八十九岁

蔡元培、于右任发起，假徐汇公学为马相伯庆九十寿辰。蔡元培祝词谓中国科学发展出于宗教家，盛称马相伯

早年提倡科学有力。

震旦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以创办人身份莅临讲话。

1929年　民国十八年己巳　九十岁

撰《教廷使署志》，因使署建立是中国教会本土化象征。

1930年　民国十九年庚午　九十一岁

为江苏通志局拟“宗教门”稿。

1931年　民国二十年辛未　九十二岁

九一八事变爆发，发表广播救亡演说，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协会领袖，并以本人名义，发起组织多个支援抗日战争团体。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九十三岁

一二八事变。发表《国难人民自救建议》。派门人携《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难会议”。发起中国民治促成会，江苏省国难会，不忍人会。加盟宋庆龄、蔡元培建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出版。

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九十四岁

《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增订再版。

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九十六岁

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上海组织各界救国会，出任名誉领袖，发表救国宣言。

1936年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九十七岁

丹阳建立马相伯图书馆，捐赠中西书籍八千七百册。

应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邀请，由上海移居南京。

《一日一谈》由上海新城书局出版。

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九十八岁

任国民政府委员。

七七事变后，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钢铁政策》。

上海沦陷，迁居桂林风洞山。

1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九十九岁

春，发表《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一文(未见)。

应于右任要求，欲从桂林迁往昆明或重庆，病阻于越南谅山。

1939年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一百岁

四月五日，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

四月六日，全国各地举行遥祝百龄典礼，政府高级官员、各党派领袖纷纷电贺。罗马教宗亦派代表前往谅山颁赐祝福。

十一月四日，寿终谅山。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一 日 一 谈
马相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l.sta.net.cn
网　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1　字数143,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21－1781－2/I·1445　定价：8.00元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学者讲坛丛书

赵景深　读曲随笔
马相伯　一日一谈
叶圣陶　文章例话
吕思勉　经子解题
朱自清　经典常谈
朱光潜　谈美书简二种
蔡元培　国民修养二种
周予同　中国经学史讲义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ISBN 7-5321-1781-2
9 787532 117819 >